

目 录

- 回忆我在巴盟的工作及巴盟行政机构的变动情况……………杨力生 (1)
- 米仓县经济、教育工作概况忆述
……………王直科 撰稿
张启高、张世杰、田永旺 整理 (51)
- 解放前临河县永和乡农村经济情况见闻
……………刘熊飞 (107)
- 解放后巴盟农业生产发展概况的回顾
……………赵国兴 (117)
- 新中国农业税收政策之体验
……………李清 (151)
- 四十年代绥西汽车运输业片断
……………姜宝恕 (162)
- 解放前陕坝的货栈业
……………高德富、王廷英 (177)
- 巴盟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见闻
……………高德富、王廷英 (189)
- 巴盟政协大事记 (1955年 1月至1989年 7月)
……………王枝梅 整理 (214)

回忆我在巴盟的工作及巴盟 行政机构的变动情况

原巴盟盟委副书记 杨力生

(一) 写在前面

我于1949年11月1日到达原宁夏省磴口县，任中共磴口县委书记。1953年11月调任宁夏省阿拉善霍硕特旗蒙古自治区工委副书记。1954年原宁夏省建制撤销，划归甘肃省管辖，阿旗蒙古自治区随之改为甘肃省阿拉善霍硕特旗蒙古自治州。1956年，阿旗蒙古自治州又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改名为巴彦淖尔盟。管辖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磴口县、巴音浩特市(市建制以后被撤销)，我任盟委副书记。1958年，巴盟与河套行政区合并为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盟府由巴音浩特迁址三盛公，即现在的巴彦高勒。我先后任盟委副书记、书记，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期。

我在巴盟住了18年。18年对1个人的一生来说，不是短暂的一瞬，而是较长的一段路程，巴

盟是我的第二故乡。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巴盟的人民群众对我情同手足，亲如家人。我和巴盟的各族干部与人民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着深厚的感情，巴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都感到十分亲切。

巴盟的劳动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降伏黄龙，保护农田，筑起了308华里长的防风固沙林带；为驯服黄河，变水害为水利，筑起了百里防洪大堤；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了繁荣美丽的巴彦淖尔盟。在这些伟大的壮举中，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记载。因此，我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把它写出来，作为对巴盟人民的歌颂，同时也把它作为我对巴盟人民的怀念。

（二）踏上征途

1949年9月23日宁夏银川市和平解放，同年10月18日，中共宁夏省委派我和李尔直等32名干部前去接管磴口县。这32名同志都是从陕甘宁边区来的，都有一定的政策水平，也有对敌斗争经验和群众工作经验。出发前，省委书记潘自力 and 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亲自召集我们开会，交代了任务，指出到磴口县工作的艰巨性，嘱咐我们一定要在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省委安排，我任

县委书记，李尔直任县长，其他30人都是各科室负责人，就连区级干部也明确了。我们由一个班武装保护，即日从银川市出发。当我们走到离磴口县还有200里的石咀山镇时，因前路被包贵廷土匪部队袭扰，行人断绝，情况不明，不能继续前进。我们只好在石咀山镇住了下来，一面派人侦察情况，一面组织干部学习、研究到磴口后开展工作的方案。为了防备土匪袭击，我们作了打仗的充分准备。大家找来了120个大皮浑筒，里边塞满羊毛，绑在木椽上，做成了漂水过河、乘风破浪的“土军舰”。同时还与驻在此地的19兵团194师取得联系，他们支援我们每人一身老羊皮皮袄还有30匹战马。

然而，在同志们的议论中，大家觉得土匪并不可怕，因我们一行人大都是当兵出身，又有武器，打仗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还想找寻土匪去消灭他呢！大家担心的是到磴口后如何开展工作。特别是听石咀山的老乡说，磴口西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沙漠里刮起大风天昏地暗，寸步难行，稍不注意，就会被大风卷进黄河里。还有的人说，那里刮起大风来，沙浪比城墙还高，扑向村庄，卷走牛羊，埋没房屋。我们对老乡们这些说法半信半疑。有的同志说沙漠如果真有那么厉害，那里早就无人居住了；有的说沙漠如不厉

害，怎么这里不见行人来往。总之谁也说不清，有的人不免情绪低落。县委委员、公安局长董怀月同志说他是陕北人，见过大沙漠，沙漠对人畜是有危害的，有时有破坏性，但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厉害，人类完全可以征服沙漠。他的话使一些情绪沮丧的同志振奋起来。我趁机鼓励大家：“同志们，老董说得对，人类完全可以征服沙漠，我们也一定能征服磴口的沙漠”。从那以后，在我和同志们的脑海里就印下了如何治理沙漠的问题，为以后的防沙造林，封沙育草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1949年10月30日，我们在石咀山镇已住了20天，在初步摸清情况后，决定整装起程。我们请从磴口来这里的郭秀礼等人作向导，乘“土军舰”沿黄河顺水而下。路上郭秀礼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磴口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当时的状况。原来磴口县城（原址在今阿左旗巴音木仁苏木），是个风景独特的地方，黄河流抵县城脚下，城外的石头台阶逼使河水向东奔腾而去。乘船在黄河上向北眺望，磴口宛如一座小岛，沿河的杨柳、沙丘倒映水中，就如一幅动人的山水画。镇内房屋鳞次栉比，寺庙（清真寺、关帝庙）布局得当，素有小北京之称。这里又可称是水旱码头，平时河里千帆云集，镇上万驼往来，商贾贸易相

当繁华。镇内居住着汉、蒙、回等各族人民，他们有着各自的风俗习惯。郭秀礼等人悲痛地说：

“可惜这样好的地方，现在被土匪残害、糟踏得不成样子啦，磴口人民早就盼望你们来啊！”

11月1日下午，我们到达了磴口县城，下船入城，所见到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镇内房舍空荡，人畜无影，房屋门窗烧毁，残垣断壁，惨不忍睹。我们在县政府内看到的是纸灰满地，桌椅横卧，档案毁坏，不堪收拾。郭秀礼同志哭着向我们诉说：“这都是前些时包贵廷土匪部队糟害的结果，这些残无人道的家伙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们将百姓财物抢劫一空，人们流离失所，无法生存，都到外面逃难去了”。

看着这一片惨象，我们心里非常难过。我觉得这里已不能作为新的县政府所在地了，于是与县长李尔直同志商议后，席地而坐召开了县委会，讨论迁移县址问题。经两小时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向宁夏省委请示将县府由磴口迁到三盛公（后来省委批示同意把县址迁往三盛公，即现在磴口县粮台乡政府所在地）。

县委会议结束，我们又乘“土军舰”继续东行，约50里，至上江。此时天色已晚，船不宜行，我们只好在上江河面抛锚过夜。10月天气，塞外草衰，寒气逼人，但同志们睡在羊毛堆里也聊

以自慰。这一夜不许高声说话，不许点灯，吸烟要用手把烟头捂住，以防土匪袭击。我和李尔直同志睡在一个被窝里，他问我：“老杨，你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吗？”我说：“水中过夜还是第一次。”他又问我：“你说这样安全不安全？”我说：“敌人不一定知道我们住在这里。”他又说：“还是小心为好。”于是我们起来对周围情况又进行了巡视检查，安排两个战士持枪站岗，注视河岸。我同李尔直同志开玩笑说：“兵法有‘背水一战’，今夜我们是韩信还是马谡”。

这一夜风平浪静，我们睡得很香，安全地渡过了这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东方刚发亮，大家就醒了。我们将船靠岸，我派两名同志去神树湾与绥远起义部队联系，剩下的人上岸活动四肢，舒展身躯，呼吸新鲜空气，此时同志们心情感到特别舒畅。一会儿只见东方泛起了桔红色，一轮火红的太阳从千里山冉冉升起。遥望西边是无边无际的大沙漠，霞光照射在沙丘上，金光闪闪，十分壮观。波涛汹涌的黄河，由南自北，奔腾而下。两岸人烟稀少，只有几座破屋点缀。这两日行船，只是在稗子地见到过一片河柳，这片河柳约十华里长，宽只二、三百米，但却抵挡了流沙。有的地方树木稀少，流沙已侵入河床，不仅影响航运，而且给黄河下游人民带来了灾难。

只有神树湾有两株几丈高的胡杨树拔地而起，点缀着这一片荒漠。同志们指着那两株胡杨树说：“这两株树太少了，如有稗子地的河柳那么多，阎王鼻子的流沙就伸不进黄河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围绕着黄河、沙漠、植树、种草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仔细地听着，很受启发。是啊，同志们说得有道理，河边种树得天独厚，防沙护堤受益非浅。这时，县长李尔直同志说：“我们三边旧社会有位县长在沙漠里栽了很多的树，现在人们从树边走过，还在称赞那位县长的好处”。我说：“李县长，磴口县有这样大的沙漠，又有黄河那么多的水，你应该比那位县长更高明，种更多的树，为后代造福！”李尔直同志笑着回敬我一句：“这就看党委书记的领导了。”

大约早上8点多钟，派去和起义部队联系的同志回来了，同来的还有起义部队杨守谦团长派来接我们的人，于是我们到杨团部吃了早饭。我们趁杨团长向驻在三盛公的320师师部请示的一段时间，到戚万银、黄交交等几户居民家里进行了访问。他们住的都是矮小的土房，进门上炕直不起腰，炕上没有铺盖，只有几件破烂羊皮，地上也没有什么家俱，只有一个锅台。问时回答说：“种地无权，放牧收税，就此茅屋一间，过光景谁还作长期打算。”我们对这些贫苦人民作了安慰，鼓

励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发家致富。

午饭后，杨团长陪同我们乘马奔赴三盛公。马走在阎王鼻子的大沙丘上，马蹄陷入沙子里就象被吸住一样，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我问杨团长，骑兵在沙漠里怎么打仗，杨团长说，有“沙漠之舟”骆驼可乘。此时回头望去，沙丘连绵起伏，无边无际，连神树湾那两株高大的胡杨树也被湮没在一片沙海中了。

穿过阎王鼻子，进入柳拐，此处人称二十里柳子，绿柳成荫，另是一样世界。这里长着茂盛的芨芨草、白茨、河柳、红柳等，野兔欢蹦，雉鸡横飞，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二十里柳子，我们碰到了看守电话线路的刘工头（名叫刘柱），他独自住在一间小茅庵里。我问他：“沙漠里的电话线路好管吗？”刘工头叹了口气说：“唉！很不好管啊，一刮大风就倒霉了，不是电线被吹断，就是沙子埋没了电杆”。他的话启示了我对风和沙子关系的认识，风助沙威，沙借风势真是害人哪！过了二十里柳子，就踏上了河套大平原，这里便是古诗形容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也正是指的这里。我念小学时，课本里就有关于河套的课文。今天亲眼看到美丽可爱的河套大平原，使我不禁心旷神怡。

过了南粮台，三盛公城已隐约可见，扬鞭策马急行10里许，不觉已到三盛公城西。原起义县长李开荣率数十人正迎候在城门外，我们下马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辔入城，住在了西城区的乡公所。晚饭后，李尔直县长、张光祖民政科长到320师师部拜会了张副师长和958团郑团长。当晚我们召开了县委会议，研究了当前工作，主要是了解掌握情况，打开局面，站住脚跟。参加会议的有杨力生、李尔直、董怀月、刘元和、李建章、张光祖、周培基等同志，由县委秘书林生荣同志作了记录。第2天中午，320师张副师长设宴招待我们。当日办理了接管手续，从此我们开始了磴口县的新的工作。

（三）情况复杂，环境恶劣，内部出现了动摇派。

磴口县地处我国西北和华北交通要道上，长期以来属阿拉善旗管辖。自民国15年12月设立磴口县起至解放前，统治西北的国民党马鸿逵旧政权和阿拉善旗王爷为争夺这块地方，发生多次激烈的斗争，旗县并存，矛盾重重。特别是连外国人也看中这块宝地，1875年外国传教士进入磴口后，磴口县几乎被教会控制。庚子赔款后，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势力瓜分土地，愚弄人民，三盛

公教堂成为西北的一大教区，号称“小梵蒂冈”。教会势力所到之地筑城建堡，搞武装，有地权，全县一半以上的地方成了他们的“租界”。于是出现了旗、县、教堂三权并存的局面。解放前夕，德穆楚克栋鲁普部下包贵廷土匪部队狼奔豕突，将磴口县城抢劫一空，人民遭难，生灵涂炭。使磴口县城这有名的平罗八景之一的“春帆重镇”变成了“枉死城”。起义县长李开荣带领全体旧职人员逃到了三盛公。我们到三盛公后，这里住有绥远刘万春起义部队的3个团。当时起义部队中还有人进行反共宣传活动，有人甚至在大街墙壁上画了一个5人，上边写×××三个字，有的还书写反动标语，诬蔑漫骂我党。为此事我曾专门找起义部队张副师长面谈过。以后，公开的反动宣传没有了，但是仇视共产党的反动家伙仍在暗地活动。天主教堂的神甫中也有坏人，有的曾在河北献县当过还乡团队长，华北解放后，混入教堂，他们利用传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当时驻守在三盛公教堂内的九五八团的贾营长（名字记不清了）很靠近我们，此人思想进步，曾多次与我面谈，告诉我说：“我们的部队中有人暗地进行活动……”他提醒我们要注意。不久贾营开到黄羊木头，就有两个连叛变了，与张疤子土匪结合起来上太阳庙山骚扰当地

人民。这一带土匪活动十分猖獗，社会秩序很不安定。仅磴口县境内就有好几股土匪，他们与以图克木唐为中心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包贵廷匪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这些小股土匪，狐假虎威，借着包贵廷匪部的声势，四处抢劫，先后有21户群众被抢，6人被打伤。

记得有一天夜里，三盛公城内相当紧张。晚饭后得知包贵廷土匪部队当晚要进攻三盛公城，这时其他起义部队都离开了磴口县。城内只驻着九五八团贾营长的1个连，是贾营长为了保护我们县委而留下的。这个连的连长姓刘，是董其武的外甥，思想进步，为人精干，和我交情甚好。那天晚上他与我定了守城作战计划，我们把武装力量分为两部分，部队守护城墙，县委武装守大修道院。我和他一起上阵指挥。指挥部设在城西北角的围墙里，我们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土匪作战。到半夜时有位同志过于紧张，枪走了火，土匪得知城中有备，没敢攻城，使城内居民受了一场虚惊。

土匪出没，环境险恶，要开展工作是十分困难的，这时县委内部有的人出现了动摇。以县委组织部长刘元和同志为首的几人认为，磴口县环境恶劣，不能开展工作，要县委率全体干部立即返回银川，否则，干部会受到损失，不好向组织

交待。当时在我们的干部中有少数人认为全国解放，革命成功，如果在这里牺牲很不值得，回避一时再来工作也不迟。产生了畏难和侥幸心理，他们同意刘元和的意见。这些同志对开展工作失去信心，他们的这种情绪被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所利用，有的搞反宣传，散布恐怖气氛，推波助澜，以致有些基本群众一时也不敢靠近我们，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

但是以董怀月为首的大多数同志意志是坚定的，他们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全国形势大好，西北大军压境，十九兵团占领了宁夏，绥远部队已经于“9·19”起义，国民党大势已去，人民群众倾向我们。因此不能畏难退缩，不同意率干部回银川。在出现这两种分歧意见的情况下，我和李尔直坚决地支持了董怀月等同志，我们明确表示，绝不能后退，后退就是投降，一定要克服困难，坚持开展工作。由于县委坚定不移，使曾产生过动摇思想的同志都坚定起来，站在了县委一边。而刘元和与二区区委书记张云看到支持他们的人少了，便不再在会上坚持自己的意见，却在背后散布消极情绪。县委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不但不接受反而提出要请假回家。经我们分析，认为如不给请假，他们有可能不辞而别，反而对党影响不好。为了争取他们，最后给他们准

了假。可是刘元和、张云回家后就不来了。后经省委派人去动员他们回来，他们仍坚持不回磴口。省委最后决定开除了刘元和、张云的党籍和干籍，他们带去的武器也收交磴口县人民政府。

在险恶环境下，我们由宁夏省委选派的32名同志，除刘元和、张云二人外，其他同志都坚持了下来。冒着生命危险在磴口县开展了艰苦的工作。由于我们坚持延安作风，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群众对我们象亲兄弟一样，关怀备至。例如当时我们来磴口工作的同志，衣着单薄，都没有棉帽子，有次郭成宝同志赴绥西联系工作把耳朵冻肿了。三盛公城西有位老贫农郭起世知道后，把自己心爱的狸猫宰了，剥下皮做成帽子送给了干部。象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群众的支持，鼓舞了我们，使我们更坚定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四) 站稳脚跟之后

我们是怎样在磴口站稳脚跟开展工作的呢？回顾磴口县解放初期头3个月的工作，择其大者主要有：

- 1、剿灭土匪，清除隐患，保护干部，保护群众利益。

我们到磴口的头3个月，经请示省委，只接

管了起义的县政府和乡公所，保留了原来的在职保、甲人员，这样就没有把干部过早地分散下去。我们把县区干部统一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政策。我们的干部骑马带枪既是一支剿匪肃特的武装队，又是一支工作队；既可剿灭土匪，保护群众，又保证了干部的安全，同时也能监督保、甲人员执行人民政府的政策。大家发扬八路军的优良作风，深入基层在零下近30°的天气里，冒着严寒，不顾衣服单薄，白天搞宣传做群众工作，晚上有组织地伏击敌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3个月时间走遍了全县，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同时消灭了几股土匪，土匪头子骑的有名的白走马也被我们工作队缴获，有一次在三区捉住两个土匪，一个名叫李文五，一个叫尚二牛，关在天主堂大修道院，不料晚间这两个家伙把墙挖通跑了，公安局股长陈珠等同志跟踪追击到渡口堂。当地群众听了很有意见，说土匪逃到这里，他们活不成了。陈珠等同志仔细搜索，当天下午就从黄羊闸白茨堆里捉回了这两个土匪（以后镇压了），当陈珠返回渡口堂时，群众热烈欢迎，伸出大拇指说他们是好样的，给他们吃饺子。我们这支工作队还与绥西群众联系消灭那里的土匪。还曾经配合部队在刘官府城活捉伊盟土匪司令刘保才，交伊盟政府处决了。陕北有名的

反共头子张廷芝的小老婆由狗腿子武装保护逃到磴口，也被我们的武工队抓获。

那时的县区干部都是武装工作队员，大多数同志在战争年月参加过游击队，有的还当过队长。象任学礼同志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他就带支游击队，在敌人心脏里活动。还有不少同志经过多年的戎马生涯，搞武工队活动大都是内行。县委当时发挥了这些优势，是成功的经验。因为1949年冬到1950年春，在磴口县开展工作，干部是有生命危险的。有一次三区区长汪子珍同志夜间到一户人家投宿，恰巧有几名土匪也藏到这家，汪子珍同志叫门，土匪知是汪区长，隔门开枪，冲出去逃跑了，差点发生危险。当时我们采取武工队形式，既保护了干部，又开展了工作。现在回忆起来，假如那时把干部过早地分到区上，或让他们单独下乡工作，可能会被敌人杀害。当时米仓县三道桥区政府的干部就被土匪夜间袭击，牺牲了好几名。

2、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主动团结各族干部和蒙族军队。

磴口县原属阿拉善旗管辖。我们到磴口县后，这里仍有阿旗设立的两个总管公署和磴口、道劳素海、巴音套海、沙金套海四个巴格，并在磴口县境内驻有一个中队的蒙古族军队。这支部队

很有战斗力，过去长时间与马鸿逵武装对立，打过许多仗。当时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存在工作上的关系，井水不犯河水也完全说得过去。但我们没有那样做，而是以朋友关系主动接近他们。在蒙古族政府统辖的地区，政令、军令是很严的。蒙古族群众出远门时，东西带不动了，随便放在野外，过几天再来取，东西仍在原地，无人偷窃，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蒙古族群众待人忠厚诚恳，对过往行人热情接待，吃住如同家人。但是如果你对他们对他们不诚恳或有什么不轨行动，他们就对你不客气。这样好的习俗对我们的工作极其有利。我们抓住这种有利条件，做了大量工作。当时的两位蒙古族总管司乌图那笋、马图门巴依尔和蒙族中队长杨富存思想都很进步，愿意靠近共产党。因为他们过去深受大汉族主义和马鸿逵政权的欺压，现在共产党解放了他们，所以对共产党是欢迎的。他们对人十分诚恳，我们也以诚相待，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通过和他们的接近，我们认识和团结了不少蒙古族群众，这些群众有的以后当了干部，有的成为积极分子。象司乌图那笋和孟柏林两位同志，后来就当了磴口县的副县长，杨富存当了巴盟军分区副司令员。蒙族妇女黄散巴路成了积极分子。司乌图那笋、杨富存、孟柏林等同志，他们在磴口县解放初期对

党和人民的事业有过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民族团结工作的开展，对磴口县解放初期的社会安定，干部的安全起过一定的作用。如国民党中统特务副组长高风鸣就是在杨富存部队中被捕处决的。

3、发挥当地干部和有文化青年的作用。在接管起义县府的工作过程中，县委特别重视吸收当地干部和有文化、有工作能力、思想进步，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这些同志大都是当地人和绥西人，他们熟悉当地情况，有群众基础，在当时困难情况下对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赵钟贤同志，起义前是县政府教育科长，我们到磴口时，他带人远道欢迎，并主动安排我们的食宿。在接管过程中，主动靠近党组织，积极反映情况，特别是在对敌斗争和推荐知识青年干部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后经县委研究报请省委批准，仍然让他担任磴口县人民政府文教科长。这些干部中不少同志至今仍在磴口工作，他们为建设新的磴口县出了力，受到人民的尊敬。

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干部学习制度。为了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县委制订了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由县委宣传部负责，有计划地组织干部进行学习。学习内容和工作任

务紧密结合，学以致用。每项学习结束后都要进行考试；县上每召开一次干部会议，都是先考试后开会，每次考试成绩都要公布，前次会议就提出下次会议的考试内容，要大家事先认真学习。在县委领导的带头遵守下，同志们都能自觉执行，认真对待学习和考试。县委组织部选拔考核干部，学习表现好坏是主要条件之一。县委书记王盛华、亢生堂等同志就是在屡次学习考试中发现的人才。1960年有一次我碰见参加过学习和考试的尚诚义同志，他还能背出当时考试的题目和内容。由此可看出当时干部对学习的认真程度。

这样的学习，还使同志们既能理论联系实际，做好工作，又能提高文化程度。如县委组织部长李建章同志，当时文化程度低，经过学习，他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提高很快，他的讲话稿和组织部发的文件都是自己起草的。据他本人讲，起草这些文件是很好的学习文化的机会。后来他担任县委书记时，文件仍是亲自起草。我那时的讲话稿和一些重要文件也是亲笔起草，如磴口县的土地改革计划和总结就是我起草的。但以后就努力得不够了，多由秘书起草。

那时的学习制度，确实起到了培养和造就人才的作用，为磴口县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干部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治理沙化的初步设想，解决农民烧柴问题，保护沙漠里的自然植物。

1949年农历11月29日，我和武工队的同志由三盛公出发，经两苗林走冬青梁。穿过沙漠到四坝下乡工作，这次下乡同时也有消灭土匪的任务。但未发现土匪，却发现了危害碓口县人民的一个强大的敌人，就是沙漠化。

这一天，我们乘马进入冬青梁沙区，只见沙窝里停着二百多辆牛车，原来是当地和绥西的老乡，几百人在沙丘上刨白茨、沙蒿。这时恰遇刮起大风，刨掉白茨和沙蒿的沙丘，黄沙被大风卷起，象河水一样流向农田。我们下马问这些农民为什么要把这些植物刨掉，他们说：“烧在前，吃在后，过去烧红柳吃白面，现在有吃没烧，不拉柴禾就做不熟饭，光景不好过。”我问他们刨了这些柴禾沙子来了怎么办，一位农民叹了口气说：“沙子占地人搬家嘛。”

我们到四坝后召集农民座谈，群众对刨沙窝里的白茨、沙蒿很有意见，他们说这样一来，沙逼人退，情况越来越严重，沈家河干渠就因流沙埋没而改道七次。杨家茅庵有一户姓仇的农民，原有耕地160亩，被流沙夺去155亩，12年中被逼迫搬迁四次。但没有烧的也实在是个问题，他们要求县委出面解决农民的烧柴问题。碓口县那时长

430华里，南到二子店，北到公地湾，宽不足十里，环沙面河，交通不便，人民生活中的烧柴问题确很困难。县委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广泛征求了意见，有位民主人士叫辛学亮，他过去在乌达、卡布其开过煤窑，建议用大船到那里运炭，农民的烧柴问题就可得到解决。县委采纳了他的意见，用船去乌达、卡布其往回运炭。同时派人阻拦那些继续刨白茨、沙蒿的人，并明令禁止不准再刨，这样就保护了沙漠的自然植被，为以后的封沙育草工作打下了基础。后来县委制订了建设308华里防沙林带的宏伟计划，从1950年起，县委就发动全县各族人民开始治理沙漠，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以后综合治理沙漠创造了条件。

（五）不幸事件的发生

1950年春，驻守在磴口县的绥远省“九·一九”起义部队陆续调回绥远省，为控制局面，加强地方社会治安，宁夏省委派19兵团194师581团由团长杨森率领进驻磴口县，团部设三盛公。之后581团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宁夏省委又派独立团前来磴口县接防，团长刘思孝，政委王兴邦都参加磴口县委会为委员。由一个团正规军进驻磴口县后，使磴口县的工作有了坚强的后盾，出现了新的局面，“废保

建政”、“镇压反革命”、“减租退押”等一系列工作进展很顺利。

在19兵团194师581团进驻橙口县后，发生这样一件事：1950年9月11日下午天时，有两个骑兵连到了渡口堂。这两个骑兵连一进城就封锁了全城，对来往行人只准进不准出，当时区政府的人们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怀疑是土匪骚扰。因此区委书记任学礼派一名同志翻越城墙到三盛公向县委汇报。我得知情况后和杨森团长分析研究，认为这一带没有骑兵部队设防，恐怕是张炮子的土匪部队出来骚扰。我们决定连夜出兵将渡口城包围，以防不测。部队派出后，我与杨森团长随后出发，天刚麻麻亮，走到天兴泉时，听到东面响起了猛烈的枪声，前边已经接火，于是我勒快马加鞭，拼命赶路，当我们赶到渡口堂时，双方已停火。竟是一场自己部队的误会战。原来这两个骑兵连是内蒙古自治区骑兵第五师的，由一位姓裴的团政委率领在伊盟一带剿匪，他们过黄狗来到渡口堂后，误以为被土匪包围，就组织部队手拂晓突围，几次未能冲出，双方感到如此火力不象是土匪，立即停火联系，才知是误会。但骑兵连的一位蒙古族副连长名叫希日希扎木苏在这场误会战中牺牲了，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我们进城见面，那位姓蒙的政委与杨森团长吵了起来，两人互相埋怨指责，我从中调解，他们才停止争吵，商办善后工作。

那位蒙古族副连长，是在城内房顶上指挥作战时中弹牺牲的。火化时发现是一粒山西造冲锋枪用的（山西造盒子枪也能用）铅弹头打中的。当时我们查究双方部队和区政府人员都没有这种枪和子弹，这粒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呢？最后认定是城内暗藏的敌人趁乱杀害的。对蒙古族兄弟的牺牲我们是很悲痛的，暗藏的敌人不肃清，我们就安定不了。此事由县公安局立案进行了侦破。

回忆解放初期，在新区开展工作，牺牲的同志是不少的，曹动之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曹动之解放初期任中共阿拉善旗工委书记，1950年7月31日由银川开会回巴音浩特时，走到贺兰山下范家营子，中了土匪埋伏，与敌搏斗而光荣牺牲。和他同时殉难的还有警卫员杨万山、张永祥二同志。对曹动之等同志的牺牲我十分悲痛。动之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是我的良师益友。记得一次我们同在省委开会，他见我只带一名警卫，就批评我说：“力生同志，磴口县离银川这么远，你来时只带一个警卫员，遇上土匪怎么办呢？”我听了他的忠告，以后每次赴省委开会，都多带几人

以防土匪袭击。有一次我们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后，从银川乘客车回磴口县，同行的有王林保等同志。当车行至千里山南边棋盘井以西20多里时，突然从山前冲出一群土匪，恶狼似地向汽车扑来，土匪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也开枪还击敌人。正在这紧张时刻，因汽车加速把在车上向土匪射击的王林保同志甩了下去，（那时的客车是敞蓬大卡车），而司机竟不给停车。王林保同志将被土匪追上，十分危险。我急中生智，把枪口对准司机，胁迫司机停住了车，把王林保同志抢救上车加速行驶。就这样我们的车开走了，土匪扑了个空，我们几位同志也脱险了。我们的幸存应感谢曹动之同志，是他的关心，他的提醒，使我们提高了警惕，加强了对土匪的防范。

（六）调任工委副书记

1953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宁夏省蒙古自治区筹备会议在巴音浩特（今阿盟盟府所在地）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我调任宁夏省蒙古自治区工委副书记，1954年4月23日，宁夏省蒙古自治区正式成立，我被选为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

宁夏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是经过艰苦努力才实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追溯一段历史。

1949年8月兰州战役胜利后，西北野战军继续向宁夏、青海等省进军。当时与内蒙古各族人民多年为敌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操纵下的“西蒙自治政府”随之垮台。但德王不甘心失败，率残部逃出定远营，窜入阿旗牧区拐子湖一带，负隅顽抗，继续与人民为敌。

德王逃走後，阿拉善旗王爺達理札雅於1949年9月23日率眾起義。額濟納旗王爺塔旺嘉布也相繼於1949年9月27日宣布起義。兩旗和平解放，這是兩旗上層王公為廣大牧民做了一件好事，為祖國的解放做了一件好事。

阿、額兩旗和平解放不久，原寧夏省委即根據地區特點考慮成立寧夏蒙古族自治區，以實現區域自治的民族政策。但歷史上滿清統治者害怕蒙古人強盛復興，曾採取分而治之的辦法，“從封”以制其勢；“從釋”以制其生。使蒙古族互不團結，走向衰弱滅亡；國民黨反動派推行的大漢族主義政策同樣如此，解放前在阿、額兩旗設專員公署，派兵，派特務，以阿、額兩旗作為反共反蘇的橋頭堡。那時國民黨進駐額濟納旗的機關人員就有三千多人，超過了當時額旗全部人口數。磴口縣原是阿拉善旗的轄地，當時外國教堂勢力十分強大。使得這個地區的情況異常複雜。由於歷史的原因，原寧夏省委建立蒙古族自治區的計

划受到影响，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阻力。

原宁夏省委鉴于上述情况，决定首先应做好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不要急于马上成立自治区。为了使民族自治工作做得稳妥而顺利，除对两旗的土层人士和起义人员做好工作外，首先派医疗队深入牧区开展群众性的医疗卫生工作，并组织贸易合作社解决牧区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用品的供应，这两项工作深受牧民群众的欢迎。进而注意到党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应特别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让他们当家作主。因此选拔了一批少数民族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如阿、额两旗的蒙古族蔡楚鲁、史楚鲁、乌伦散、额尔登格勒（病故）、苏木雅、范尔登巴图（病故）、陶乌力吉等，就是在解放初期党培养的青年干部，以后他们都是盟、旗的主要领导人。

1951年10月16日，原宁夏省委开会研究阿拉善旗、磴口县的工作时，我和阿拉善旗委书记李健同志列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曾提出过宁夏蒙古族自治区的建立问题，指出要抓紧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同时商议请调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到省府工作。还决定，磴口县的土地改革，应征求阿拉善旗政府同意（磴口地权属阿旗），并派蒙古族干部参加。之后，阿拉善旗政府派罗永寿

等蒙古族干部参加了磴口县的土地改革，使全县土改工作在1952年冬到53年春顺利完成。

1952年10月29日原宁夏省委统战部长王志强同志召集阿拉善旗旗委、磴口县县委负责同志面议，拟在当年11月份召开宁夏省蒙古族自治区筹备会议。在准备过程中，由于额济纳旗政府提出不同意见，因此省委又决定推后建立筹委会，继续进行协商工作，以求得各方面的满意。

经过年余时间的工作，额济纳旗政府仍有意见，不同意参加宁夏省蒙古族自治区，于是省委决定先以阿拉善旗、磴口县成立宁夏省蒙古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1953年11月11日，省委调阿拉善旗旗长达理札雅、旗委书记李健、副书记云祥生，磴口县委书记杨力生等参加宁夏省蒙古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1953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筹备会议在巴音浩特举行。在省委副书记黄罗斌、统战部长王志强等同志指导下，成立了以达理札雅（仍兼阿拉善旗长）为首的29人筹备委员会。

会议期间，由黄罗斌副书记宣布成立了中共宁夏省蒙古族自治区临时工委，工委书记李健、副书记杨力生、云祥生。工委委员：苏德保、扎木素、刘思孝、吴学易、贺满堂、拉希桑布、陶克陶。

在12月1日首次工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干部中进一步开展学习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活动。指出对此次筹备会议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如磴口县不愿参加蒙古自治区，成立蒙古自治区就是要收回磴口县等等认识问题，要在学习逐步加以解决，要提高觉悟，增强团结，以利开展这一地区的工作。

12月11日工委会议研究开展工作问题时，有些同志有脱离实际的过急要求。黄罗斌同志针对此种倾向讲了一个故事，黄说：“外蒙在解放后将一个活佛养活了一辈子，活佛临死时说了一句话‘我再不转世了’。同志们，这位活佛的一句话的作用，顶我们同志们说多少话呢？”工委就以黄书记讲的故事，强调要从实际出发，防止急躁冒进，开展民族地区的工作，要稳步前进，成败的关键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筹备会成立后，工作开展是困难的，没有办事机构，只有依靠阿拉善旗委、旗政府开展工作。由于条件限制，到牧区人少了不易开展工作，人多了吃住问题又解决不了。所以，首先充实和加强牧区的医疗和贸易工作，以办理消费合作社为重点，既宣传党的政策，又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深受牧区人民的欢迎。

摆在工委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实现党交给的任

务，做好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使分割几百年的蒙古族尽快地统一团结起来。此项工作党中央和内蒙古自治区，原宁夏省委都是很重视的。周总理、乌兰夫同志为此在1955年1月间曾邀请在阿旗有影响的巴文峻（蒙族）同志到北京去会晤，周总理请巴文峻做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时间实现内蒙古自治区的统一，早日归并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乌兰夫同志和民委汪锋同志向达理札雅、塔旺嘉布同志做工作，要他们主动搞好团结，并向他们各赠送一辆华沙牌小卧车。

（七）组织参观，开阔视野

1954年7月原宁夏省委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商定，以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磴口县的民族上层人士为主组成宁夏牧区参观团，从7月23日至11月5日，到部分省、市、区进行参观。参观团一行86人，陈爱尔德尼巴图任团长，我和塔旺嘉布任副团长。由宁夏到呼市后，全体成员列席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后，自治区政府派副秘书长嘎鲁奔僧格同志负责，包了两节专供参观团用的卧铺车厢。由呼市出发经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到呼盟牧区，后又返回到西安、兰州等地参观。参观团到兰州时，塔旺嘉布

对我说：“你回去告诉党委，额旗同意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愿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但要容许我再做一段时间的工作。”

牧区参观团历经百天，行程万里，耳染目睹，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深受教育。参观团达到呼和浩特时，乌兰夫、杨植霖、王再天、汪锋等领导同志亲自接见，王再天同志还给参观团做了专题报告。杨植霖副主席在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中讲述：“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任务，已由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为重点时期，进入以建设为重点的时期。”王再天副主席在报告中说：“我们蒙古族被大汉族主义一块一块地分割开来，以便他们统治欺压剥削，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东至兴安岭，西至居延海，实现了蒙古民族的团结统一，大家见面了，心里有很多的话，一下子说不出来了，过去我们受尽痛苦，现在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了。”

通过这次参观，不仅蒙族同志认识提高了，汉族干部也提高了认识，愿在民族地区积极而努力地工作下去。

（八）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及与甘肃省合并

宁夏省内蒙古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经过138天的努力工作，到1954年4月23日，在巴音浩特召开

了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宁夏蒙古族自治区委员会，选举达理札雅为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云祥生、陈爱尔得尼巴图、杨力生，委员27人。4月24日在巴音浩特西花园召开了五千人群众大会，庆祝自治区的成立。宁夏省政府副主席孙殿才，民政厅厅长王金璋等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主要内容是成立蒙古自治区，就是要蒙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到1954年6月20日，国务院决定宁夏省建制撤销合并到甘肃省。宁夏蒙古自治区亦归甘肃省领导，改名为甘肃省蒙古自治州。

甘肃省委对蒙古自治区的归属是明确的，准备过渡一段时间，做好工作，条件成熟后，蒙古自治州就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当时甘肃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商定，自治州的干部由内蒙古自治区调配。巴图巴根等16位蒙古族干部，就是1955年4月29日由内蒙古自治区调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工作的，巴任州委第二书记。

甘肃省委对蒙古自治州的工作很重视，省委书记张仲良同志当面向自治州负责同志讲，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要慎重，要多接近上层人士，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做好归属内蒙古自治区的准备工作，任务仍是艰巨的，但不能过急，要稳步前进。

1955年4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又在巴音浩特召开，会期五天，代表大会按《宪法》规定，将宁夏省蒙古自治区改名为甘肃省蒙古自治州。选举达理札雅为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州长，云祥生、陈爱尔德尼巴图、杨力生为副州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到1955年12月19日甘肃蒙古自治州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额济纳旗王爷塔旺嘉布，协理牛顿在大会上讲话时，公开宣布额济纳旗参加蒙古自治州，并愿归属内蒙古自治区领导，至此为甘肃蒙古自治州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创造了条件。

（九）巴彦淖尔盟建立

甘肃省蒙古自治州一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宣布蒙古自治州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这样矛盾就尖锐化了。有人不愿意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借故推拖。但自治州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这关键时刻，中央民委主任汪锋同志出面与达理札雅具体商定，蒙古自治州从1956年4月份与甘肃脱钩，正式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使内蒙古自治区由东到西实现了统一。

1956年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派

副主席王逸伦等同志，甘肃蒙古自治州派我和金巴图道尔吉、李树德等同志到兰州，用10天的时间与甘肃省委、省政府具体研究商定，从1956年4月1日起甘肃蒙古自治州正式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1956年4月1日晚10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李振华等同志向盟委会传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同志对巴盟工作的三条指示：

第一，搞好团结，包括与内蒙的团结，与额济纳旗的团结，盟委内部的团结，民族内部和各民族间的团结。

第二，搞好生产工作，主要是农牧业生产。

第三，稳定下来，要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和起义政策，做好上层人士和留用人员的工作。

甘肃蒙古自治州于4月4日至4月10日在巴音浩特召开第一届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甘肃省派副省长孙殿才等同志，内蒙古自治区派副主席哈丰阿等同志亲临指导，此次会议主要学习贯彻乌兰夫同志的“团结、生产、稳定”的三条指示。会议还增选了塔旺嘉布为自治州副州长，由此，巴彦淖尔盟的组建就正式完成了。国务院第2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宣布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改名巴彦淖尔盟（注：巴彦淖尔盟——巴彦，指巴音浩特，淖尔，指居延

海)。

州改盟后，州委书记李健同志调甘肃省委统战部任副部长，盟委书记由巴图巴根同志担任，副书记杨力生、云祥生。委员：巴图巴根、杨力生、云祥生、苏和、苏德保扎木素、岩峰、刘思孝、贺满堂、拉希桑布、宗廷州、吴学易、任翔。常委：巴图巴根、杨力生、云祥生、苏和、岩峰。

盟公署盟长：达理札雅兼任（当时达已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盟长：塔旺嘉布、云祥生、陈爱尔德尼巴图、杨力生。

（十）巴盟建立初期的工作开展情况 以及与河套行政区的合并过程

巴彦淖尔盟在原宁夏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工作，盟是成立起来了，但如何发展生产，进行建设，局限性很大，困难很多。正如王再天同志在给宁夏牧区参观团报告中所讲的：“我们蒙古族被大汉族主义一块一块地分割开来，以便他们统治、欺压、剥削，使我们走向贫困灭亡的道路。今天我们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东至兴安岭，西至居延海的蒙古族团结起来了，建设自己的家园，困难是很多的。内蒙古的革命是由东边闹起来的，如由

西边闹起来，今天东边也可能有个阿拉善、额济纳。现在西边比东边更困难些，我们要相互支援，尽快发展。”

王再天同志的讲话，对巴盟的干部和人民的启发很大，确实蒙古族自治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巴彦淖尔盟的成立，划归内蒙古，实现了统一的蒙古族自治，走向团结的大道，都是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实现的。巴盟的发展很需要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支援帮助，由东部调去的几十名蒙古族干部，几年来深入牧区辛勤工作，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特别是蒙古族见到本民族干部当家作主，担任党、政领导，心里格外高兴，这种心情我们汉族干部一时还体会不了。

巴彦淖尔盟的发展，在上层建筑方面固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是不难解决的。而这个地区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全盟面积24万平方公里，沙漠、戈壁占57%，十年九旱，年降雨量除贺兰山（山上年降雨400毫米上下，山边年降雨200毫米上下）区降雨多些，大部地区年降雨100毫米上下，而额济纳旗年降雨只50毫米上下。每隔二三年就遇旱灾，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特大旱灾，在旧社会逢到这样的特大旱灾，不仅牲畜大量死亡，人的性命也难保全，有的地

方一家人都饿死在蒙古包里，白骨累累，一片凄惨景象。

巴盟建立起来后，只辖两个旗，一个市，一个县。磴口县虽是农业区，但那时的耕地只有二十万亩，遇到大旱自顾不暇，又哪能去支援牧区呢！

这些困难，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了如指掌，早有考虑。1955年3月6日巴图巴根同志对杨力生说：“区党委负责同志早有打算，待铁路修到三盛公时（巴彦高勒）那里设个大站，工委（这时盟委还未成立）迁到三盛公，巴盟与河套行政区合并，农、牧业相互支持，困难问题就好解决了。”把年种年收，“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河套行政区与干旱荒漠地区的巴彦淖尔盟合并，成立新的巴彦淖尔盟，从根本上解决巴盟的落后面貌。自治区党委的这一远见卓识，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可是在酝酿过程中，有些上层人士怕合并后对自己不利，因而犹豫不决，一度采取拖的办法。后来形势发展很快，促使不愿合并的人也提出要合并了。巴盟盟委将这种趋势向区党委及时作了汇报，区党委指示，为了不影响团结，进一步做好工作，不要勉强，要用5年或更长的时间解决巴盟的问题。目前应抓好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时要把旧人员的改造工作赶上去。

盟委按照区党委慎重稳进的指导思想，部署和开展各项工作。恰在这时遇到了特大旱灾，牲畜由1243515头减到824260头，减少419000头。那时交通条件很差，在24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沙漠和戈壁面积占169000多平方公里，这么大的地方，面对特大灾情，眼看着牲畜一堆一堆死去，确实束手无策。据历史记载，甘肃西部地区自公元104年到1949年解放，近两千年发生旱灾252次，平均不到十年就要发生一次大的旱灾。宁夏近500年的气象资料，每十年就有一次大旱灾。巴盟毗连甘肃、宁夏，降雨量相比还要少些。

由以上资料可看出，巴盟这块地方单靠本身的力量发展是相当困难的。境内巴丹吉林沙漠四万平方公里，腾格里沙漠二万多平方公里，乌兰布和沙漠14000平方公里，还有戈壁地区冬季严寒夏季酷热，气候变化无常，降雨量多集中在七、八月间，其他时间常刮大风，牧业生产十分艰难。面对严酷的历史和眼前的特大旱灾，自治区党委于1957年9月16日果断地决定，巴盟与河套行政区尽快合并，以解决西部地区灾情和生产建设问题。盟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就此征求达理札雅意见，达欣然同意巴盟与河套合并。于是就开始了合并前的准备工作。

1958年3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巴彦淖尔盟、河套行政区、乌兰察布盟的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合并为巴彦淖尔盟。区党委立即组织合并的领导班子。党内河套地委书记郝平南、巴彦淖尔盟委书记巴图巴根、乌兰察布盟盟长关保负责。行政上成立了合并委员会，由达理札雅任主任，郝平南、巴图巴根任副主任，委员有何升岫、杨力生、王恩荫、塔旺嘉布、张学谦、贺满堂。

合并委员会成立后的任务：

（一）机构设置。

（二）人员编制。

（三）办公地址的基建等。

盟府设在巴彦高勒（原磴口县三盛公镇），自治区拨款五百万元营建办公大楼和家属宿舍。为了加速基建任务的进展，筹委会成立了基建领导小组，成员是：张学谦、贺满堂、王僧、查生全、李文钦、李辅臣、齐子儒。由张学谦、贺满堂负责，要求6月底完成营建任务，7月份盟委、盟公署搬迁新址办公。

合并委员会遇到的另一困难，是人员编制与人事安排。起义人员要安排，党的骨干力量要加强。在1958年5月12日陕坝合并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农林牧水办公室只编制22个人，处

长级干部就有11人；民政办公室编制6人，处长就有5人。几个地区的合并，需要安排的领导干部多。经过党内外反复讨论，还是从精简原则出发，说服党员干部带头让位，尽量安排非党干部。非党干部亦有觉悟，表示党组织怎么安排，他们都愉快地接受，不少干部正职降到副职，有的还下放到基层，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机构设置和干部安排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新巴彦淖尔盟的筹建工作是非常重视的。首先确定了盟委、盟公署的领导班子，盟委书记郝平南、副书记巴图巴根、刘健、杨力生、李向克、乔桂章。常务委员：郝平南、巴图巴根、刘健、杨力生、李向克、乔桂章、关保、郭全德、赵子文、岩峰、刘孔融、罗靖、陈时雨、李桂芳、肃兴书、弓志芳。

盟公署盟长仍由达理札雅兼任，副盟长关保、塔旺嘉布、杨力生、李向克、郭全德、弓志芳、陈爱尔德尼巴图、王恩荫、张学谦。

党、政领导核心的及早建立，使合并工作进展顺利。1958年7月21日新巴彦淖尔盟党政机关在巴彦高勒正式开始办公。7月24日在巴彦高勒召开了群众大会，庆祝新巴彦淖尔盟的成立。庆祝大会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哈丰阿、盟委书记郝平南、盟长达理札雅分别讲了话，强

调指出要团结起来，迎接大跃进的新任务。

（十一）新巴盟的工作情况

新的巴彦淖尔盟的成立，加强了民族团结，加速了生产建设的发展。现就新巴彦淖尔盟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几项工作简述于下：

1、团结方面的工作：几个地区合并在一起，首先是领导层的团结，几个地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合并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巴图巴根书记曾主持原巴盟盟委会议专题研究这个问题，并在干部大会上强调新巴盟成立后，要注意克服“特殊论”的观点。河套地委书记郝平南同志也在地委会议和干部大会上强调了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性，要求大家注意团结问题，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合并之后，在干部中一度出现过“老巴盟”、“原河套”之分。盟委认为这是个不好的苗头，及时由领导到群众，由党内到党外，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

为了加强盟委的领导，盟委书记处于7月28日确定了书记们的分工：

郝平南同志管全面工作，兼管统一战线工作。

巴图巴根同志分管农牧林水。

刘健同志分管党群、文教、卫生。

杨力生同志分管公署、工业、计划、财经。

乔桂章同志分管阿拉善旗、工业。

李向克同志因外出学习未分工。

各部门的领导已定，办事人员大都调齐，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巴盟、河套、乌盟在合并前，对合并过程中的工作接替，都做过具体安排，都召开过最后一次会议。原巴盟最后的一次会议是在7月16日召开的，会议由巴图巴根书记主持，再次强调团结问题。并宣布从7月18日起，原盟委停止办公，7月21日起新巴盟在巴彦高勒开始工作。这期间各部门都要把工作安排好，同志们在离开时要把办公室、宿舍打扫干净，门上的匙钥交给留守人员。我自己和大家同样按照盟委的决定，亲自将办公室和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

2、盟委会议研究，要尽快把经济建设抓起来。正式合并后的第五天，即7月25日召开了全盟计划会议，书记、盟长，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大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上由各方面的同志互相介绍情况，交流经验，使各级领导同志心中有了数。这次计划会议主要研究农林牧水，同时还研究了乌达矿务局的工作。

这次全盟计划会议，按照党中央“一切都需经过试验”的精神，盟旗各级领导，按分管口都要

有试验点。盟委的水稻、钢铁试验点设在巴彦高勒，会议期间同志们还去盟委水稻试验田里劳动半天。此举，引起大家对试验工作的重视，为工作少走弯路，作了准备。

3、几个地区合并在一起，领导同志在了解和掌握情况方面都有局限性。为此，盟委要求负责同志要分期地到自己没有工作过的地方去工作。8月20日，我首次和熟悉河套地区情况的李培荣、刘树义等同志到河套地区，由套西到套东，由农业区到牧区，还穿过阴山到明安乡，视察了洪水灾区。8月8日、9日一场大雨，昆都仑河洪水猛涨，据水文站的同志讲，有2500到3000个流量。单毛家圪堵和后口子，就冲垮了7000多亩水地（共有8100亩）。这场洪水淹死27人。8月14日我在昆都仑沟看到铁路被冲毁，铁轨拧成麻花。村干部段天祥同志为了保护群众，自己被洪水冲走了，村里的人很怀念，说他是党的好干部。水文站4个工作人员全被洪水冲走，只有工人李治同志（24岁）抱住一根木头，冲了五里多远才爬上岸来。据李治讲，8月8日下午六点，河里洪水约有1000多个流量，到了晚12点多，人和房屋、仪器等全被洪水冲走了！我们慰问了灾区人民和死难家属。群众感动地说，在旧社会，遭灾没人管，现在共产党、毛主席派干部

看望我们。我们这里是穷山恶水的干旱地区，下了大雨田地冲毁了，过日子真难，共产党能给我们找个治理办法就好了。我向中共乌拉特前旗旗委会汇报了人民群众的呼声，经旗委研究，对昆都仑河、海流图河、莫楞河，立即进行规划，要发动群众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变水害为水利。乌拉山前、山后百多个山洪沟，先治理山前的48个沟口。拟把明安乡的700户人家迁到西沙梁（河套水田地区），经请示盟委没有同意，让原地生产自救，为包头工业基地服务，从现在起就要创造条件。

盟委、盟公署领导和各部门负责同志都纷纷下到农区、牧区、工矿区工作。为了取得联系，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彼此在电话上常作联系。9月21日郝平南同志在五原县召开全盟电话会议，巴图巴根同志在杭锦后旗通过电话讲了话，强调各级干部要学习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的五次讲话，进一步发动群众，调动全盟百万人民的积极性，努力完成当年的各项生产任务。

4、万人上山建设乌达煤矿。乌达矿矿区约44平方公里，经初步探明，煤蕴藏量达七亿八千万吨，若年采1300万吨，可开采六十年。而该矿在1958年前仅有一处小煤窑，只有2百多工人。巴盟、河套合并之后，通力合作显示了力量。

1958年区党委派王再天、成枫涛、韩是今、张学儒等同志还有工程技术人员，亲临乌达矿区指导，决定土法上马，边生产，边建设。盟委一声令下，3日内从农村调来民工1万余人。民工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一人一把铁锹一张镐，3个人一张柳笆子，就地挖坑搭棚，埋锅造饭，不分昼夜，下井挖煤，群众的这种革命热情和干劲，真让人感动。盟委原定当年产煤50万吨，上报内蒙古后，乌兰夫书记亲笔改为80万吨，并要求包头大力支援乌达。盟委派杨力生、李向克等同志住在矿区做具体工作。郝平南、巴图巴根等同志也常去现场，解决问题，日采煤进度不断提高。11月1日，出现了日产煤13646吨的奇迹，当年完成了84万吨的采煤任务，受到了自治区的表扬。假若两地不合并，只靠原巴盟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这一艰巨任务的。那时原巴盟总共才3万人口，哪能调去万人，可见合并之可贵，合并起来，就有了力量，搞生产建设也易见成效。

5、向沙漠进军

巴盟与河套合并时，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杨植霖等同志亲临巴彦高勒考察，鉴于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等原因，确定新巴盟的办公地址，设在乌兰布和大沙漠的边沿——巴彦高勒。杨植霖书记讲过，盟府设在大沙漠边沿，面水背沙，这

就给你们提出了一个改造沙漠的艰巨任务。他还提到磴口县解放后，在沙边植树造林，封沙育草，防风固沙，造起的林带挡住了流沙，有很大成绩，巴盟和河套合并，向沙漠进军，改造沙漠，就更有力量和条件了。

杨植霖同志的讲话，盟委、盟公署非常重视。自合并之日起，设立了盟林业局和治沙综合试验站。在巴彦高勒旧地村西沙边建立一处防治沙漠化的试点，用飞机向沙漠里播种了沙蒿、拧条、花棒、梭梭等适宜于沙生植物61万亩。在旧地防风固沙林带里修建起敬老院、幼儿园，沙丘上种的梭梭长两三米高，老年人和小孩住到树林里，空气新鲜，养鸡、养鱼，生活得很好。到了春天桂香柳（沙枣）开花时，香飘四野。群众赞扬说：“东临黄河西靠沙，造林育草好办法，苦战九年黄龙伏，绿树丛中是人家。”旧地那时是一处很好的游览地方，成了沙漠边沿的一块绿洲。

这块小绿洲是磴口县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由林业模范武成功、佟秀珍等同志带动下造起的一段防风固沙林带。内蒙古党委书记乌兰夫、奎璧、杨植霖、王铎、王再天、王逸伦等同志，还有苏联治沙专家彼得洛夫等都去参观过。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于1959年专为磴口县308

华里防风固沙林带拍摄了纪录片《向沙漠进军》（上下两集。现场纪录片共5千米）。7月12日那天，内蒙古自治区治沙主任王再天与磴口县的林业模范常大拉、佟秀珍及五十多名五好青年团员、敬老院的老人、幼儿园的儿童们，在沙丘林带里拍摄了两小时。据回忆，那时王再天同志不愿去，他说我虽挂了内蒙古治沙主任的名，但没有在沙漠中做多少具体工作，窃取人家之成果为己扬名，是最不光彩的。如果一定让去可跑个龙套，与群众一起摆几个场面，但不能摆近镜头。

1958年11月6日国务院吕有佩和林业土壤研究所所长刘慎鄂等同志来到巴彦淖尔盟，视察了磴口县防风固沙林带和冬青梁农场等治沙重点地区。吕有佩同志指示：冬青梁农场建设在沙漠地区，应改为综合林场为好。国务院要抓治沙，科研机构就驻巴彦高勒，研究西北地区的沙漠化治理。

1959年3月18日，国务院从全国13所大学、中央的7个科研部门、内蒙古自治区治沙造林勘察设计院等单位共抽调五百多名技术骨干人员，由中国科学院治沙队队长陈道明和马义民、黄兆华等同志率领进驻巴彦高勒，开始深入乌兰布和、巴丹吉林等大沙漠地区进行考察。为了工作的需要，由盟委书记巴图巴根兼治沙队书记，杨

力生兼队长。

这个治沙队就是现在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前身。朱震达、江福利（已故）、刘映心、赵兴梁、黄兆华、王康富等治沙专家，都亲身参加治沙队工作。他们骑着骆驼深入沙区，横穿4万平方公里的巴丹吉林大沙漠，边行进边考察，那时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就在这艰苦的条件下，锻炼出了朱震达式的科学治沙专家。朱震达现任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所长，学位研究员，为中国治理沙漠化作出了贡献。

1959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巴盟投资治沙经费六百万元。并由王再天书记亲自挂帅，建立治沙机构，明确提出治理沙漠化，要“党委领导，政治挂帅，全党全民动员，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治理，依靠群众为主，结合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帮助，以种树种草，封沙育林，封沙育草为主，结合六中小型的工程措施，普遍治理与重点治理相结合；保护巩固现有植被与向沙漠大量造林种草相结合。”盟委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在全盟设立了六十处治沙造林机构，职工两千七百多人，将黄河水引进乌兰布和沙漠（即今日巴盟一千渠）。据1959年统计，全盟造防护林120余万亩。从磴口县的二十里柳子到杭锦后旗太阳庙，从南到北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防

沙林带，确实起到了防风固沙作用。沿乌加河的林带，在永胜公社就有几十里长，生长的也相当茂盛。

五原塔尔湖公社在沙丘上埋杆造林18万株，成活率达90%。1957年大旱时，磴口县那条防风固沙林带，除磴口县境内的牲畜在林带放牧外，还容纳了伊盟和阿拉善旗的5万多头牲畜。由此人民见到防风固沙造林，封沙育草，轮封轮牧的显著成就。进而在全盟范围内掀起了种树种草的高潮，为防治沙漠化，发展畜牧业创造了条件。

6、兴建三盛公黄河枢纽工程

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是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重点工程，是河套灌区的命脉。按一首制设计，可以引黄河水5百至6百个流量，足可浇地1717万亩，它关系巴彦淖尔盟的千年大计，是河套地区各族人民多少年来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情。

在旧社会，绥远省政府着手兴建黄羊闸水利工程（现在总干渠的一闸），到1949年解放时，黄羊闸工地，只堆起一堆白茨。解放后，由1950年5月正式开工，于1952年5月10日竣工，完成土石方3百多万方，浇筑混凝土8千立方，用日工138万个，总投资360万元。同时把黄羊闸改名解放闸。此一工程采用平口引水只能浇河套西部地区

的280万亩土地。1953年黄河枯水时，只有2百多个流量，解放闸在黄河里仍然引不来水。磴口县全县动员3千民工，在20里柳子黄河套河筑坝，引进10多个流量的水，勉强浇了麦苗。

黄河唯富一套的地区，解放前，八大渠口全从黄河平口引水，河水大了浇地，水小了浇不上地。对此历史现状，党和国家深有所虑，水电部几位正副部长亲临河套视察，内蒙古自治区也十分重视，所以决定投资5000万元（实支：4273万元），兴建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该工程于1959年9月正式破土动工，于1961年5月13日合龙。在拦河闸上还建成黄河流经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第一座一级公路桥，结束了历史上包兰公路在此渡河的困难。现代化的设备，按一下电钮，1万2千斤重的闸门起闭机就自动升降。劳动人民看了相当的高兴，说他们过去引黄河水浇地是用汗水和生命换来的，现在按一下电钮，水就进来了，共产党真伟大。

黄河枢纽工程在施工中遇到了很多困难，而勤劳智慧的河套人民，硬是用土办法在波涛汹涌、水流湍急的河流中筑起了大坝。在大坝合龙前，工程指挥部讨论要多少汽车，要运多少三角石，讨论结果，还是采纳了河套人民的土办法，用粘土、草秸和绳、石头等卷成埽棒，由100多

人从立坡上拉到河水里，还有一部分埽棒是用大木船装载上，运到河中心再投入水中，说起来真是神奇，当时，就是用这个土办法将几百个流量的黄河巨龙拦住，把河水导流进拦河闸内。

1961年正是国家的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粮食短缺，工地吃不到蔬菜和肉食，一度还吃稻稗子糠，许多人得了便秘病。就这样的生活，全体建设者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的乐观精神，克服了困难，日夜施工，直到胜利。

当时领导的重视，各级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努力是胜利的关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把决定修建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当成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提到区党委议事日程。区党委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同志说过：“修建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是关系到解决内蒙古吃饭问题的大事。”要各部门大力支援。区党委还成立了3人领导小组，由王铎、高增培、权星垣具体抓此项工程。巴盟盟委相应成立5人领导小组，以杨力生、李直（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何承岫（工程局局长）、云祥生（工程局党委书记）、李桂芳（巴盟副盟长）住工程工地具体领导。在大坝合龙时，王铎同志亲临现场指挥。河套劳动人民为此项工程曾经出动2万8千民工，拦河闸上，上万人苦战了3年方取得了如此宏伟的胜利。

三盛公黄河枢纽工程的建成，结束了千百年来河套地区平口引黄灌溉的困难，使黄河唯富一套的地区名符其实。年种年收，旱涝保收的河套地区，变成了塞上江南。

米仓县经济、教育 工作概况忆述

王直科

撰稿

张启高 张世杰 田永旺 整理

米仓县于1942年设置，1953年9月撤销，是傅作义先生在河套推行新县制的产物。其间，该县在解放前经历7年，解放后又经历了5年，它在河套地区存在过约12年。

米仓县所辖地区是，把原临河县的四区和三区的一部分划出来所构成。其地理位置大致是：南起原磴口县和杭锦旗的北界。北抵阴山角下的魏柜湾和西补隆一带，东毗原临河县的太成乡和太乐乡西界，西至王爷地即乌兰布和沙漠东端。全县面积约二千平方公里，人口约7.6万人。当时，为了纪念境内杨家河的开挖者杨米仓，被命名为米仓县。

笔者曾在米仓县担任经济、农林、建设等科科长，对米仓县的各方面情况都比较了解。近

年来，笔者撰写了回忆米仓县的文史资料40多篇，共约14万字。按照文史资料专题化、系统化的要求，概括整理如下：

一、土地情况

米仓县的土地，原为伊克昭盟杭锦旗与乌兰察布盟的西公旗（今乌拉特前旗）的土地。光绪28（1902）年，清廷派贻谷督办晋边垦务时，便将这部分土地列为报垦、放垦和开垦的对象。从此，汉人纷至沓来，逐年增多，土地也随之阡陌纵横了。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在米仓县土地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即：

（一）公田地租制度。当年在放垦、开垦河套地区蒙地时，大片的草荒地，都被地商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去。那时计算买地亩数的办法，是采取手指计地或跑马数步计地的两种办法。由于方法简单落后，致使地商大得好处，被他们无偿占用了大量土地。

抗战时，绥远省政府迁到陕坝。省地政局根据国民政府“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采取“整理地籍，清丈余地，铲高垫低”的办法，进行了土地整顿，清丈了土地。清丈时，经过平板测量，对土地都绘制了图籍，编制了丘号，除确系私人付价买地的部分外，将多余的土地宣布归公，叫做

公田。

米仓县的公田分布较广，在全县18个乡、一个镇中，仅新中乡、新乐乡、平定乡、新成乡、平理乡、新和乡、平政乡、平章乡、平教乡、平和乡、平西乡等11个乡，就有公田3000顷之多。其中以新中乡、平教乡、新乐乡、平章乡的数量为最多。就拿新乐乡来说，该乡就有普通公田（县公田）144顷，乡公田和校公田30顷。在这部分公田中，上等土地占六分之一，中等土地占六分之二，下等土地占六分之三。所有的公田，除租给本乡农民租种外，还要分拨给没有公田的乡和学校一部分。如在新乐乡，就有平化乡的乡公田10顷，新乐学校和新隆镇小学校的公田10顷。学校的公田，主要是收取租粮，用来补助教育经费。

不过，农民们在租种公田后，不但收不到好处，反而给自身带来苦难。原因是，从1937年实行放租公田以来，贫苦农民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怀着极大的希望，争着挂租公田。但是，在租种公田中，大、中、小地主和官僚阶级们，凭借着手中的权势，把大量的上等地、中等地登记认租，挂为己有，并勾结官府把下等公田换成上等公田。让贫苦农民认租名誉上的上等公田（实际是下等公田），这样一来，农民挂租了50%的下

等地，却要负担上等公田的田赋、水费和公、征、购粮以及地租。结果是肥了地主，害了农民。

公田的地租是以小麦计算的，每亩年租上等地三升半，中等地二升，下等地一升。当时，在繁重的赋税、征、购粮和地租的盘剥下，辛勤劳动一年的农民，到头来，不仅没有收益，反而负债累累，以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甚至还会出现卖儿卖女的悲惨现象。更令人气愤的是，公田已成为沉重的枷锁，紧紧套在农民的脖子上，因为农民想退租公田，官府还不准退。这种情况，当时民间有两句顺口溜来形容道：“挂租容易退地难，粮政时期逃躲难”。

这种侵害农民利益的公田地租制度，一直延续了不少年，及至1949年解放后，才告结束。

（二）土地代营制度。米仓县境内有一条杨家河，这是在1916年，由大地主杨米仓经营开挖的大渠。在杨家河以西，有杭锦旗王爷的土地约1000多顷（按丈青数字计算，实有土地为1500余顷）。这些土地，从1924年起便由大地主杨米仓、杨满仓及其子侄杨茂林、杨春林、杨文林、杨泽林等包租经营。在杨家包租的土地中，除自己雇工耕种一部分外，其余大部都转租出去，对农民进行剥削。全年可收租粮5000多石（每石300斤）。这些租粮，杨家除向杭锦旗王爷交纳

地租约2000石外，其余全归杨家所有。

除此以外，有的人还把自己从杨家租来的土地，又转租给农民耕种，自己从中进行地租剥削，成为二地主。

当时，农民租种土地的形式多种多样，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对半分成，对半负担公粮、税收；第二种，四六分成，谁分到六成，谁就负担公粮、税收；第三种，三七分成不带害。这就是农民只分三成，不负担公粮、税收及地租；第四种，按地亩数，每亩地年出租粮一至三斗；第五种，按地亩，每顷地年交租金银元20元至30元；第六种，叫做“摸龙头”的地租，这是一种可怕的剥削形式。它比买地价钱低，但比地租要多出数十倍。出租人把地转让给农民，每亩收小麦二至三斗。

杨米仓就是靠这样的剥削起家的，一直延续了20年之久。

1939年，傅作义将军进驻河套后，为了发展生产，解决军需民食，增加收入起见，他在1941年下令取缔了这种包租、转租的剥削行为，将在米仓县境内杨米仓包租的杭锦旗的土地和剥台庙、勾心庙的庙地，全部改由政府接管包租，并成立了绥远省米仓县合作代管处，专门管理这部分土地。从而，结束了杨家对农民的剥削。

合作代营处设主任一人。此职先后由张锦明、李树茂、刁国栋、张守斋、王兴德等人担任。主任下设总务、业务两个股。总务股长先后由张义、任步鳌担任；业务股长先后由武功、张元厚担任。此外，代营处还向每乡派出指导员一人，负责征收地租。各乡向代营处选派绅士一名，组成评议委员会，负责监督该处的工作。代营处自己还办有一个农场，场内设有油坊、粉坊以及其它各种加工作坊等。

代营处除经营农场的土地外，还征收1200多顷代营土地的地租。每年收取租粮为3600余石。其中除交杭锦旗王爷租粮2000石左右，庙地租粮300~400石外，尚能剩余地租1200余石。这些租粮全部由代营处掌握开支，用于消费。

二、农牧林水情况

（一）农业生产

河套素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美称。但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当局并不关心农业生产，也不关注人民的生活。以致农业产量不高，农民生活困难。尤其在抗战时期，大军云集河套，农民的生活困难更为严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他们横征暴敛，抓兵拉伕，使农业生产处于瘫痪状态：

1、土地荒芜。造成土地荒芜的主要原因有：首先，由于青壮年劳动力被抓兵，种地缺乏劳力，致使大量的耕地无人经营变为荒田；其次，很多的地主靠雇工经营土地，由于工资低，待遇不好，因之，给地主种地的雇工不多；再次，在农村中出现了轮歇地，由于雇工少和怠工等原因，地主只好每年轮流荒芜一部分土地，作为轮歇地，复次，小户人家因缺乏劳力和耕畜，只有听任耕地荒芜。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当时在米仓县被荒芜的土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

2、经营粗放、管理不善。因劳力不足，粗耘滥种，保苗率不高。只有少数农户在青苗时，锄一锄草，大多数农户根本不锄田，也很少施肥，不知选育良种，科学种田。

当时，农民播种的农作物种类很多，总的说来，夏秋庄稼样样都有。如：小麦、莞豆、禾禾、扁豆、糜子、黍子、玉米、豇豆、红豆、绿豆、胡麻、荞麦、山药、蓖麻、谷子等各种农作物。其中：小麦约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糜黍约占百分之二十，莞豆约占百分之十，其它作物约占百分之三十。

尽管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很多，但产量颇低，在一般年景下，夏秋季作物混合平均单产约100

斤。至于个别经营好的农户，亩产平均也只有120斤左右。为什么产量那样低呢？主要是当时农民种地没有高产的条件和措施，再就是高产作物种的少。又因分散居住的农民什么作物都种，尤其是秋茬禾种得多，所以产量就不高。

3、供水满足不了农业的需要。水利是农业的血脉，但在当时米仓县地区的水利不能与农业配套。如：头一年的茬子地本来需要淌水，当年翻过的耕地也需要淌水，为次年种小麦打好基础，但因渠道上不去水，浇不成地，以致耽误了播种时间，影响了产量。这种情况，全县每年都有。如：1947年，在现杭锦后旗南渠乡（原新乐乡的八个保），1948年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的小麦没有长成，改种了糜子，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当时报灾批不准，催征秋季公粮，又急如星火，农民走投无路，叫苦连天！这个例子是属于大面积的情况。至于各乡，局部的这类情况，在当时来说，是极多、极广比较平常的事。所有这些淌青苗不及时，淌水制度混乱，上下游抢水等现象都是水利与农业生产不配套造成的。

4、无力防御自然灾害。在米仓县境内，各种自然灾害非常严重，它不断地侵袭着农业生产，农民无力防御。当时经常发生的主要灾害有风灾：受其影响的是，沿阴山山脉附近的平教、

平化、新教（现沙海乡境内）、平西、平定（现太阳庙乡境内）、平城（现大树湾乡境内）、平治（现召庙乡境内）各乡。这些乡的农田，有的在山口，有的靠近山口，每当春季风多风大。在刮风期间，飞沙走石，尘土弥漫，刚出土的禾苗，有的被打死，打伤，有的还被沙土覆盖，造成灾害。旱灾：河套为水利灌区，本不应有旱情的存在，但由于有的渠道水位低，春水淌不上去，禾苗浇不上水，就发生旱灾。全县每年有不少的地方，由于受旱得不到收益。水灾：水灾是当时农业的最大敌人。那时黄河进水口没有根本性的控制闸口，每逢伏汛期水位上涨，因无制约水量进口的设备，大水滔滔涌入各渠形成了水大渠小，渠背决口，造成水灾。在灾区，农田成了一片汪洋，房屋被淹，交通中断，有时还会出现人身伤亡的事件。全县每年决口二、三十处，被淹土地在几百顷至几千顷之间。如：1947年在新乐乡（现南渠乡）沙沟石云湾段决口一处，淹没田禾三万亩，这是杨家河灌域发生的事故。1948年夏季，黄济渠三大股灌域，也在这个乡决口一处，淹地一万亩，乡公所、中心学校都被淹坏，民房也损坏很多。虫灾：比起各种灾害来，在农业上，虫灾还是较小的灾害。这只是因为它发生的次数少，范围小，为害较轻而言，但一经大规模

的发生，农民束手无策，任其肆虐而已。如1948年至1949年，有些乡莞豆生了油汗，但因当时既无农药杀虫，也无喷射机械，只好听之任之，结果造成全县莞豆普遍没有收成。

5、播种寄籽小麦的教训。1948年时，绥远省政府发布了一项在河套各县开展播种寄籽小麦的命令。理由是，播种寄籽小麦：（1）可以调节农民们的忙闲，使之闲季不闲；（2）提前小麦的收割期，可解决农民青黄不接时的吃粮问题；（3）换茬后，可以播种又一茬的秋季作物。如晚谷、秋菜等等，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关于播种寄籽小麦的具体要求，都和播种春小麦一样，其不同处，在于播种的季节上。播种寄籽小麦的时间，限定在农历十月地皮封冻的时候，并且不能叫籽种发芽。在种植亩数上，虽未限量，允许适当播种，但不能不种。

对于播种寄籽小麦工作，政府抓得很紧，催得很严，但农民对此却无动于衷。富有经验的老农认为，在河套地区根本不能种植寄籽小麦。因为寄籽小麦在口里叫作：“抱石小麦”，意思是：“抱住，每亩打一石，抱不住，连根烂（赔进去籽种）”。因此，对播种寄籽小麦抱有抵触情绪。但在县政府的强迫命令下，全县也播种了1000多亩。由于数字少，县上怕不好交差，只能

以今年试种，来年多种为借口，向上交了差。

及至初冬来临，农民种进寄籽小麦后，便发生了许多问题：有的麦种发了芽，苗子被严寒冻死；有的因覆土少，经过一冬春的风刮，麦种裸露出来；有的籽种被鸟类和羊只刨食；有的麦种霉坏，出不来苗；更有的因下种量少（每亩约15—16斤），苗出不全。由于问题太多，农民一气之下，全部改种了别种作物。至于留下来的为数很少的寄籽小麦，其产量甚微，比原来的籽种稍多一点而已。

（二）畜牧业生产

米仓县在解放前至解放初，境内已有杨家河、乌拉河、黄济渠三大灌渠，支渠和子渠纵横全县，这就为牧草的生长、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1、畜牧行政领导机构

从建县一直到解放初，这个县始终没有建立过专门的畜牧职能机构，畜牧业生产只是归县政府的建设科主管；而且，建设科对畜牧、兽医、牧草管理从未有过具体的规划和管理措施，上级对此也没有专款信贷和支援畜牧业发展的投资。每年，主管部门只是统计一下数字，向上级汇报就算了事。

2、草源状况

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有着丰富的草原，也是过去蒙民逐水草而牧的最好基地。内地汉人来此开垦务农。最早也是以“西场”（现二道桥乡境内）为主。他们虽然以农为主，但是因为地广草多，畜牧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比较好的草场有芦草圪卜（现四支乡）、沿阴山脚下的魏桓湾、牛场湾、义太魁（现沙海乡）附近、平西乡（现大树湾乡）、平定乡（现太阳庙乡），还有六官府（现查干乡）、二道桥乡、头道桥乡等地。黄河乡境内也有成千上万亩长着各种野草的牧场。就是在解放前人口比较稠密的南渠乡（原新乐、新城、新化乡）、小召乡（原平理乡）、二道桥乡（原平政乡）等地，虽然耕地多、荒地少，但也不缺牧草。象热水圪卜、水桐树湾、沙沟河沿岸的退水处、小海子附近、大小灌渠的两岸、被水淹过的地方都生长着丰茂的杂草。牲畜在其中吃草人很不容易发现，真是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3、牲畜状况

米仓设县期间，大畜主要有骆驼、牛、马、驴、骡等，小畜主要有猪、羊等。此外，还有鸡、鸭等家禽。这些牲畜都是土种。其中牛较多，约占大畜的40%左右，主要是役用。

猪虽然为数不少，但比现在则不过半数而

已。当时，每乡约有二三十户人家养有母猪，所产仔猪不但可满足本县需要，还供给邻近旗县。

羊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养有羊。地富（全县共有400多家）差不多户户都有几十只到上100只左右。但由于接羔期管理不善，成活率仅达70%。据统计，1948年的产羔率仅达50%左右，主要是因为当时一无暖圈，二是降雪量大，导致三分之二的小羔死亡。

4、牲畜的饲养管理和发展状况

牲畜主要以放牧为主，家养为辅。凡非农业役用大畜全部野牧，农业役用畜在生产期间不跟畜群，实行家养。

1948年—1949年，在河套地区出现了一股偷马风。因为象别动队这样的骑兵部队，只招募有马的人当兵，谁带人带马就能当官。一些人为了当官就偷马，这期间米仓人民就被偷去不少马匹。所以，这时出现了马腿上锁，好马晚上专人看管等特殊情况。

米仓县在解放前根本没有专门的兽医机构，只有一些乡医和游医，医疗水平不高，误诊现象时有发生，牲畜死亡的很多。

抗日战争时期，牲畜和畜产品无人收购，甚至低价也卖不出去。严重地挫伤了米仓人民的养畜积极性，畜牧业发展遭到了极大的影响。

1946—1949年，牲畜和畜产品又能销往平、津等地，同时牲畜的价格也有上涨（如一匹上中等马可卖小麦十几石，一头牛可卖麦子4—5石）。农民得到了养畜的利益，尽管1947—1949年间政府向养羊户征收皮毛，但并没有影响养畜的积极性，这期间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49年10月—1950年4月：绥远和平起义后，地、富及官僚阶层怕共产党没收财产，竞相出卖大、小牲畜，一些中等户和贫困户受坏人的蛊惑，也卖掉了自己的生产用畜。

由于供过于求，畜价大跌，不久，一些老区，如山西、绥东、陕北、察北等地区的人民政府，为恢复生产，携带证明前来购买大量大畜（牛、马、驴、骡）。同时这些地区的小贩也倒买倒卖，这样，米仓县的牲畜大量流向外地；加之，1950年春季山湾一带（现四支乡、沙海乡）聚集了几股土匪（主要是张德彦、张疤子、王如意等）。这些匪徒时常抢劫农民的牲畜，使牲畜锐减。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畜牧业生产，强调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 1、指示各乡发动群众打割秋草，储备冬春两季的牧草。群众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不再把田禾当柴烧，而是储备起来做牧草。当年共计打储

牧草300万斤（6000车），保证了大小畜安全过冬。

2、发动群众做好保育工作。县里派干部下乡宣传：过冬要加喂饲料，保证幼畜的成活率，未经政府批准不得随意宰杀牲畜。由于宣传得力，小羊的成活率由历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一般耕畜的膘情也较往年好。

3、下达各项指标。县政府要求：所有大母畜一律不准空胎，成活率达到98%；羊的产羔率要达到90%，成活率要达80%。（山羊85%，绵羊75%）；要求每户养一口肉猪，中等户还要养一口母猪，除满足本县需求外，争取向外地出售猪仔和猪肉。这项工作，在当年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4、调查整理了治疗牲畜常见病的偏方和土法。1950年6月，省政府指示各地尽快调查整理出治疗牲畜常见病的偏方和土法。米仓县人民政府接到指示后，立即指定专人分两个区点（县东片，县西片），进行调查整理工作。当时主要是采取请教土医、走访养殖户、召开农牧民座谈会等措施，调查整理了本地牲畜常见的十七种病的治疗方法。县里针对当地缺医少药的情况，及时推广了各种治疗方法，起到了一些补救作用。

由于上级部门和当地政府的重视，米仓县的

畜牧事业很快有了新的发展。

(三) 林业生产

解放前，米仓县基本上无林、少林。当时在全县范围内，除丰盛堂地主武治忠有一片树园，新乐乡（现南渠）地主贺二、刘三虎、訾秉义有零星树木和树园外，其它农村都没有树木，风沙滚滚，一片荒凉。

那时，各级政府每年春季下达文件，提倡植树造林，但那不过是一纸空文。下边不执行，上边也不检查。有少数人性喜造林，年年栽植些零星树木。但缺少护林措施。多数被牲畜啃食，成活的很少。

解放后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把发展林业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1、搞好宣传动员工作

县领导亲自挂帅，在各种会议上大讲特讲林业工作的重要性，如在扩大的干部会议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都作了专题报告，交待了党的林业政策。所有与会干部、代表，经过认真讨论、分析，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工作组同志也深入农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本年开展植树造林打下了思想基础。

2、解决了植树造林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当时存在的严重困难是缺少树地。县委、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在不影响农耕的前提下，凡大小渠旁、道路两旁、空地、洼地、沙滩等处均可植树，谁栽归谁，大大激发了群众植树的积极性。

县政府对种苗统一规定了价格，提倡人民互济互助、赠送树苗光荣等好风尚，并且规定大树杆、小树杆兼用。

3、明确了任务

县政府规定：不论干部、居民每人必须栽树两株，必须做到保栽、保活。全县当时总人口为76,000口，总植树任务为150,000株，要求机关单位所有干部、党团员在造林运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争取打好打胜春季造林这一仗。

在1950年春季造林中，短短几天时间内，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林热潮。全县人民一条心，男女老少齐动手，栽了柳、榆树种共计完成了高、中、低树苗372,000株，不仅完成了当年任务，而且超额一倍以上。成活率达到70%以上，名列全省第二，受到省政府的嘉奖。

（四）水利建设

1、解放前后的黄济渠

黄济渠原名黄土拉亥河，是一条满清后期遗

留下来的天然沟道形成的蛇形渠道，全长约140余里，是河套八大干渠之一。黄济渠本身弯曲，渠路低洼，流速缓慢，沿线农民就利用这一特点来开渠灌溉，中小渠道密如蛛网。沿河两岸受益土地达十几万亩。该渠刚形成时进水充足，后来由于黄河主流南移、黄济渠两岸的中小渠道失修、渠口淤塞等原因，导致进水不畅，灌溉面积减少。1940年后的几年中，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农民对此非常不满。1943年改黄土拉亥河水利社为黄管局，任绥远省驻陕坝政委冯福泽为局长。此后黄管局对缺水现象十分重视，并向上级水利部门和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请示，派士兵2000多名。军民一齐动手从高兴兴圪旦开始至滥王贵村的米临交界处另开进水口，向水源充足的杨家河大渠引水灌溉，这样既解决了黄济渠水源不足的问题又消除了杨家河水大成灾的隐患。

黄济渠当初的灌域主要是临河县。1942年实行新县制后，又在老临河县的基础上分出了米仓县、狼山县、陕坝（筹备市）。随之黄济渠的归属和负担也起了相应的变化，给养护、防汛带来一些不利因素。象每年春季的挖渠任务就不能按期完成，灌域内的地头蛇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多种地少负担，同时也不按制度灌溉，想什么时候灌就什么时候灌，而穷苦农民却种地淌不上水，

还要负担大部分防护工作。造成了只顾淌水不挖渠，渠口堵塞进水不畅，农作物减产。同时还有渠背决口成灾的现象。米仓县当时是主要灌域之一，县东部分乡，象平理乡（现小召）、新乐乡（现南渠）、新中乡（现四支乡）都是该渠的灌区，年年只受水害得不到水利。如1948年春季因没及时淌上水，新乐乡没种成小麦，种了糜谷而欠产。1948—1949年伏汛大水期，新乐乡段的几处渠背决口，半个乡被淹成了泽国，良田被淹，农舍倒塌，乡公所、中心学校也被淹坏，连米陕公路也中断了半年之久，整个黄济渠灌区呈现了凄惨景象。

1950年党号召大闹生产，发展农业。农业与水利的配套发展已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绥西专署也成立了水利局，任冯福泽为局长（同时兼任黄管局长）。同年3月中旬，在陕坝黄管局召开了第一次水利工作人员扩大会议，与会人员由原来的局内工作人员和各县灌区的民选委员扩大到了米、狼、临、陕四县（市）的主管水利工作人员。这次会议主要听取了各负责人的汇报。针对汇报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冯局长对黄济渠存在的积弊，提出了当年工程所需土方，以及筑好各闸箱的要求。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过去水利工作之所以落后是由于领导不

重视，群众不支持的结果。邢专员在会上也做了重要讲话，并在会上宣布米、狼、临、陕各县（市）政府的建设科长都兼任水利局副局长，并主管黄济渠在本县灌域的一切事务。

4月下旬又由冯福泽局长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水利工作人员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听取了各灌域负责人汇报的水利工程完成情况，同时也听取了水利局负责做的工程检查情况汇报。主要领导及与会同志对米、狼两县的工程完成情况表示满意。会议还就今后的用水制度和管护制度做了进一步的讨论。最后决定用水制度必须做到各灌域受益均匀：第一次口轮稍，第二次稍轮口，第三次腰段先淌，依次向后口淌。

2、水患变水利

米仓县地处河套黄灌区的最上游。米仓县境内有乌拉河、杨家河、黄济渠三大主渠，2000多条与此相关联的支渠、支子渠、毛渠纵横全县。这确实给米仓县的用水提供了方便条件，但同时也给米仓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水患。

历史年代里，米仓县人民因水患流漓颠沛、饥寒交迫的现象不断发生。即使米仓建县后到1949年，虽然为根治水患投了不少资。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水患局面。1949年前共修筑过十多处大闸，其中有：杨家河屯垦闸、头闸、二闸、

小沙沟闸、蛮会退水闸、三淖口闸、机缘口闸、陕坝渠口闸、杨家河稍正闸；此外，还有乌拉河口闸、白脑包口闸、天生壕闸、乌拉河闸、两义和闸等五处小闸，这些大小闸口都是用柴草做成。小闸口一般用柴20—30万市斤，用人工1000个以上，最大的闸箱竟用柴100万市斤，用人工25000个。每年在杨家河中游的沙沟渠加背固堤用12万个土方。这些费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种地农民负担的，记得比较清晰的是每年向人民征收水费粮（糜子）2500—3000绥石。还派80名巡渠工防护，防止渠道决口。竟管如此，水患还时有发生，有时一天竟有几处报警，要求抢堵决口。每次决口淹地少则百亩以上，多则万亩左右。还有民房倒塌，人畜伤亡，损失惨重。如1942年乌拉河灌域天生壕北一次决口，淹地竟两万亩之多，瓦窑滩一带积水一丈多深，决口一时没堵住流了几十天水，在堵口过程中还淹死一名老渠工张成仁。1949年汛期，沙沟段石云湾决口一处淹地三万亩。在黄济渠灌域内决口事故也不断发生，如1948年夏季在三大股渠决口一处，淹小麦地顷余，倒塌民房数间，淹毁原新乐乡公所及该乡中心学校机关，淹毁办公室、教室、寝室达40—50间之多。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淹地约三万亩，就以每亩200市斤计算，约合6百万斤。其灾害程

度也是令人吃惊的。

1950年春，党号召各族人民大闹生产，河套地区也和全国一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三月间，陕坝专署首先召开了米、狼、临、陕四县（镇）人民政府建设科长会议，专题传达和讨论了有关水利的大事。专区水利局长冯福泽主持了这次会议，专员邢情魁出席了会议。会议之后，米仓县随即召集了有关科局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听取了水利工作的汇报，了解了水利工作中的一些积弊。县委、县政府对水利工作极为重视，经决定由人民政府出面成立县水利管理委员会，县长刘惠之担任主任委员，副县长蔡子萍为副主任委员，有关科局负责人陈祖良、王直科、王殿元、徐澄等为委员，还特聘省人民政府在套水利顾问贾八宝（水利土专家）为委员。该会成立后，在全县开展了工作，并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如在渠道管理、工程施工、灌溉制度、防汛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些有关水利的大事，在历次扩干会议、各界代表会议上，都作为主题大讲特讲，并交付大会充分讨论，当时广大农民高兴地赞许道：“这才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管理水利。”

50年6月又召开了第三次防汛会议，集中讨论了伏汛大水期间的防汛措施：

(1) 凡本灌区的男性农民，16岁以上者均编为防汛队员。以乡为单位组编大、中、小队。小队为十人，大、中队管小队若干个，大、中小队长均为热心公益事业有防汛经验的人担任。

(2) 防汛以乡为单位，由乡公所(区)统一领导。各防汛队分渠、分段防护，责任落实到每个人头上。

(3) 在防汛期间，要轮流防看，日夜查巡。

(4) 对大渠背的险要处，必须指定专职渠工加强防护工作，还要准备一些必要的柴、草以应不测。

经过三次会议，对黄济渠的工程、防护、用水等制度，做了较为科学的规定，使得黄管局的工作在总体上有了明显的进展。在灌域内的各县，农作物用水有了根本保证，小麦普遍淌过2—3水。渠背的加宽，渠的洗底也都如期完成。鉴于当时的形势，地、富、豪绅基本上也能按时完成自己的实际负担任务。这样，管好黄济渠已不只是管理局的任务了，灌域内的男女老少基本都有此责。

水管会为把防汛工作落到实处，彻底根除水患，同年4月又成立了防汛指挥部，专门负责防汛工作。经研究决定由县委书记赵歧担任指挥部

政委，县长刘惠之为指挥官，陈祖良、王直科为副指挥官，蔡子萍、王殿元、徐澄等同志为委员。指挥部由上至下成立了一系列防汛组织，四个区指挥所就是其中的一种。记得四个区的区长李通孝、孙培年、刘锡纯、田桂生分别为四个区指挥所的所长。各村、社凡50岁以下16岁以上者都编为防汛队，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防汛工作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年，米仓县就没有发生决口，也没有受到其他水害。

县委、县政府还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如下一些规定：

(1) 在防汛期间，电话室要昼夜值班，轮流看护；

(2) 要派专人2名，负责头道桥黄河左岸水位的测量，并每日登记向县水利局作汇报；

(3) 水利、建设两科领导，要经常碰头交流情况，有重要事项及时向县领导汇报。

(4) 水利工程由水利局按巡渠人数、渠道长短、分人定段施工，并由水利局负责验收。

(5) 各干渠的防汛工作由水利局分段定人巡渠，责任到人。

(6) 发现渠道决口即由指挥部发布命令，发动群众用柴草等物抢险，任何人不得借故拖延。抢险工作中的一切事务均按军事行动对

待。

(7) 对各大、中、小渠道开口淌水，必须做到亲自交接，以防不测。

(8) 任何人发现渠道或渠背泄水，又来不及报告，可立即设法堵住，所用物资政府如数偿还，并开会奖励。

这些措施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领导的重视，群众不辞劳苦的努力，这一年保证了全县44万亩可耕地的顺利用水，40%的小麦淌过两水，部分地段还淌了三水，使当年的小麦长势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想不到在农历5月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害，全县小麦发生了“黄疸病”（又叫“黄锈病”）。当时，对这种灾害没有丝毫办法，只好看着小麦一天天受灾。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农民在收过病麦的地上抢种秋谷迟糜。由于供水及时、霜期稍迟，当年的秋田竟获得了丰收。

1950年，是米仓县水患变水利的一年。

三、粮食工作简况

1939年以前，河套地区农民“种地纳粮”的任务并不重。1939年傅作义部队进驻后套，军、政人员的大量涌入，原来征的粮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又增加了征借、征购公粮等项。其实“征

借”、“征购”从未还兑，农民称作统计粮。

（一）两个粮食机构的产生

1、田粮科，设科长1人，主任科员1人，业务科员2人，办事员、雇员2—3人。

田粮科下设仓库3—4所。仓库保管员都是由地主大户充任。会计由保管聘请。在公粮入库时还由保管员请用1—2个过秤员。这些人每年一般由公家补助粮食2—3级石，有时也以布代粮。保管员的任期一般为一年，表现好的经群众选举可连任。象小召的王建元，现南渠的袁林贵等就是数年连任。

田粮科主管军用公粮。如田赋粮、征购公粮、征借公粮、军用马料公粮等项，都属田粮科管理。军粮出库时都规定有一定比例的消耗粮，可报注销。军用公粮多是次年春、夏两季交付清。调运军粮必须由省政府开具调粮证，县政府组织车辆，由田粮科组织运输队，工作人员再押送到园子渠、高兴兴圪旦两个渡口，最后装船运往绥、包，年年如此。

2、财政科是常设机构。设科长1人，主任科员1人，会计员1人，业务科员2—3人，办事员、录事员2人。财政科主要掌管全县地方性的经费、公粮、全县财粮年预算、决算、地方粮仓库等事宜。但对各项公粮仅有拨放工资粮的权

利，没有其它动用权。

（二）田粮科、财政科工作人员素质

国民党时期，米仓县政府在用人方面一般不看重政治条件，只重视文化程度和办事能力，甚至有的科（室）从科长到一般办事人员连一个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也没有。田粮科和财政科与其他科（室）相比，其文化素质还要高些。据历年的统计，田粮科、财政科的工作人员中，大专毕业生占10%，高中程度者占10%，初中程度者占60%，高小毕业生占20%。干部年龄的比例为：30—50岁的占80%，20—30岁者占20%。这些同志都是1948—1949年的统计情况，以前几年基本与此相同。

（三）粮食交易和粮价波动的规律

米仓县从未设过粮食市场，农民的余粮除自己食用外，均可进行自由交易。政府没有规定统一的粮价，但一般都有公认的价格。象一石小麦换二石糜子（或一石八斗），一匹好马可换十石小麦或二十石糜子，一头牛可换小麦四石或糜子八石等，遇有婚丧之类的事也用粮食搭礼。那时，陕坝也有一些私人粮店（栈），象信合成粮店，永记粮店，公和原粮店等，但人们只有急需钱时才去卖粮。因当时的法币不保值，卖一石小麦的钱几天后连二斗小麦也买不上了。所

以农民存粮不存钱。

粮价波动的规律：遇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年，一般情况下一绥石小麦可卖4—5块银元（按当时比价折合成法币，付给法币），糜子一石可卖2块银元；相反遇上歉收年，一绥石小麦可卖到6—7块银元，一绥石糜子可卖到4块银元左右。其他各种粮食的价格大体也照此规律涨跌。

季节性粮价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收获季节（夏、秋）的粮价会突然下跌；青黄不接之际会突然上涨。涨跌的幅度一般为一块银元左右，其他粮食也相似。

地区性粮价规律：当时陕坝的几家私人粮店，以营利为目的，利用一切可乘之机盘剥农民，政府对此也没有统一管理办法，这就出现了不同的粮价。离陕坝远的，如头道桥附近各乡农民到陕坝卖粮，因路远不能久住，又不知粮价底细，粮店主人就乘机压低粮价；离陕坝近的农民，价格不合理他们就拉回去，等第二天再来，直到粮价合理才卖。

特殊粮价：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农历五月），穷苦农民的生活极其困难，有的逼迫“卖树梢”。“卖树梢”就是把灌浆的小麦按地亩多少卖出。这种买卖私商获利最大，农民受害最深。一般只能卖到实际价格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四) 征粮情况

1939年，傅作义将军率领大军进驻套内，1942年米仓县正式建立。从大军入套，至解放前夕，米仓县负担着庞大的军、公粮任务，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现将情况述下：

1、征粮。征收公粮的项目，起初并不算多，只有农业税一种。就是把原来交纳现金改为交纳粮食，称为“征实”。但云集在后套的傅部军政人员多达十四、五万人，光凭“征实”，确是供不应求。为了解决人食、马料，于是，又增加了征购粮一项任务。征购粮也称为征借粮，但不论征购还是征借，从未给过粮款，也未见归还过粮食。后来又增加了军用马料粮、省公粮、县公粮、水费、乡、保经费粮等项目繁多的征粮任务。农民耕地少，收粮有限，越来越大的征粮任务，确实压得喘不过气来，无不叫苦连天。

抗战胜利后，为了反共打内战的需要，征粮任务与年俱增。如1948年征粮一开始，县政府就派专人担任各乡的公粮督导员，坐镇催粮。在几个乡内，还派出督导员巡回督催。各乡人员也施行分片包干，每人包两个保，下保催粮。下保人员都有乡警陪同。在催粮中，乡警是行凶作恶的主要人物，他们常说：“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新乐乡有个乡警，他对限期不交或交粮不

足的农户，张口就骂，举手便打，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反之，他们对欠粮大户，却是：“睡着不敢叫，起来不敢要。”每年拖欠公粮的都属于这些大户。全县年年只能完成征粮任务的百分之七、八十，没有一次能够完成全年任务的。

在1948年征粮时，正值绥远局势告急，包头曾一度解放，县里也发生过农民拒交公粮的风波，为此，当局曾提出过一个“要实行合理负担”的口号，即：大户多担，中户均担，小户少担，贫户不担的办法。但这个口号，到头来雷声大，雨点小，实际出粮的仍是中小户和贫困户。因为大户们在丈青时做了手脚，少丈了地亩，再加上他们顽抗不交或少交公粮，两头沾了便宜。因此，吃亏的还是广大贫困农民。

1949年初，为了加强河套这个根据地，绥远当局曾向套内派来一批新县长。新县长到任后，首先抓了1948年度公粮的尾欠工作。此时，拖欠公粮的大户们也看到了全国形势的变化，态度上不象从前那样嚣张了，他们唯命是从，补交了欠粮，计1948年征购任务完成的最好，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时农民高兴地说：“新县长，催公粮，做的准，做的对”。

（五）仓库

米仓县历来没有设置公营仓库，只在农村中设立民选公管公粮仓库。全县先为十八个乡，一个镇，后又减去一个乡，成为十七个乡，一个镇。及至1949年春，又合并成十二个乡，一个镇。仓库由靠近的几个乡共同设置，有时为五所，有时为六所，计先后设立过的仓库数约四十处左右。

现将1949年时的五处仓库情况列下：

(1) 訾秉璋仓库，设立在新乐乡（今南渠），收储新乐、新中、平教等乡的公粮；

(2) 刘拉富仓库，设在平理乡（今小召），收储平理、平政、新和等乡的公粮；

(3) 崔虎豹仓库，设在平城乡（今大树湾），收储平化、平成、平章、新隆镇等乡镇的公粮；

(4) 谢国英仓库，设在平治乡（今召庙），收储平治、平和等乡的公粮；

(5) 汤承洙仓库，设在平定乡（今太阳庙），收储平定、平西等乡的公粮。

关于仓库的设立，管理员的任用，都不是固定的。设仓工作，每年在当地几个交送公粮的乡里轮流设立，至于管理员的任用，则由本年设仓的乡公所，根据县上规定的下列条件，遴选人员，报县审抵后任用。其条件是：(1) 为人正

派，没有烟酒嫖赌嗜好者；（2）家庭生活富裕，种地多，不负外债者；（3）在当地群众中，具有一定威信者；（4）在保管员住处有高地可供建仓者。

各仓库的经费，在县公粮项下开支，均以小麦为主，由县政府会计室发给。各仓的办公费用每月小麦五斗，管理员每月工薪为小麦一石至一石二斗，会计月工薪为小麦八斗，验粮过秤员，每月工薪小麦四斗。以上办公费及工薪，只在收粮时发给，平时不发。管理员任期为一年。至于建仓费用，县里不拨专款，均由当地乡公所征派民工义务修建。

各仓库行政上由县政府第二科领导管理（一个时期由财政科管理过）。业务上归田粮科和田粮处管理。各仓库历年收存、保管的公粮种类很多，计有：军公粮（统计粮）、水费粮和地方性的公粮等等。其中以军公粮，军用马料粮为主。这些粮都是由田粮科主管的几种大型粮种。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又将省公粮、县公粮、水费粮也划归田粮科与军公粮统一计征，各仓库粮食入库的报表、月报表，都随交粮单据一并报田粮科。交粮收据统一由省印发，一式三联，叫做“交粮三联单”，一联随表报县，一联库存，一联付交粮人收执。

每年在征收公粮结束后，又将田粮按总收比

例划分为军粮、马料、田赋三种，留由田粮科按照上边的调运证交付发运。三种地方粮原归第二科管理。以后又分别将县公粮交会计室，水费粮交水利局，省公粮按省调拨证拨付。第二科原叫财务科，是个财务过渡机构，它没有动用或开支实物和现金的权利。当时实权操在会计室，它是一个独立的科室单位，历任县长都用自己的亲信人物当会计主任。

此外，各仓库还代收代管和支付乡、校级公田公粮和各乡镇、保级经费粮，地方武装团队经费粮（包括官兵口粮、薪饷粮）等。

在每年公粮开征前，由田粮科和田粮处成立田粮办公室，召集各乡镇的财经干事（也称田粮干事）来办公室集体办公。办公室主任由田粮处主任兼任，十八个乡镇的干事都是办事员，分别办理各乡镇的公粮入库事宜。

四、工商和税收

（一）工商业情况

米仓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工商业比较落后。

三道桥镇是米仓县政府所在地，市容萧条，建筑简陋，仅有一条东西方向的街道。东至现在的乡政府附近，西到现在的人民银行前面，是一条短小的直街。街道两侧全是土平房，而从事商

业的人，多是前为门市部，后为住家的家庭营业户。在街道当中，有杨家河大渠通过，把街道截成东西两段。渠上架设木桥一座，桥东的街道两侧，多为县级机关及家属住宅区，桥西则为商业区。商业区的地方虽小，但各行各业的商贩以及手工业和服务业者，都集中在这段街道。

开设在三道桥的商业，以座商为多，都是综合性的门市部。这些商号经营的范围是，日用百货、棉布、各种生产用具和一般杂货。各商号经营的商品都一样，没有经营一种或数种货物的专业字号。当时，设在三道桥镇的商业户有：王会元、刘文广、常光庭、方三、龚三、尚××等二十几家铺户字号。他们的资本都不多，以当时的银元计，一般都为几百元，最多的也不过千元上下。各商号由于资金少，更没有银行贷款；如遇上货物滞销，资金就很难周转。当时有人形容说：“三道桥的商人，有时三天没生意；但交易一次，就能顶三天”。这既说明了商业的冷落，同时，也说明了商人剥削的厉害。

开展赊销业务，是当时经营的一个特点。一些老主顾用货，可暂时不付现款，将货款折成粮食，等夏秋粮食下来时付粮。这样一来，两下都有利：在商人来讲，货价算的贵，粮食下来时，可以得实物；在农民来说，眼前缺钱也能用货，

并且减少以后卖粮之劳。因此，买卖双方，都喜欢这样的交易。

手工行业在三道桥很少见，仅有几家裁缝铺，全镇共有杨、谭、关、薛四个师傅，他们都是家庭裁缝，本人既是资方，又是劳动者。其中数关裁缝的生意多，他的家庭成员中，就有两三个人从事这项业务。

当时，三道桥镇只有一家饭馆，是由陈二来出资开设的。这家饭馆既包酒席，又卖便饭，也卖小食品。每到冬季和正月，有些地主来桥上请客，宴请县政府官员，所以承包酒席挣钱最多。每桌酒席约为银元10元，等于两绥石小麦的价格。当时农民以粮代钱，包办酒席全付给粮食。饭馆用三至四人，忙不过来时，还要请人帮工，真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粮食加工业方面，桥东有赵三开的碾磨坊，专门承揽粮食加工。加工费不收现钱，加工每百斤小麦、糜谷等粮食，只给顾主交付一定数量的成品粮即可。如一百斤小麦，交面粉10斤，糜谷交成粮60斤。麸皮、糠和剩余的成品粮顶加工费，属于加工者所有。这是一份挣钱的生意，真是获利不少。在桥西还有一家粮食加工户，他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加工业的。

街面上有摊贩商人两、三处，这些人多是三

道桥附近的住户，来街上摆摊子的。他们早摆晚收，货色也随着季节变化。主要货物有：蔬菜、瓜、果、籽种、农具和零星百货等物。

在医药行业方面：只有一家中药铺，系姓武的山西人所开。他既卖药又看病。但因药品不全，医道欠佳，收入不多。

全镇只有一家骡马和留人店，店址设在桥头边。由于三道桥地方偏僻，行人不多，旅店十夜九空，生意萧条。

各乡的商业和加工业：二道桥（杨柜）、沙海（胡柜城）两地，是本县的小集镇，商业较多，其它各乡只有三至五处小买卖。加工行业，乡、村里都有一些。多数是地富阶层经营的油坊、粉坊、酒坊，个别人还开设糖坊。在经营方式上，绝大多数都是接收原料，加工后交回制成品。如一斗葫麻交回葫油5斤。不收加工费。只有少数大地主才经营有营业性质的作坊。他们收购原料，经营作坊加工后，把生产出来的成品向市场推销，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这些加工业，在全县为数很多，有些油、粉坊是有季节性的，农闲时为加工旺季，及至农业大忙季节即停工务农。但个别大地主经营的加工业却例外，是属于常年性的营业。如平化乡地主武治忠在乡下开设有常年性的油坊、粉坊和酒

坊。新乐乡地主刘文远、警秉忠的油坊也是常年加工。据知，全县加工业户约八十家左右。这对当时民食、军需，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农村从事木匠、铁匠、毡匠、皮匠等手工业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有的在农村制造成品，然后以商品形式投入市场出售；有的是原料加工，挣加工费，等等。这对促进生产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是不可缺少的。手工业者，多数是季节性的劳动，农闲季节揽活加工，及至农忙，就都从事农业生产去了。

担贩商业是农村人民的好帮手。所谓担贩，即俗称的货郎担。从事这项行业的人，在米仓县境内为数甚多。他们都是从陕坝进货，来农村贩卖。所经营的商业，多为零星的日用百货，特别是属于妇女日用的商品居多。如：针、线、火柴、肥皂等物。货郎之所以受人欢迎，一方面是他送货上门，免去人们因购物所受的跋涉之苦；另一方面多为日用小百货，使用方便；此外一点则是，与货郎交易可以不用现钱，猪鬃、鸡蛋、羊毛、羊皮等农畜产品，均可换货，互为方便。农民说：“货郎担货农村贩，担上货担四乡串，农村人人都喜欢”。从这里可以看到，货郎担对当时的物资交流，繁荣经济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从事货郎担的商人，他们以贵货易

贱物，也获利甚厚，因此，作这项买卖的人为数甚多。据知，全县干这一行的商贩，约在百人以上。

由于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和加工业者，都是个体私营的性质。因此，他们都恪守唯利是图这个信条，表现在行为上，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在剥削方面，一般商家尚无剥削工人之弊，因他们多为家庭商店或夫妻商店，不雇用店员和工人。但加工业和手工业的情况则与商业不同，一些匠人师傅都是资方，他们采用招收徒弟的办法，来解决劳动力。具体的做法是：每个师傅带徒弟一至二人，在学徒期间，徒弟不挣工资，有的只给徒弟一些零花钱，其中就存在着剥削。但比较显眼的是，在地主或大户家的油、粉、酒等加工作坊中，劳资双方的矛盾很大，劳动者受资方的剥削也较严重。在服务态度方面，他们本着“顾客为衣食父母”这条原则，都坚守信誉，说一不二。如在订货规格、商品价格、交货期限和产品质量方面，一经谈好，绝不变更。尤其在接待顾客时，他们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交易多少，都一视同仁，真正做到百拿不烦，百问不厌的地步。

（二）工商组织机构

1、工商业务的归属情况

米仓县的工商业在整个经济领域中所占比重较小，从业人员也不多。工商业一直比较萧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县政府从没有设过专门的管理工商行政的机构。解放前，三道桥（米仓县政府所在地）、胡柜城、杨柜及农村中的工商业务一直归税务股领导。1949年元月税务股撤消，工商业务又归第二科（经济科）管，至解放止。第二科主管业务时，具体工作仍由科内的税务科员承办，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对鼓励发展、扶持经营根本没有任何措施，只是靠自发经营。

建国后，中央召开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从此国家大法中有了发展工商业的规定。米仓县对发展工商业也有了明确指示，当时责成并不对口的建设科多次组织新隆镇（三道桥）的工商从业人员学习、讨论中央的有关政策和文件，鼓励发展工商业。

1950年4月底，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把工商业务正式划归建设科主管。当时的主办员是樊虎田同志，根据县政府的指示差不多天天组织三道桥的工商业者进行学习。由于有匪特不断散布“共产”谣言，使得米仓县的个别从业者产生了畏惧情绪（怕“共产”、怕漏富），大部分从业者也只是经营些零散货物。这种局面，在县人

民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后才得到扭转，市场才恢复了正常秩序。

1950年5月，按上级指示米仓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工商科，建设科将业务进行了移交，原建设科主管工商的人员也随之调入工商科。省人民政府派来郭××（一只眼为磁眼）任工商科长。从此米仓县才有了专门工商行政机构，但人员不多。此后，又成立了工商联会，属群众团体组织。工商联会的正、副会长是王会元、寇成之，委员有霍守恒、房三等，并且选举王会元、寇成之、霍守恒三人为参议会的议员，代表工商界出席议会。工商联会成立后，做过一些一般性的服务工作，直到全国解放，自动解散了。

（三）税务情况

1、税务的组织机构

1940年夏季晋、绥区直接税局（也称特税局）在陕坝开展工作，1945年地方税局在陕坝正式成立。米仓县随后也成立了地方税务机构。因地方小、税源少，只设了米仓县税务股。当时国民党实行的是两级领导制，所以米仓县税务股行政上受米仓县政府领导，业务上受绥远省财政厅领导。米仓县解放前税务机构一直是个税务股，股长是董建功，下设4—5名征税员。1949年1月，省政府指示紧缩县的编制，遂将税务股名称

撤销并入经济科（也称二科），从此经济科就成了米仓县税务工作的领导机构。同年1—3月份科长为吴麟芝，以后直至解放一直由王直科担任科长，具体办事人员一直未变，内部业务人员有董建功、屈雅堂、张德一，外勤征税员有袁国卿、燕崇德、焦树华、吴振峰、王培玉等人。经济科下设西补隆、头道桥、三道桥（科内人员兼办）三处税务所，各派去1名常驻人员进行征税工作。

1953年3月成立了税务局，先派赵全玉为副局长、董建功为税政股长、屈雅堂为会计，以后继委李金铎为正局长，并增配了王茂中、任礼、柴济、马骏等12名工作人员。下设机构保留了原西补隆、头道桥两个征所，撤销了三道桥征所。随之，县税务局也从城内县政府院内迁至西街桥头边，代替了原三道桥征所的征税工作。

2、解放前的征税实况

在解放前国民党的征税项目有：货物营业税、利得税、牲畜交易税、印花税、所得税、车辆牌照税、屠宰税、娱乐税和卖淫税。由于米仓地方小，没有妓院和娱乐场所，因此从来没有征收过卖淫和娱乐两种税款；除此之外的其他各项都进行过征收。各种税率历年都有调整，并不固定，同时也有征收实物的现象。如1949年春，国

民党中央因绥远省与共产党和谈扣压了军政人员的费用，部队吃穿顿时告危，省政府为解决军队穿衣的困难，就把羊皮、羊毛、羊绒的税款由征20%的现金改为全部征收实物。米仓县税务机关在西谷隆卡口一次就向进境的外地驼队商人（驼运羊皮300张）征收了60张绵羊皮。

米仓县约有座商40多家，连胡柜、杨柜两个小镇户在内都是小型商户，有油、粉、酒、糖加工作坊100家，食堂旅店各1家，缝纫店4家，医疗站1所。这就是当时征税主要对象。而多数小商不建帐本，税务人员很难掌握其营业额，征税只好依据各家商品的多少、加工量多少，经召集同行商定按月计征。

牌照税：县政府提前下达文件，责成各乡公所调查实有车辆（二并子车和三套马车），造册报县。县里据实向车主一次性发牌（统一编号的金属牌照）收税。记得1949年度每辆车收税2银元。

屠宰税：由乡办统计报县征收，且各年度的税额不一。1949年县政府规定宰羊一只征税0.5元，杀猪一口收税1元，杀牛一头收税2元，还规定只能宰杀残、老、病牛，且事先必须申报，由乡工作人员验证，县政府批准后方可宰杀，否则要罚款。而实际上居民不报批宰杀者很多。县

政府为了保证耕牛、壮牛、母牛的数目，是年将牛的屠宰税增至每头4元。这样做虽然减少了税收，但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契约税：契约税在国民党政府时，税率常有变动，买契高达百分之十五，典契高达百分之十。正税外又有附加，逾期、匿报都有处罚。按当时规定，不经过政府税务部门征税是“黑契”不是“红契”，不受法律保护。还规定价越大按累进税计征税额越大。县政府专设一人办理此项工作，1949年2月以来主办人员是张德一。

上述诸税系地方性项目，有些税容易计征，有些税偷漏现象严重。如征收车辆牌照税过程中，有些大户车多报少，还有的车户干脆不报（出门借牌照），一经查出除补税外，还要罚款一倍。尽管如此，每年偷漏税者还有不少。屠宰税也是逃税项目之一，杀多报少是常有的事。形成了“老实者吃亏，奸猾者占便宜”。

本县的头道桥、西补隆两地是通往宁、甘、青、新四省的重要卡口。1948—1949年间，一度津、京等大都市与各地交通断绝，西北各省的土特产（如毛、皮、绒、药材等）只能销往绥、包两地，并购进所需的百货、药品等。商人们的交通工具只有骆驼。头道桥和西补隆是往返的必经之路，米仓县在此设卡收税。常有几十峰

甚至上百峰的驼队过往，给米仓县带来了充足的税源。税额竟高出地方性税额好几倍。由于过往商人多，时有行贿受贿现象出现。为此，1949年上半年，县府曾开除过一个征税员，同年夏季又把两名有受贿劣迹的串乡收税员“停职使用”，过了不久即恢复了工作。

3、征税过程中的票据使用情况

那时，各县使用的都是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经过编号、加盖省厅公章的多联票据。在各据之间的联缝中，要用大写汉字（壹贰叁……）填写，纳税数目要和正票纳税数相符。各县税务部门要按时填报旬、月、季报表，反映征税情况。使用过的票据、征收到的税款随报表如数解送省厅，缺一不可。如有开错作废的税票，必须将废票交回报销，否则即以舞弊罚款论处。至于提留部分要在表上写明，提留税款交会计室作县府的经费。

4、解放后税务动态

1950年春季，县税务局正式成立。据悉实行的是四级财政制，县税务局受专区税局直接领导。县税务局既有人权也有财权，这是与解放前不同的。征税项目与前大同小异，但税率有所调整。

解放后米仓县税务局纪律严明、秉公办事，受到人民的好评。据知，当时头道桥税所两个工

作人员，由于私分旧人民币5万元（1万相当于新人民币1元），一人被开除，一人受警告处分。此事发生后，在广大干部中引起极大震动，同时也教育了一大片人。

五、交通和邮电

解放前，米仓县的交通、邮电事业极端落后，消息闭塞，人少往来。邮寄信件、拍发电报，都得到陕坝市里去办。在当地很少看到新出的书报，有些新闻在与读者见面时，早已成为历史了。至于广播事业，则是闻所未闻。现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叙述如下：

（一）交通方面

1、公路。解放前，在米仓县境内只有长十五公里的一条陕米简易公路（即由陕坝至三道桥）。路面宽四米，路基低洼，坎坷不平。公路建成后，不但汽车不能通行，牛马车过往也感困难。主要是因为无人养护，经常被渠水淹没，有的地方水深达一米左右。如：一九四九年沙沟渠决口，公路被淹，交通中断达半年之久。此时，行人、车辆均须绕道十里之外，才能通行。

此外，从三道桥至二道桥、沙海、大树湾、召庙等处，都修有简易公路。但自建成以后，同样无人养护，勉强能够通车。

2、桥梁。在全县境内，仅有头道桥、二道

桥、三道桥和沙沟桥等较大的几座简易木桥。这些桥都是在渠两岸的相对处，用芦苇、白茨等柴草筑成桥墩，然后在上面铺架木椽、木板，并在两旁围上栏杆，供二饼子牛、马车和行人通行。这些桥梁，由于材料不结实，建筑不坚固，以及年久失修等原因，到解放时，均已破烂不堪。其中，以沙沟桥破损的最为严重，不仅车辆不能通行，人行也有危险。

3、水运。县境内只有今南渠乡与沙海乡之间的一处渡口。这是陕坝通往山湾的一条主要道口，因被沙沟渠阻隔未架桥梁，只好以渡代桥，过往行人，非常不便。

4、交通工具。普遍使用的是木制的二饼子牛车，也有少数双套木制花轮马车。这些车载重量小，速度慢，使用时很不方便，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探亲、访友或办事，主要靠步行或骑毛驴。即便是有钱的地主、官僚，他们也不过是骑马往来。

（二）邮电方面

1、信件传递缓慢，报纸、杂志不能及时送到，造成消息闭塞，民智低下。那时，全县没有设立邮政的分支机构，只在县政府的收发室内，由收发人员兼办送信事务。办法是，所有信件由陕坝邮局送到县政府收发室，收发室再将信件分

送到各乡。较远的乡公所，每隔一天，派专人到县政府取公文和信件，然后再将信件分送给收信人。时间长了，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以下几条主要传递信件的路线。即：第一线由南渠（新化、新乐、新成乡）至四支（新中乡）；第二线由三道桥（平化乡）至大树湾（平章乡）；第三线由三道桥（平化乡）至沙海（新教、平教乡）；第四线由太阳庙（平成乡）至召庙（平治、平定、平西乡）；第五线由二道桥（平政乡）、查干（平顺乡）至头道桥（新和乡）。

2、电报、电话。米仓县当时没有设立电报局，人们有事需拍发电报，只能到陕坝电报局办理。1948年春季修复、更新了陕坝与米仓县之间的电话线路，并设专人看护。及至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县政府为了加强与各乡之间的联系，决定架设通往各乡的电话线路。共先后架设了由县政府所在地三道桥至沙海（平教乡）线，并由此线连通了县与平化、新教、平教三乡的线路；架设了由三道桥至四支（新中乡）线，并由此线连通了县与新成、新乐两乡的线路；架设了由三道桥至二道桥（平政乡）线。当年秋，又架设了由三道桥至头道桥线，并由此线连通了县与新和、平和、平顺三乡的线路。接着又架设了三道桥与太阳庙（平成乡）、召庙（平治、平定、

平西乡)、大树湾(平章乡)以及小召(平理乡)之间的电话线路,使全县十多个乡镇都有了电话设施。

在县政府内先设总机一台,后来又专门设立了电话室,划归建设科领导。电话室设技术员一人,专门负责修机并架设线路。话务员二人,昼夜轮班看守总机。线工二人,负责线路维修。

架设电话线路所需要的电线、瓷瓶等器材和设备,由县政府向上级申请领取,电线杆则由各乡自备。线路架设是在县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由各乡动员民工统一架设。当时,电话机价格昂贵,无钱购买。各乡多用小麦交换,计换一台电话机需要小麦四至五石。后来电话机便宜了,但一台价格也需要小麦两、三石。小麦均由各乡自筹。

在五大电话干线架通之后,全县各乡之间都能互相通话,这对传达政令,交流信息,大为方便。由于电话线路是自设自用,除每年向陕坝交纳一点租金外,任何人打电话都不收费,也不对外营业。1950年2月,米仓县设立了邮电所,县政府将电话室人员及设备全部移交邮电所管理。

六、教育事业概况

(一)行政领导:1942年米仓县建县后,教育领导机构一直是教育科。科的编制为科长1人,督学1人,科员2人。在六任县长期间,任过教

育科长的有：鲁宗廉、汤承江、吕济世。1949年1月吕任科长后，教育科一度被并入政务科。1949年9月19日和平起义后，县政府又恢复教育科，科长为崔以强。1950年7月间，省文教厅任命吕济世为教育科长。

教育科的职权范围只限于日常教学业务管理、教师工资及办公费（粮），由会计室按月到专署领回发放到学校；人事安排由县政府的人事管理员负责，实际上都是主管县长说了算。当时教师是派任制。

（二）学校基本情况

米仓建县之前，公办学校很少，大都是私塾，每所仅有十几个学生，所用课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1942年米仓建县后，政府有了教育管理机构。公办学校也随之发展了起来。到1945年，公办学校已发展为37所，其中有三道桥（县政府所在地）、沙沟、杨柜（二道桥公社所在地）、胡柜城（沙海公社所在地）四所完全小学及天主堂的普爱小学，还有各乡中心学校及每乡一所保国民学校。保国民学校设校长1人，配备教师1人。此时，全县已有八九十个班级，其中高级班十二、三个，总计学生3000名左右。教师已增到120人。

当时，在校生年龄悬殊很大，超龄生极多，

高小毕业生竟有二十多岁的，初小生年龄在十七八的也不少，这部分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 $1/5$ 。其原因有二：一是入学晚；二是逃兵役（因在校生不当兵）。

米仓县教育事业发展不快，在校生少的原因是：一方面，各乡有钱人家都把子女送到陕坝二小上学，教徒则把子女送到陕坝天主堂的普爱学校上学。而这些人正是掌权者，由于自己的子女远走高飞，所以他们并不关心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一般农民的温饱尚成问题哪有余力供子女上学，就是在校生也有一部分是政府强迫入学的。

城镇学校的班人数可保持30人左右。乡村学校的班人数多则20人，少则十几人或更少，且都是“复式”教学。有的学校一至四年级只有1名校长1名教员。还有的学校纯粹1名教师。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宗旨是：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米仓县的学校在初级班开设语文、算术、常识等三门主课；在高级班开设语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和公民课（国民党规定内容为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政权与治权、新生活、三民主义）。此外初、高级班还开设了体育、音乐、美术、劳作等课。

由于时局不稳，国民党政府顾不及编印课

本，因此，全国没有统一的教材，都由各地自行编印课本。当时陕坝有一家“益友书店”印课本，由教科科统一买回来出售给学校。

学生在校时间为八小时左右，全天共上七节课。那时学校没有时钟，条件好的学校以燃香为计时标准，燃尽一柱香为一课时，人们称之为“一柱香”学校；条件差的乡村小学，由教师凭经验估时，人们称之为“经验估时”学校。

当时，教室大都是土木结构。教室的大小因需要而定，窗户一般为1米见方，且用麻纸糊窗，采光条件极差，学生视力受到严重损害。在农村，学生的桌凳均为泥土做成。因久坐泥凳学生身患疥癣、痔疮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当时政府提倡的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等新生活准则，只能做到简单、朴素两项。

政府对中心学校和保校没有专款投资，建校的一切费用，包括所用人工、各种建材都由学校所在乡、保统一摊派。

1947—1948年，政府为解决各校经费问题，曾给各乡中心学校划拨五顷公田，所得田租充作修建费。但实际上所有校公田都是盐碱地，根本不能耕种。校公田的佃户年年要求退地，有关部门不准退。大部分校公田颗粒无收，如三道桥、新乐乡、新成乡等中心学校的公田都是这种情况，

笔者当时正在此地主管公田，深知此情。

县会计根据学校具体情况分1—3等，分别核定发给办公经费（小麦100—150斤）。学校精打细算才能维持笔墨纸张的开支，根本没有用于修建的可能。有些学校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通过演戏募捐的渠道解决了经费的不足。

至于图书、报纸、刊物及教学参考资料，限于经费紧张，根本没有可能订阅、购买。

（三）教师的地位

解放前米仓县教师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很低，在社会上受不到应有的尊重。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些俗语：“家有隔日粮，不当孩子王（教师）”、“穷不供书，富不教学”，更有甚者说“教师是靠卖嘴吃饭的”等等，这些流言蜚语十足地反映了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的经济收入也令人寒心，一般教师月工资为8—10绥斗左右（每石值银元2—3元）。试用或代课教师每月只挣5绥斗。遇上经费紧张时，还会出现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的现象。怪不得有些教师说：

“我们连个乡、保警都不如。”

那时的教师，生活确实够艰苦。绝大多数的教师只能吃到糜米粥、淹咸菜，有的连糊口也成问题。自己过着如此生活，遇有督学检查教学还得买鸡、买蛋招待，为得是“来年降吉祥”（怕

远调或不用)。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教师还是辛勤地工作着，从早到晚不曾离校，一日在校终日忙碌，不到深夜不能休息。

（四）教师队伍的文化程度

及至抗战初期，米仓地区的小学教员文化程度还很低，多为旧高小毕业程度，部分人员为初中程度，还有极少数人是念过多年私塾的，大都勉强担任教学工作。

抗战胜利至解放这一时期，米仓县教师队伍得到了充实。原因是“国立绥中”从陕坝迁到了米仓县梅令庙，每年有很多高中毕业生、师范毕业生分配到米仓县教育界。据我所知，这部分人中有吕济世、汤承江、杨振业、谢国英、高治和、张子健、韩莅政、张汗星、王治宽、胡仁、任怀道等。他们大都成了骨干力量，如吕济世、汤承江先后担任过教育科长，张子健任过督学，杨振业、韩莅政、胡仁、王治宽、张汗星等人担任过大型学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

1947—1948年，又从外地来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教师，其中有王铭璋、李允雄、柴如斌、高叔德。由于教师队伍文化层次的不断提高，此后，米仓县的教育事业出现了好势头。

（五）对学生的管理

解放前，尽管政府明令严禁体罚学生，各学

校视若罔闻。教师对“铁肩担教育、笑脸看儿童”的号召也没有深刻领会，遇有学生犯错，教师便板起面孔，用“戒尺”对学生进行体罚。少数“明智”的教师知道打学生不对，就改为“拉耳朵”“揪头发”之类的体罚。在当时，各学校还公开设置木板、戒尺，有的学校讲台上还有红柳条、鞭子，遇有学生作业做不好或背不下书，就用这类教鞭体罚学生。学生对教师只有怕没有爱和敬。奇怪的是学生家长对此也没有什么不满，有的家长见了教师就问：“我的孩子怎么样？不听话不用心只管打，我们不怪你。”好象“打”是唯一使学生进步的良方。这也助长了这股歪风，形成了长期以来教师只教书不育人的局面。

（六）国民党号召的“尊教重道”

1949年以前，国民党一度提倡过“尊教重道”，号召社会各界尊重教师、优待教师。这一号召在城镇没起什么作用，在农村倒是看到些实际行动。如遇到节日，家长们就纷纷请老师吃饭或送食品给老师。

（七）解放前教育工作中的优缺点

1、优点部分：①教师要求学生每日写毛笔楷书一方或半张（麻纸），有些教师还强调学生的毛笔楷书字的纵横行之间，用小楷字默写课文，这对练好毛笔字和熟悉课文都起了很大的作

用；②对语文课非常重视。教师们认为语文是一门母课，是各科知识的基础课，因此，那时学生的书、写功夫都很好。

2、缺点部分：①教师只知教书不知育人，不联系课堂教学进行思想教育，不在治本上下功夫。结果，学生打架、骂人现象不断发生。②教学方法呆板，长期用“填鸭式”或“注入式”。教师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对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综合知识能力、判断能力，缺乏应有的培养和启发。如，当时的期中期末考试题，多为记忆性的，缺少思考、判断性的。③缺乏直观、形象教学。比如，教师不能利用一些实物或简单教具进行教学。④由于条件所限，学生没有得到全面发展。⑤教师纠正学生的错误时，一般用体罚，很少用启发教育、表扬鼓励的方法。有时因挫伤了学生的自尊心，结果适得其反。⑥教师为人师表的能力差。一部分教师当着学生的面骂人、说下流话、传播迷信思想，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八）党对教育界的整顿

1949年的解放，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制下的教育制度的结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制度。

1、1950年春季开学之初，米仓县委、县政

府对各学校的教师进行了调查，加强了重点学校的师资力量。把三道桥、胡柜、杨柜、沙沟四所高级小学按新教育制度升格为完全小学，并对四所完小的负责人进行了调整：一完小（三道桥）校长王子信、二道桥（杨柜）完小校长汤承江、胡柜（今沙海）完小校长韩莅政、沙沟完小校长×××。

2、县政府所在地三道桥新设文化馆，开展了社会教育工作。

3、整顿、加强教师队伍。1950年米仓县首次举办了暑假教师学习班，地址在三道桥，时间为40天左右。要求全县130多名教师一律参加。学习材料为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全国政协会议文件、党中央发布的有关文件。当时，正值党中央提出在全国各地进行整党，绥远省是新区，所以省委、省政府规定非党干部、学校教师也要学习整党文件。学习方式为大会报告、分组讨论，报告和讲课由县委宣传部负责，讨论时气氛热烈、教师发言踊跃。通过学习，教师们在思想上、认识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明确了小资产阶级是联合的对象，是国家的主人，从而消除了一些教师的思想顾虑。教师们还对照整党材料对自己的思想做了深刻的检查，同时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至此，教师队伍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解放前临河县永和乡 农村经济情况见闻

刘熊飞

我于1941年至1947年在骑兵团当连长。曾在临河县永和乡（现临河市小召乡幸福村）驻扎七年之久。对当地的农村经济情况有所了解。现回忆如下：

（一）永和乡的土地来源

我们队伍的驻地是前永和乡二保，也就是现在的小召乡幸福村一队、二队、三队，村名温家圪旦（鼠疫疫点）。村的四周东边连公义恒渠，南接韩子文买地，西至永兰渠畔，北到公产交界。这片地都是地主赵占元的。他本人并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临河县城东小张圪卜，经常来温家圪旦看看。土地都是出租，他本人并不耕种一亩。他双目近视，我刚到的第四天，就和他作了一次较长的谈话。问他这片土地原来是多少钱买的。他笑了笑说：“买地还要花钱吗？”这话

使我大吃一惊，记得，我的故乡买一片房基地，还需要二三百块现大洋，那能有这么大块土地不用花钱买的呢？追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却含糊其词不肯答复。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经过询问几位知情的老者，才知道这片土地并不是赵占元的买地，而是五原厅有一位负责地政的官员名叫奎子义的土地，总数约200多顷。后来奎子义因刑事案件被关押，刘占元和另一名叫温占魁的，因是奎的心腹，当然了解奎的土地内幕，于是刘占元和温占魁就在奎被关押期间，二人分摊登记合伙侵吞了奎在临河的土地。等奎事完后，已经无法了，打官司又怕引起别的事来，只好忍气吞声作罢了，这就是赵占元买地不花钱的根源。可是赵占元虽拥有大片土地，却不会经营管理，靠收租不足消费，因而生活日趋贫困。只好依靠卖地度日，把村东地卖给地主温疤子，兰锁渠畔地卖给侯站长，村北地卖给张兴亚，其余土地包给地主杨财耕种。而杨财把好地自种，次地又转租出去。但村子四周依然白茫茫一片。我曾问过很多人，这地为什么不种呢？他们都说：赵占元不地道（无信用），你不开垦，他不要，你一开垦，他就要，谁替他白费力气。南面就是韩子文的地，这个人当过黑马队的营长，所占土地自买和量地各占其半，量地就是丈量下的余地。当时公

家宣传丈出的余地，交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显然是一句空话。没有地的农民占不上地，占用余地的却是地主和大户。韩子文就是一个实例。赵占元的土地南端是苇子圪卜（就是现在的幸福村七队、六队、十队、十二队）是刘拉弟、刘大秃、刘三楞，这些地主所占有。土地的来源赵占元是侵占，刘拉弟是赏赐。因为刘拉弟的母亲侍候永胜恒（包头商人兼种地）老掌柜殷勤体贴，永胜恒买卖不做了，就把这片土地给了刘家。而分家另户才搬开的，按理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临河城里有一个叫刘树声（开碾磨坊）的竟雇了好几张牛犊，提耨就种，说是永胜恒给他的。刘拉弟阻止无效，乃去包头寻见永胜恒老掌柜，通过包头警察局派人来临河才解决，就这样刘树声白种了一年，才归还刘拉弟。可刘拉弟也是个败家子，经营不好，最后也是靠卖地过光景。赵占元土地北接公产，那就是马鸿逵的农庄，由范经理负责，我们称这位经理为“皇粮庄头”，而实际上和清代的“皇粮庄”并无区别。一过二喜渡口就是刘文明圪旦（和刘拉弟一家），这里与屯垦紧相连，属于山西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屯垦负责人是田树梅，指挥部地点在百川堡（今之新华镇），百川系阎锡山的别号。这里建有花园住宅，很象个独立小王国。

二、农田经营情况

这里把土地与农田分开来叙述的原因是，荒地里面有农田，农田里面有荒地。主要的原因是“懒”，懒的根源是抽洋烟。那时河套人穷困潦倒，但是无论你走进哪个村子户家里，都能闻见浓浓的大烟味。再去地里看一看，有的地三五年不耕一遍，每年闯种（也称生种）。那时我问过地主刘拉弟，为什么地不耕就种？他说“耕三遍有鬼，耖三遍有水”。所以收不附支，加之挥霍浪费，秋天一收大吃大喝，一到春天东挪西借，债务一身。丰收年头尚能支持，一遇灾情，卖地卖牛关场门，这里说的是大地主经营情况。中小户人家比较好一些，操作方面细微一点，但要区别农田是，自、包、余的关系。那个时期，公家要丈青苗，有人这样说：“好不如坏”。原来种出顺眼一点的庄禾，而实际产量又不一定比不顺眼的高，一丈青苗就吃亏了。所以说好不如坏。再有一种跑青牛犊的帮工，春出秋回，在操作方面不负责，那叫“脚板上吊——哄鬼”。地里下不进去辛苦，那能有满意的收获。农民经济衰退，生活困难，购买力弱，人们穿着“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又顶铺，又顶盖虱子干咬寻不见”的烂皮袄，人民生活很艰苦。

三、水利灌溉

水利设施和技术简陋，黄河做坝，冲跑了一坝又一坝（我那时领兵遇过）。修闸时二饼子牛车拉柴，来来往往，供不应求。不过那时柴禾（白茨）不缺。永济渠白茨闸，常年修，常年坏。送柴草，保甲长催逼的很紧，淌水时他们却不闻不问了。获利的是地主和官僚，尤其是永和乡表现得很突出，因为永和乡农田灌溉大多数都依靠永兰渠。渠口上有大地主王登鳌，下游有马鸿逵的公产，中间的人死吃亏。水一来先淌头稍，中间的人才能淌，如果误了淌水日期，将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就是中段灌溉，吃亏的仍然是中小户人家。例如韩子文本是官僚地主，雇工又多，水一来他把渠做上坝，别人干看淌不上水。我记得我还替农民挖过民生渠，可是也不顶事，经过一番周折，才比较好些。主持开挖民生渠的黄文华，叫公产范经理拿手枪追过：你把渠口放开，公产派人来打上，黄文华白天不敢放，黑夜放开，有时候放的口小，水小淌不上。黄文华动员农民黑夜送柴禾，把永兰渠做上坝抢淌水。公产来人不让了，黄文华向我们求告，我们说：“州有州官，县有县衙，我们武官不问民事”。鉴于黄文华本人种地只有四五十亩，实际上的确是为了第二保多数农民，因此我们出面作过调停，公产才稍作让步，我们派兵替他们防过

洪，看过渠口。总起来说，中小户农民实在困难，因此在那个历史时期，有人宁当长工，不愿自己种地就是这个理由。

四、粮政方面

在这方面的奇怪现象很多。过去人们说：“租上牛，种上地，卖了老婆打统计”。这说明粮食很紧张。地主把一船又一船粮运往包头换洋烟，而穷人则是糠菜半年粮。就连军队也吃豌豆瓣，小米饭里和上50%的板豆，吃过很长时间。但有的粮卖不出去，要受商人的剥削。一个不值钱的粗磁盆盆要好几斗粮食，一小片洋烟一斗糜子，这样的生意还很兴隆。春天“卖树梢”那就更吃亏了，我就见过温疤子卖过30石糜子，春天一石糜子八毛钱，秋天那怕三块钱一石，也要按八毛钱如数付粮，这种“卖树梢”，比高利贷还利害，然而有的人家不这样做，困难问题解决不了。造成农村经济困难的另一原因，是公家不付现款，河套人常说：“打了打，吊了吊，临完给张储蓄票”，我亲眼见过有人拿好几十块储蓄券换了两丈土老布。这究竟是谁吃亏？肯定还是卖布的人吃亏，因为最后储蓄券不能用了，把两丈土布白扔掉了。但拿储蓄票换布的也吃亏了，好几十石粮食换一条土老布裤子。人常说：“谷贱伤农，谷贵更伤农”。在那个时期，农村

交易都以粮食为单位，市场流通中，粮食变钱，换成法币，物价一日三变，法币贬值，几万法币买一盒纸烟。最后吃亏的仍是农民。

五、工商业方面

当时河套地区除陕坝有个毛纺厂外，再也没有什么其它工厂，由于工业没基础，给河套人带来一种自卑感，仅有的几种商品，大都带个“洋”字，洋字是指东洋与西洋，东洋是指日本，西洋是指英法。其实明明是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它也要带个洋字。例如纸烟，叫做“洋旱烟”，河南许昌大量生产纸烟，非说他是“洋货”。人们穿的袜子，这是最简单的手工业品，也要说成是“洋袜子”。鸦片烟，明明前山就种这个东西，也要说成洋烟。不过还有一些理由，因为当初洋烟是从印度运进来的，并非我国原有，其余带洋字就太没理由了。

商业方面，除饭馆是本地开的，其余商品则来自东西两路，也就是来自包头和兰州。我县的德和泉，就是种地兼营商业。其中：与蒙古交易利润最大，也竭尽欺骗之能事。有人说在那个时期与蒙古交易的商人（边客）用烧酒渗水结成冰，说是最好的固体烧酒。商人用糜子换蒙民的盐，不用秤而用门板，垒起来就算，糜子怎么垒？如果换皮毛，蒙民更是吃亏，一斤白糖换二斤羊

毛，悬殊很大。五斗糜子换一头五岁口的牛，我们就换过。做蒙古生易的商人，不用糜子，而用炒米，以斗计算。那个时期农村商品来源奇缺，货郎担子为大宗。一板兰州水烟，要换一斗糜子；一个鸡蛋换一块水果糖，还争先恐后。那个时候货郎担子不卖市布，多数卖三六或四八老布，要是农民换夏衣，他们用土布换粮食，那就难以计算了。因此农民经济就又多了一层盘剥，农付产品呢。除地富阶级外，一般农民能喂起一口百十斤重的肉猪的为数不多，而其中多数农民，不敢大吃二喝。拿猪肉换日用品，这是普遍存在的。养羊的农民，皮毛卖不出去，要受商人的剥削，有的进城不多的庄户人，经常要上“街耗子”的当（没有正当职业跑街为生的，就叫“街耗子”。）皮毛价的涨落，庄户人当然不知道。农民一进城这些“街耗子”立即迎上来，花言巧语，他高价收买你的羊毛，每斤若干元，他把你安置在他家中，拿上你的羊毛去卖，从中取利。农民养鸡呢。由于粮食缺乏，喂不肥，有其数，无其肉。卖不上价还是小问题，经常被贼偷，有的时候杂牌子队伍经过，大小鸡一扫而光，就是鸡粪他们不要。

六、医药、卫生状况

“有病拿命抗”。这是穷人的共同语言，请

一个医生治病，首先要放上洋烟灯，等过足洋烟瘾，才诊脉开方，医疗费不叫医疗费，叫“开包礼”，少则五块现大洋，十块、二十四块、三十六块不等。有的“开包礼”要百块大洋。例如名噪塞上的“德和泉”请中美训练班的洋人看病，“开包礼”就送了百元现大洋，并雇用妓女招待。穷苦人无奈，只好凭信请神弄鬼。在那个历史年代里，农村一到夜间，叮叮当当，“金花娘娘上九苍，白龙将军下凡来”。伤寒病猖狂的河套，只有用拔火罐，吃偏方，同疾病作斗争。农民常说：“炕上坐个病老婆，这个光景怎么过”。看病吧，没钱，不管吧、夫妻之情，一年工钱不够给老婆看病，的确这个光景难过。要是遇着天灾，那就更难维持了。例如1940年临河永和乡一保，温家圪旦（即现在的小召幸福村一社）鼠疫流行时，死亡人很多。不仅农民束手待毙，而且政府也没有防治办法，只有一味的封锁，不让病人行动，吃、喝、住、行一概不管。家无隔夜粮的农民得了传染病，不病死，也得饿死。我们是1941年进驻这个村子的，据当地农民诉说，政府派了个烧埋队来，谁死了就拉出去埋掉，既不给治疗也无其他防预办法，最后来了一个临时军管，派队伍包围了这个村子，谁要行动，就开枪打死。由陕坝派了一个姓赵的“司

令”，据说要用大炮炸毁这个村子，后经当地行政干部与群众的反对，才免遭涂炭。试想农民遭受鼠疫病魔危害，已经够痛苦了，还要忍心炮轰他们，天理何在？旧社会农村的经济状况，仅此一斑，约略可见全貌矣。

解放后巴盟农业生产 发展概况的回顾

赵国兴

一、概述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句全国知名的谚语，说明我盟河套灌区，在广大的荒漠草原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自然条件。从地形上看，它是内蒙古西部阴山山地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东西走向的沉积盆地，是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西南低而东北高，黄河恰好从西南引入自流灌溉，地表坡度南北为 $1/6600$ ，东西坡降为 $1/8000$ ，南窄北宽呈扇形，境内河段全长340公里，总土地面积1,150万亩，引黄河水有效灌溉面积550万亩。巴盟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在440万亩上下，其中河套灌区占87%左右，粮豆总产量中河套灌区约占92%左右。因此巴盟的行政区划虽几经调整，如1958年乌前旗、中后旗、磴口县、河套行政区七旗县镇，与原巴盟

合并，但农业区仍以河套灌区占整个巴盟农业生产的主要地位，因此本文回顾巴盟农业生产的发展概况，特别是1958年以前的情况，是以河套灌区为主。引用全盟的数据如播种面积、总产量等，以盟统计处核定的数字为准。

解放后，在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的和经济的艰苦斗争，扫清了发展生产的障碍，解放了生产力，整修水利，解决了土地问题，进而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那年（1949年），是风调雨顺灾害较少的一年，耕地面积约300万亩，单产不过100斤，总产只3亿斤。经过几年的恢复，播种面积很快达到450万亩，扩大了50%。以粮食生产为例，

“文革”前的16年，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恢复时期的三年（1949年至1952年），粮食平均总产3亿8千万斤；

“一五”时期的五年（1953年至1957年），粮食平均总产6亿9千万斤；

“二五”时期的五年（1958年至1962年），粮食平均总产6亿3千万斤；

调整时期的三年（1963年至1965年），粮食平均总产7亿7千万斤。

“二五”期间，曾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单产、总产，比“一五”时期有所下降，经过三年

调整，单产、总产逐年回升，至1965年末，“文革”的前夕，粮食总产达到8亿6千4百万斤，单产达到191斤，比解放时，单产增长将近一倍，总产增长将近两倍。

从以上的数字看，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发展农业的优厚自然条件相比，产量不算高，发展有起伏，速度不算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就记忆所及，按照文史资料下限至“文革”前的规定，分时期着重简要回顾一下“文革”前16年，我盟农业生产经历的主要情况。

二、解放前夕河套农村的景象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1950年3月，绥西区生产建政工作团进入河套，建立绥西区专员公署（后改为陕坝区专员公署）。当时的农村，土地一片白茫茫（碱），到处是断垣颓壁。10%的地富，占有了70%的土地，贫苦农民过着“一门一窗，人起炕光”，“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当时的农业人口只有10万人，整半劳力4万人，人口与劳力相当于1965年的1/7，每个劳力负担耕地60亩。耕畜只有5万3千头，每头耕畜负担耕地65亩，而耕畜的绝大部分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农具是一些老式木制耩耙和二牛抬杠（犁）。耕作制度极其粗放，单纯种植业，一年

一熟，广种薄收，多数土地不秋耕，不施肥，到处是撩荒弃耕地，那里好种到那里，土地盐碱化的情况十分严重。

河套干旱少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黄河之唯富一套，也是指能够引黄河水自流灌溉，但不能自流排水。长期以来渠道和土地一样，都为大地主所霸占。如杨家河为米仓县大地主杨义所掌管，永济渠为临河县大地主李干臣所掌管，义和渠为五原县大地主王乐愚所掌管，黄济渠为天主教堂所掌管等。渠道所有制必然形成有钱有势有水，特别是多口从黄河自流引水，渠道年久失修，根本不能适应黄河河道摆动和春天枯水位时期的引水灌溉。所以水小时只见地主浇水，水大时地主怕淹庄禾，随意拨开口子分水，损农民而利自己。沿黄河根本没有防洪堤，黄河水出岸无法控制，就是干渠决口也只能任其自流。如1934年永济、丰济两渠决口，淹没了五原、临河（包括现在的杭后旗）两县总面积的 $2/5$ ，1938年永济渠决口，临河县城周围汪洋一片“成为泽国”，1943年黄河从临河塔尔湾决口，一直淹到五加河，1944年、1946年黄河都有决口。类似种种，套内几乎年年被淹，月月有灾。由于农民用水无保障，再加劳畜力困难，形成“水从门前过，不浇意不过”的不合理用水习惯，田间工程

极差，地块过大，土地不平，普遍采取大水漫灌，用水保墒、用水压碱的办法，加重了土地次生盐渍化。所以，河套的灌溉农业，在解放前封建土地所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下，再加兵灾匪患，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不可能发挥有利的自然条件，农民受害多而得利少，不但“富”不起来，相反的在解放时农业生产已面临着危机。

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1950年春，我们发动群众，组织了春耕生产。

三、恢复时期的农业

解放初期，绥西地区所辖米仓县、临河县、狼山县、五原县、晏江县、安北县、陕坝镇等七县镇。工作团进套之初，沿山一带，土匪蜂起，民心动荡不安。地主解散牛惧，杀卖耕牛，转移财产，砍树夺佃，中农顾虑观望，致使渠道失修，田园荒芜。工作团各分团，一手抓政权建设，一手抓春耕生产，组织贫雇农积极分子，广泛宣传政策，稳定民心，同时打击不法地主，剿匪肃特。进而开展了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运动，社会治安迅速好转。在生产上开展自由借贷，发放种子贷款和耕畜、农具贷款，发放救济粮，组织变工互助。同时开展禁烟运动，查割烟苗8000余亩，解放了几千户因吸毒而面临绝境的农民。

在恢复时期，许可农民开垦种植有灌溉条件的生熟荒地，播种面积扩大82万余亩，比1949年的耕地扩大1/4，总产量至1952年末为5亿2千万斤，比49年增产40%。其间在1950年和52年，小麦都遇到严重的黄疸灾害，特别是1950年损失产量88%，70余万亩小麦，平均单产只21.9斤，清明后下种的几乎颗粒无收。如狼山县11万8千亩小麦，平均亩产8.11斤，可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病害。1951年春，从包头等地和地方粮库贷放麦种5百零5万8千斤，加上农民自有种子，当年全专区种植小麦50多万亩。由于麦种基本上是商品粮，1952年又遇到黄疸灾害。但是有了1950年的抗锈经验，更加翻身作了主人的农民，劳动干劲空前高涨，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小麦锈病大为减轻，小麦平均亩产达到131斤。其他如莞豆蚜虫、造桥虫，葫麻兔丝子等危害，也很严重，由于农民重视了选种，管理也比较精细，灾情相对减轻，产量逐步上升。

在水利建设上，除了完成渠道岁修工程外，还抽调劳力修建黄河防洪堤工程和解放闸工程，1950至52年的3年间共完成春修工程土方1,000零61万方，日工262万个。完成防洪堤工程土方178万方，日工36万个。1952年夏灌时，解放闸建成放水，这个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喊了10年，只

做了两个闸墩的混凝土水闸，解放后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建成了，国家投资275万元，用日工121万个，保证了127万亩农田的灌溉。

恢复时期的农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是由于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这是主要的。同时组织变工互助，通过劳力、畜力、农具的互助，部分地解决了贫苦农民恢复发展生产的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互助组比单干户有显著增产。至1952年末，季节性互助组发展到近7000个，常年互助组发展到800多个，入组农户达到36700户，占当年总农户的56%。

四、在集体化的道路上

1953年至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是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的五年。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进一步要求劳力要统一调配，土地茬口要合理换茬轮作，但是互助组不能实现这些愿望。在互助组内，干活先后虽然推行了防灾保产合同，但是经验少，矛盾仍然不断发生。为了积极稳步地加强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吸取先进省区的办社经验，在当时绥西六县办起八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米仓县办起两个（和平社、前进社），临河

县办起两个（红旗社、曙光社），其他四县每县一个，安北县办金星社，五原县办响导社，达拉特后旗和狼山都办起先锋农业社，选拔当时的办社积极分子、农业劳动模范担任社长，县委派了驻社干部，地委亲自抓了临河县红旗农业社（社长田玉明），选派有经验的干部蹲点，总结办社经验，指导全面。在办社热潮的带动下，季节互助组转向常年互助组1,000多个，入互助组的户数达到7万户，占总农户的71%。1953年，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战胜了20年来黄河未有的枯水位。当时在多口制的自流引水灌溉条件下，小麦浇青时，黄河流量只250秒立米，经过采取安装导流装置，深挖渠底，扩大了进水量。在“用脸盆也要把渠水掏干”的战斗口号下，推行了点香头轮水的浅浇快轮制，终于使全部夏作物得到灌溉，粮食总产比1952年增产9%。在生产实践中，合作社确比互助组显示出增产的优越性，特别是米仓的前进社（社长刘巨成）、临河的红旗社（社长田玉明）、丑原的响导社（社长王过兵）、晏江的先锋社（社长侯秃子），组织领导好，增产显著，当时有“白面馒头、猪肉烩菜、分红一块”的赞誉，说明社员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1954年3月6日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从

上到下，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互助合作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春天，初级社发展到48个，实现了区区有社。到了秋后，初级社增加到113个，参加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农户达到8万多户，占到总农户的76%。并以互助合作网为基础，建立了技术推广网和技术基层组织。1954年推行了适时早种，疏播密植，增施肥料，浅浇快轮，合理作物布局等增产措施，推广了半机械化新式农具，培养了农民技术员，出现了大面积丰产田和高额丰产田。当年粮豆总产获得大幅度增产，总产6亿8千万斤，比1953年增产23.5%。

1953和54两年，贯彻执行了“以发展互助合作为中心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农业合作社显示了良好的增产示范作用。1955年春天，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初级社发展到457个，入社农户1万5千5百户，占总农户的18%。到了冬天，入社农户迅速发展到了4万2千多户，占总农户的80.4%，实现了初级合作化。

农业的丰收，促进了合作化的发展，而合作化的发展，又为取得更大丰收，创建了集体生产的组织基础。初级合作化后的1956年，迎来了巴盟农业的大丰收年景，河套灌区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的情况。全盟粮食总产达到8亿2千

万斤，比1955年增产14%，比1953年增产31.7%。

1955年秋后，毛主席“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传到了巴盟农村的千家万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的群众办社运动，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广大贫下中农，怀着丰收后的喜悦心情，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信合作化的道路是“由穷到富的必由之路”，合作化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1956年内，更由初级社迅速跨进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冬以后，高级社建起728个，入社农户11万3千户，占到总农户的87%。到1957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增加到12万户，占总农户的99.3%。全面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以后，生产力获得进一步解放，在集体生产制度下，广大社员生产积极性很高，民族团结互助，整个农村掀起了一个大生产高潮，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欣欣向荣的景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的五年，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五年，是“文革”前的16年中，农业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1957年，播种面积完成五年计划的105%，粮食单产每年平均增长15.7斤，粮食总产完成五年计划指标的111.5%，比1952年增加了71.5%，平均每年增长1亿7千万斤。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相应的提高，70%左右的农业社，赶上或超过了当时当地的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灌区农业人口增加了9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23%，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863斤，比1952年的1317斤，增加了42%。

从1953年开始，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共征购粮食13亿1,773万斤，占五年粮食总产的38.3%。商品率最高的1956年，粮食征购3亿4千万斤，占当年粮食总产的41.3%。五年间因受灾而返销粮食1,513万斤，占征购粮食数的1%。当时包兰铁路尚未修成（1958年10月1日正式通车），粮食外调有一定困难，出现过农民卖粮，粮库不收的事情。

1954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撤销陕坝区专员公署，成立河套行政区人民政府，同时结束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旗县并存的状态，6月，将杭锦旗设在米仓县的西巴噶区政府（管辖蒙民）撤销，改米仓县为杭锦后旗，将达拉特旗设在晏江县的中心区政府撤销，改晏江县为达拉特后旗，统一归河套行政区管辖。这次区划的调整，对河套灌区发展农牧业生产，加速实现合作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依靠集体力量，完

成了修筑防洪堤的工程，全长305公里，高2.5米，顶宽3米，用日工126万个，完成土方563万立方米，可防御6千个流量的洪峰，历史上第一次使河套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洪水的危害。（以后各年对防洪堤进行加固维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用日工14万8千个，完成土方75万立方米。）

但是在集体化的道路上，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批判右倾思想，积极领导农民组织起来，提前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促进了1956年的农业丰收。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急于求成，当农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对高级农业社的优越性还没有认识的情况下，在1956年冬天和1957年春天，一下子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很多人是在全国性的合作化运动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被卷入，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入社是大势所趋，并非完全自觉自愿。在1957年的夏秋间，在部分富裕中农的思想影响下，在少数游手好闲的“贫农无产者”的挑动下，农村一度出现了退社、闹事和不安心劳动生产的情况，少数人趁机弃农经商投机倒把，部分社就是在这种影响下，社员劳动情绪涣散，再加社干部缺少经营管理经验，造成了1957年的粮食减产。这一年粮食总产6亿4千6百万斤，比1954、55、56年3年都低。

1957年反右斗争结束后，河套地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的道路，树立敢想敢干的作风，下放了一批干部，充实农村基层工作。冬天，又组织了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参加劳动，领导生产，掀起一个大搞农田水利和积肥运肥的冬季生产高潮，揭开了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序幕。

五、人民公社化进程中的农业起伏

1958年到62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是人民公社发展、调整、巩固、提高的五年。其间经历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挫折，我盟农业生产曾出现较大的起伏。

从1958年1月开始，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里，广大社员打破常规，修渠打堰，开展了“向冻土进军，让冻土开花”的战斗行动。一冬一春洗挖了大小渠道共12万道，超过往年春修工程量的4倍，扩大了灌溉面积和效益。3月19日，内蒙全区在杭锦后旗三道桥召开了养猪生产现场会议，会后安茅缸、改猪圈，一个猪多、肥多的生产积肥运动，迅速广泛开展起来。不少地区改大圈、挖粪盘，开辟肥源，有的地区创造了冰上运输办法，解决车辆不足，实现满肥化。据不完全统计，积粪杂肥4,766万车，平均亩施粪杂肥

8千斤。在开展积肥运动的同时，大搞了农田水利建设，完成春修工程土方498万立方，田间工程163万立方，同时开挖了总干渠土方189万立方，加固防洪堤土方23万立方，这样大的用工量，没有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很难办到的。

1958年4月5日，河套行政区人委在达后旗（今五原县塔尔湖镇）召开了扩大种植水稻现场会议，交流种稻技术，扩大种稻面积，同时提倡扩大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种植面积。4月底从银川调入稻种350万斤，从哲盟调入玉米种110万斤。当年水稻种植面积由1957年的10万亩，扩大到60万亩，玉米高粱种植面积由1957年的24万亩，扩大到67万亩。6月14日以后，110多万亩小麦，普遍发生了锈病，20多万人投入了抗病保产战斗，调运了大批农药械，锈病及时得到控制，预计减产15%左右。秋收期间，由于水稻和高产作物面积的扩大，劳力严重不足，广大社员包括妇女老幼日夜奋战，社队之间发扬了互相协作的精神，城镇职工也抽出青壮年下乡抢收，终于适时完成了抢收任务。1958年粮食总产达到8亿4千万斤，比大丰收的1956年还多2千万斤，单产194斤，也比1956年提高8斤。

1958年8月，毛主席视察了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9月10

日，党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巴盟农村由高级农业社，迅速转向人民公社化。为了发挥“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掀起办大社的热潮，基本上把过去的一个区，划为一个公社，全盟至10月底由原来的784个高级农业社合并为28个人民公社，至年底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占到总农户的99%，公社下设管理区（后改为大队）和生产队，每个社都在3000户以上。此后在1959年和60年，社队规模虽略有调整，但仍保持大社的体制范围，并一度推行工资制，吃集体食堂。

1958年6月，原巴彦淖尔盟、河套行政区和乌拉特前旗、中后联合旗，合并成立巴彦淖尔盟人民委员会（后改为巴盟公署），盟府设在巴彦高勒市。同时撤销了陕坝镇，划归杭锦后旗，旗府由三道桥迁陕坝。撤销达拉特后旗，并入五原县。撤销狼山县，并入临河县，其中将狼山四区（即现永胜、红星、团结、联合四个乡的范围）划归杭锦后旗。撤销安北县，并入乌拉特前旗，旗府设在西山咀车站。1958年10月1日，包兰铁路胜利建成正式通车。人民公社化的迅速实现，交通条件的改善，新的行政区划调整，使巴盟的农业生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和大型水利工程建设。

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速度，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1958年8月5日，创建了巴盟农业机械化学校，在巴盟农业局增设了农机管理科。开始引进拖拉机96台，3523马力，平均每台36.7马力。联合收割机3台。在此以前，全盟有拖拉机KD3510台，是1956年引进的，其中八一站7台，五原站3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5年当中，机械化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至1962年，农业用拖拉机达到173混合台，折合298标准台，加上劳改农场和农垦系统的拖拉机共242混合台，机耕面积195万亩，占总播面积的40%。各种机引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为了有效控制黄河的进水量，在每年春灌期间枯水位也能保证灌溉，1959年5月到1961年5月，国家投资兴建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同时在灌区和山旱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仅1960年投入劳力701万个日工，最高日出劳力6万6千人，占农村正半劳力的1/3，青壮劳力大部分投入水利建设。黄河枢纽工程在拦河大坝合龙截流前，参加建设的人数近2万人，除我盟的社员、干部职工外，包钢等16个单位也派出施工队伍支援建设。拦河大坝采用了河套地区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跌帚棒”办法，于1961年5月13日晚11时，黄河截流，大坝全长475米。15日总干

渠放水，全长150公里，渠首至一闸过水流量400秒立米。连同枢纽工程国家投资8470万元，相当于50年至61年12年巴盟农业税总和。完成土石方2381万立方，浇筑混凝土8万3千6百立方。修建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广大社员和干部，吃大苦，耐大劳，发挥了空前的革命干劲，为巴盟农业的稳定增产，提供了水利保证，改变了历史上枯水位不进水，水大时受淹的状况。1962年出现了相当于1953年的旱情，5月上旬黄河流量只281秒立米，总干渠引水220个，在大旱之年，相对地保证了灌溉，第一次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从此每年减少引水渠清淤工程120万立方，每年减少引水渠用柴草800万公斤，减轻了农民负担，特别是减除了最愁人的挖泥疾苦。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的1962年，巴盟灌区从总干渠引水的大干渠10条，支渠1,208条，斗渠7,067条，农渠13,027条，毛渠约2万条，基本上形成了纵横棋布的灌水渠系网。

人民公社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农区牧业和林业生产有了相应的发展。至1962年末，河套灌区大小牲畜头数，达到123万6千余头，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增加了48%，造林面积也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增加一倍。队办林场星罗棋布，并采取固沙造林、封沙育草等措施，围攻沙丘，减

轻了风沙对农田的侵压，仅1959和1960年两年，用飞机种草的面积达121万5千亩，飞行196小时，348架次。

依靠人民公社，开展了科学种田活动，因地制宜贯彻执行八字宪法，对旧的耕作制度逐步有所改革。

在灌溉用水方面，重点搞了平整土地，缩小地块，合理用水。5年期间3亩以下的地块，约占耕地面积的70%，秋季推行早浇保墒，控制浇老秋水。总干渠引水以后，1961和62年两年，灌溉用水在30到33亿立米之间。在山旱区发展井灌20万亩，山洪灌溉1万5千亩。

在改土治碱方面，灌区秋耕面积逐年扩大，大体占到总耕地面积的90%左右，彻底扭转了撞茬下种的旧习。1958年灌区曾一度大搞深翻，秋冬间全盟投入深翻的劳力8万3千人，畜力6万8千头，深翻1尺以上的地块115万8千亩，占到1959年总播面积的30%。过深的耕翻虽不足取，但突破犁底层，深度在6至8寸的，均表现增产，从此给秋深耕带了一个好头。

积肥施肥方面，在1958年大搞积肥运动的带动下，至1962年，全面推行了“三有”（人有厕所猪有圈，户户有积肥坑）和“三专”（专人、专畜、专车）常年积肥制，肥料的质量和数量有

了提高和增加。施肥的面积在扩大，拉土的面积在减少，肥效较好的旧土圪旦实际上也很少了。59至62年间，每年施肥面积约占总播面积的50—75%，亩施肥量一般5千至8千斤。

在良种推广方面，大部分生产队建立了种子田，以农民选种家为骨干的社队良种场在逐年建立，至1962年春耕时，社办良种场或良种队45处，繁殖良种2527万斤，良种面积逐年扩大，1962年粮食作物的良种面积，占到播种面积的57%，纯度一般达到90%以上，当时的小麦抗锈、逃锈品种以甘肃96号为主，搭配品种有二道眉（碧玉麦），梁来友白皮麦等。玉米高粱均为地方品种，玉米如金顶子、白马牙，高粱如大黄壳、二歪脖等，1964年以后开始推广杂交种。

在合理密植方面，小麦、葫麻的匀播密植已普遍推行，小麦的播种量由五十年代的25斤左右，普遍增加到30至40斤。葫麻由5斤左右，普遍增加到8至10斤。不少社队扩大间套种面积，合理换茬轮作，充分利用地力。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各旗县都开展了以防为主的预测预报工作，1958、59、60年三年，都有小麦锈病发生，由于防治及时，减产只占5—15%。小麦的药剂拌种普遍推广，约占小麦种植面积的80%左右。糜子实行了温水浸种。

在田间管理方面也逐年加细，锄、刨、培土等管理工作，基本做到庄稼不熟、管理不停的要求。车辆和农具也在改进，除大型机引农具外，十行播种机、圆盘耙和双轮双铧犁，逐步推广，老式的木轮车开始被大、小胶轮车取代。此外化肥的使用，由1957年以前的不愿用，开始尝到甜头。1957年全盟化肥销售只71吨，58至62年五年间，平均每年销售化肥2,080吨，最多的1959年，达到4,270吨。

总之，农业“八字宪法”的应用和推广，促进了增产，农业科技工作受到普遍重视。农业科技人员至1962年达到253人，比57年增加了88%。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由点到面逐步开展，出现了不少大面积丰产田和高额丰产田，涌现出各种先进样板339个，粮食平均单产在400斤以上的生产队有163个。在生产实践中，更丰富了农业“八字宪法”的内容。

但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巴盟农业生产一度遇到挫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领导思想上，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认识不足，大办“小、土、群”的社队企业，大办工业，大搞基本建设，挤挖了集体生产的劳动力，1959年至61年的3年间，农村整半劳力比1958年减少24,739人，农村整半劳力占农业人口的比例，由1958年

初的44%，降到41%。社队干部错误地理解“一大二公”的含义，以行政命令平调生产队的集体财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生产指挥上存在严重失误，如忽视土地利用要种地养地相结合，盲目提倡大丰产方，不适当的大种水稻，1959年水稻种植面积达到77万亩，无排水条件，地下水迅速抬高，盐碱扩散，稻、稗、草混长，产量很低，1960年水稻亩产只156斤。在种植面积方面，1959年强调少种、高产、多收，播种面积比58年减少20万亩，1960年又提倡多种多收，播种面积比59年扩大70万亩，当年粮食平均单产只130斤。此外不适当地提倡深翻，不适当地提倡密植（如小麦十字交叉播种，下种量50至60斤）结果都造成减产。1958年曾有人在报纸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口号，不适当的估产，追求卖粮“放卫星”，造成购“过头粮”，以致在1958年大丰收以后，1959年春天，就出现缺粮。1959年原报产粮食9亿4千万斤，在此基数上征购粮食3亿5千万斤，以后核实粮食产量为7亿1千万斤，商品率占49%，超过“卖粮难”的1956年的商品率41%的比例。1960年春耕期间返销粮食5,153万斤，为历史上返销粮食最多的一年。1960年和61年集体留粮标准也偏低，61年每亩平均留籽种15斤，每

头牲畜平均留料157斤，每人留口粮平均原粮286斤，相当于“一五”期间三大留粮标准的60%左右。

1959年至61年为全国性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河套灌区在引水灌溉上，有着有利的条件，但由于气候因素，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危害也很严重，1959和60两年，小麦麦杆蝇、锈病等20多种主要病虫害，发生面积都在100万亩以上，占总播面积的20%，因此也不能否认自然灾害对巴盟减产的影响。

1960年11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明确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12月4日，内蒙党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又作了九条补充规定，对自留地、自留畜的数量，生产小队的超产奖励办法等作了具体规定。我盟为纠正“平调”错误，1961年拨出平调退赔款286万元，农业无偿投资243万元，重点对贫困队作了扶持。

1962年9月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

础，制定计划应以农、轻、重为次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公社的各项工作开始有章可循，其中第四十八条，对于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了新的规定，有力地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中央和内蒙上述有关政策规定发布以后，广大干部和社员深受鼓舞，热情拥护。但是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增产和减产的因素，往往是前一年或前几年的主客观因素造成的，扭转不利因素，也不能立即奏效。到1962年末，单产、总产均有回升，但也只相当于1953年的粮食总产水平。三年困难时期，巴盟的农业生产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在农业发展的里程中，出现了相当大的起伏。

1962年冬天，党中央发出集中全党全国力量支援农业的伟大号召，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后的三年即1963年到65年，进入了调整时期。

六、调整时期的农业回升

1963年5月20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指出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和组织阶级队伍等问题。63年秋收尚未结束，全盟农村立即组织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9月10日，党中央发布了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后十条，前十条和后十条合称双十条）。明确指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开展“四清”，以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运动的五个要点。根据党中央发布的“双十条”的规定精神，1964年秋收后，农村即开展了分批分期的“四清”运动。1965年1月14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我盟农村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中的各种破坏活动受到打击和制裁，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挤挖集体经济的思想行为受到批判，基层干部中的腐化变质分子受到撤换或处理。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规定，调整了社队规模，处理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从62年到65年公社一直保持76个，大队划为514个，生产队划为3,387个。基本上实行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从1963年到65年，全盟认真贯彻了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1958年以后从农村进城的职工，精简动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至1965年末，农村整半劳力增至29万3千人，比1957年底增

加了10万人。

在作物布局方面，重点压缩了水稻种植面积，除了有排水条件、红泥土质并能成片种植的以外，其余的稻田一律关闭，稻田面积由1962年的36万4千亩，1965年压缩为4万亩，单产也由62年的187斤，提高到246斤。粮经比例也作了适当调整，62年经济作物只占总播面积的7%，到65年经济作物占到9%。主要是扩大了糖菜种植面积，支援制糖工业，增加农民收入。内蒙人委也相应地作出各项奖励种植糖菜的规定，如价格由2分提到3分，奖售白糖、白酒，返回废丝50%等。糖菜种植面积由1962年的13,000亩，发展到4万亩，给包头糖厂交售糖菜1962年只交了12吨，1965年增加到3万吨。蔬菜生产由困难时期强调数量的“瓜菜代”，转向提高质量，发展茄果类细菜，引进优良品种，使品种多样化，早中晚熟搭配，改善人民生活。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副业生产，也有了发展，其中采挖药材、编织、跑运输、养殖捕捞以及队办手工业作坊有了较快的发展。为了加强水产品的购销工作，1963年4月，水产业务由农业局移交供销社管理。

在调整时期，河套灌区的牧业和林业生产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大小牲畜65年达到206万头，

比1962年末，增加了67%。造林面积65年达到80万亩，平均每户有林5亩，八个公社实现了万亩林，104个大队实现了千亩林。

农业生产总是和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而发展的，有的年份轻，有的年份重。1963到65的3年间，都遇到了严重的秋旱，1964年春播后雨涝返碱，造成小麦的严重死苗，夏季在5月30日以后小麦锈病蔓延达到113万亩，特别是老稻田、老秋水地、背风靠沙地以及清明后播种的地特别严重，但由于选用抗锈品种，及时组织防治，再加6月下旬风多雨少，气温偏低，没有造成大的减产。秋季又遇到百年罕见的黄河特大洪水，最大洪峰达到5900秒立米，20多万人上堤防洪，黄河防洪堤第一次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在抗拒各种自然灾害中，广大干部和社员，响应党的号召，指向那里干到那里，同心同德，吃苦耐劳，终于取得农业丰收，产量逐年回升，生活逐年改善。三年平均粮食总产达到7亿7千5百万斤，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平均总产增长18.5%，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平均总产，增长11.2%。至1965年，粮食总产达到8亿6千4百万斤，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总产水平。

1966年8月以后巴盟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三年恢复时期打下一个好的生

产基础，1966年粮食总产达到9亿斤以上、单产200斤以上的好收成。但此后的10年，农业生产又进入徘徊不前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历年粮食总产详见下表：

年度	粮食总产 (亿斤)	年度	粮食总产 (亿斤)	年度	粮食总产 (亿斤)
1949	3.02	1959	7.11	1969	6.79
1950	2.79	1960	5.51	1970	6.93
1951	4.21	1961	4.89	1971	8.87
1952	5.21	1962	5.62	1972	7.75
1953	5.59	1963	6.92	1973	8.25
1954	6.81	1964	7.69	1974	8.47
1955	7.27	1965	8.64	1975	8.68
1956	8.26	1966	9.49	1976	9.90
1957	6.46	1967	9.26	1977	7.98
1958	8.44	1968	7.74		

七、“文革”前对发展农业的探讨

回顾从1953年到1965年的13年间，在三个时期中，巴盟的农业生产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形状态，单产低而不稳。以河套灌区优厚的

自然条件，单产竟然没有一年能上200斤，三个最高产量年份的1956年、58年、65年，单产也只分别达到187斤、194斤和191斤。其间巴盟盟委和公署曾多次组织盟内外农业科学工作者考察、探讨河套灌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途径。据我所知，有的认为：河套灌溉工程建设成绩显著，保证灌溉面积有了扩大，但有灌无排，不能控制土壤次生盐渍化，应着手建设排水系统，逐步做到灌排配套，农业才能稳产高产。有的认为：建设排水系统固属必要，但靠地方投资，资金不足难以解决，应以农牧林综合措施建设基本农田，营造农田防护林，建设生物排水工程，并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投资少，效益大。有的认为：实行科学种田，在提高单产上下功夫，停止开荒扩大面积，禁止撩荒弃地，反对广种薄收，并尽快推行草田轮作，重点扩大草木栖、苜蓿的种植面积，安排必要的种子投资解决种源不足的困难，以有效地解决地缺肥料，畜缺饲草，人缺燃料的“三缺”矛盾。有的认为：提高农业产量，土地再加工的资金不足，应适当发展经济作物，增加社队收入，并要打破旧的单一经营方式，开展多种经营，社队富起来了，扩大再生产的力量也就大了。所有以上列举的意见，都各有其针对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间内蒙农业厅

厅长高布泽博同志，曾多次来我盟，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宣讲发展农业必先发展林牧业的论点。副厅长张立范同志，也反复论证河套灌区必须实行草田轮作，大种苜蓿，培肥地力，农业才能有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并亲自在狼山农场搞了试点，取得一定成果。他们两位不辞辛苦在全盟各级干部会议上到处宣讲，很有说服力，也很感人。

关于怎样实现农业生产革命化的问题，也曾组织农村工作干部进行过多次探讨。有的认为：首先应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毛泽东思想改变人的精神面貌，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有的认为：加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改善农业生产的生态条件，特别是改变19%的困难队，和改变占总耕地面积25%的低产田的生产条件，应该作为工作重点。也有的认为：领导者必须解决好当前生产和长远建设的矛盾，不搞农田建设就谈不到农业生产革命化。农田建设必须进行农牧林总体规划，因地制宜，不必搞棋盘式的方块田。但在当时，还没有人提出过改变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各种设想。

八、新的里程——农业的飞跃

本文重点回顾了“文革”前的巴盟农业发展概况，但在本文执笔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春风已吹遍了巴盟大地，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出现了新飞跃。我们兴奋地看到：过去十几年争取实现的粮食单产“上纲要”（指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长城以南粮食亩产达到和超过四百斤），而没有办到，但在三中全会以后短短的四年，1983年灌区的粮食亩产达到411斤，全盟包括山旱区，粮食总产超过12亿斤，扭转了三中全会以前粮食总产长期徘徊在8.9亿斤上下的局面。农业总产值1983年达到6亿5千万元，比1978年的3亿1千万元增长了1.1倍，成为全国11个翻番地区之一。

过去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结果是粮食没有上去，经济作物也没有上去。三中全会以后，调整了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导下，以葵花和甜菜为主的经济作物得到飞速发展，至1988年，粮食总产达到14亿8千万斤，比1978年的8亿9千万斤，增长66%，农业总产值达到19亿6千万元，比1978年的3亿1千万元增长了5.3倍，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707元，比1978年的人均纯收入68元增长了10倍多。1988年油料总产达到4亿4千万斤，比1978年的1600万斤增长27倍，甜菜总产达到15亿斤，比1978年的3亿4千万斤，增长3.5倍。由于油料和甜菜生产的发展，制油和制糖工业得到相应的发展。1988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亿6千万元，比1978年的2亿2千万元，增长了3倍多。

由于粮食的增产，农区的养殖业得到相应的发展，1988年农区牲畜头数达到292万头（只），占全盟牲畜总数的71%，比1978年农区牲畜只有127万头（只）增长了1倍多。农村出现了养畜热，出现了一批农牧结合、增产增收的重点户。

在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农村工副业生产，在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乡镇企业群体，成为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述农村的各项巨大变化，抚今追昔，使人感慨万千！我盟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间，为发展农业生产做了大量而艰巨的工作，首先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关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清除了农村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根据地区特点，扬长避

短，发挥优势，改变了农业生产的管理体制。1979年开始有9个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到1982年，全盟4,296个生产队，全面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与此同时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国家又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发展家庭和集体养殖业和副业生产，扩大了农村和城镇的集市贸易，城乡经济活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景象。

随着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正在兴起，农科户、专业户相继涌现，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吸引着千家万户，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在培肥地力、推广良种、地膜覆盖栽培、防治病虫害杂草害等方面，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特别是小麦套种覆膜玉米带田面积的发展，改变了一年一熟、夏秋田单作的耕作制度，提高空间的光能利用，充分发挥地力和光照的优势，从而获得大幅度增产的效益，各旗县相继出现了亩产2千斤的“吨粮田”。全盟粮食亩产（包括山旱区）由1978年的237斤，1988年达到512斤，增长了1倍多，其中小麦亩产由202斤，提高到452斤，玉米亩产由540斤提高到940斤。因此在不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的条件下，粮食总产能够大幅度增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年粮食总产见下表：

年度	粮食总产 (亿斤)	年度	粮食总产 (亿斤)	年度	粮食总产 (亿斤)
1978	8.98	1982	11.36	1986	12.31
1979	9.58	1983	12.01	1987	13.08
1980	8.51	1984	12.09	1988	14.81
1981	10.55	1985	11.59		

我盟黄灌区的四个旗县杭后旗、临河市、五原县、乌前旗以其优厚的自然条件和土地的增产潜力，已于1982和1983年先后被中央和内蒙列为商品粮基地试点旗县，国家已投资2千多万元，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良种繁育，农业技术推广，开展多种经营以及智力投资等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粮生产的发展。

为了彻底解决我盟黄河灌区农田的次生盐渍化问题，世界银行贷款6,600万美元，帮助我盟解决排灌配套问题，加上中央和地方的配套资金，总额达5亿多元人民币，从1988年下半年起，分年使用。管好用好这笔巨额资金，将对改善我盟灌区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起决定性的作用。前程似锦，经过我盟广大科技工作者、干部和百万农民的协同作战，一个粮多、畜多、林果多的“河套粮仓”，将很快呈现在祖国的北部边疆。

本文以农业的飞跃作为新的里程的开始，并对巴盟的农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文革”前作了简要对比，目的在于使亲身经历过的一老一代的同志，对巴盟的农业生产所经历的前进与挫折，领导指挥上的成功与失误，作进一步的经验总结；对青年一代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也不无可鉴镜之处。我以上述心情，写出了这篇粗略的回顾，有待知情者予以批评指正。

新中国农业税收 政策之体验

李 清

几千年来，农业一直是我国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农业经济的情况，农民的生活情况，对国家民族的兴衰，社会繁荣与凋敝，政局安定与动乱，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民负担则是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处理不当，便会引起严重后果。

从我国古代历史上看，各个封建王朝，由于当时国家性质的决定，农民负担象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一代比一代加重。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农民负担又达到了最高峰，但它们和其他历代王朝相同，接踵而至的便是出现农民运动和农民起义最后被人民推翻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对农民负担问题，历来是非常重视的。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针对当时反动政府苛捐杂税残酷压榨人民的不合理税收制度，

明确提出“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废除厘金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建立人民自己的合理税收制度。在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分别制定了能够适应当时情况的税收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全国各地解放迟早不尽相同，老解放区继续沿用比例税制，适当降低了税率，减轻了群众负担。在巴盟这个新解放区，土改前实行《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当时，为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和合理负担政策，条例规定农业税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多，税率越高。到1952年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阶级情况和土地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又改为实行比原来差额小的全额累进税制。农业合作化以后，随着情况的变化，于一九五八年六月由毛主席亲自批准，并颁布了新的农业税法，也就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统一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盟和全国、全区一样，各级党委对农民负担问题十分重视和关怀，坚持贯彻了1953年政务院规定的“种多少田地，应产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公平合理、鼓励增产的政策，执行情况是良好

的，收到效果也是显著的。现在，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新中国的农业税收政策和实际执行情况，从而可以体会到我国农业税制的无比优越。

一、新中国农业税是贯彻了合理负担政策

合理负担政策的原则，是收入多的多负担，收入少的少负担，使农业税的征收适应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纳税人的实有负担能力。例如：

（1）我盟在解放初期，根据农村封建半封建的关系，农业税实行累进税制，对收入高的地主、富农阶级，按高税率征收，当时最高税率为42%，即计税收入为100斤，征税42斤；对收入低的贫农、下中农依照低税率征收，最低税率为7%，即计税收入为100斤，只征收7斤的农业税。

（2）农业合作化后，消灭了富农经济，个体农业经济转变为集体农业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必要进行累进税制，全国统一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制。根据地区不同经济情况，分别制定税率，在同一地区内不分征税对象，按同一税率征收。但在旗、县之间，乡、村之间税率是有差别的。例如，我盟全盟平均税率为15.3%，但是杭后旗农村经济情况较好，税率为15.9%，乌

前旗(包括山旱区)条件较差,税率为14.3%。在临河市的二十个乡,税率也各不相同,建设乡税率最高为16.5%,新丰乡税率最低为15%。

(3) 农业收入的计算(是征税依据),对不同的农业收入采取不同的计算标准和方法。例如对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按照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而常年产量,是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一般是土质、水利、地势、气候、风向、阳光等条件)和一般经营情况(是指当地一般农业生产对土地所花费的劳力、畜力、施用的肥料和机械设备能力以及耕作技术和复种指数等)来评定正常年景下农作物正产品的收获量。常年产量,既不按先进的生产水平,也不按落后的生产水平,而是按照当地一般的生产水平去评定。这样,分别地区、分别农作物的不同情况,分别核定计征农业税土地的农业收入,既照顾到各方面实际情况,也体现了收获产量高、应该多负担的公平合理原则。在一个旗、县、市范围内,乡与乡、村与村、社与社之间由于当地经济情况的不同,其计征农业税的常年产量也有区别。例如临河市全市二十个乡,平均每亩计税常产为161.5斤,但各乡计税常产都不相同,最高的乡平均单产为193斤,最低的为152斤。

(4) 合理负担政策的贯彻,还体现在征收

办法的具体规定上。例如为了平衡农村、牧区的负担，政策规定按农牧业收入比重划分征农业税或征牧业税，即“征一不征二”的原则；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等等。

二、新中国农业税贯彻了稳定负担，鼓励增产的政策

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计征农业税的农业收入，是按常年产量，而不是按实际产量，在常年产量评定之后，因勤劳耕作，改善经营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常年产量不予提高，也不多征；因怠于耕作而降低单位面积产量的，对常年产量不予降低，也不少征。例如，我盟现在计征农业税的常年产量每亩平均主粮（糜子）为153斤，这还是在1953年查田定产时评定的基数，三十多年来，农业产量平均单产由1953年的160斤，到1985年上升为417斤，而计税产量，迄今还未提高，这充分体现了鼓励生产，增产不增税。

二是农业税征收办法还规定，因遭受自然灾害，对积极抗灾而灾情显著减轻的，在计算灾情减免时，不少给予减税免税；因消极抗灾致使灾情加重的，也不多给予减免；同时，对不同的农

作物的征免范围规定上，支持什么，鼓励什么，态度鲜明，这都体现了促进生产的具体措施。

三是从建国以来，农业税征收数额，基本上是稳定的。以下是我盟各个时期实征农业税的主粮数（因计征农业税按主粮为计算本位）

各个时期	实征农业税 (主粮万斤)	每年平均征收 (万斤)。
恢复时期 (1950—1952)	20859	7953
一五时期 (1953—1957)	43363	9672
二五时期 (1958—1962)	46125	9525
调整时期 (1963—1965)	26671	9057
三五时期 (1966—1970)	41024	8204
四五时期 (1971—1975)	44560	8912
五五时期 (1976—1980)	36011	7202
六五时期 (1981—1985)	37677	7356

以上表明，我盟从建国以来，所征农民的

农业税，平均每年为8千万斤左右，农民负担基本是稳定的，而且是“稳中有降”。由于农民负担的稳定，促使群众放手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对加快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新中国农业税制还规定了优待和减免办法

在征收农业税的制度和法规中，规定了一系列的优待和减免办法。其中包括：

(1) 对自留地、饲草饲料地、林粮间种地以及科学试验田等需要扶持和照顾的农作物，仅在1985年，全盟共有56万亩土地免征了农业税，占总播面积435万亩的13%。免征税额主粮折款220万元。

(2) 对遭受自然灾害而减产减收的，按照税法规定，本着“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原则，减免农业税55万元。

(3) 对产量低、收入少的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贫瘠山区以及其它贫困地区，为照顾其生产生活困难，共减免农业税66万元。

(4) 对全盟七个重点贫困乡，从1985年起免征农业税70%，免征三年，每年减免税额61万元。

以上四项在1985年共减免税额4百多万元，

约占应计征税额的22%，所有纳税户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减免照顾。

此外，为了扶持贫困地区农民休养生息，尽快摆脱贫困面貌，于1972年至1980年，对生活困难的贫困户共减免历年农业税568万元，约有6万多户得到减免照顾，平均每户减免税收100元左右；又于1979年至1982年连续四年实行了起征点的征免办法，全盟共有7万多户（占总户数的1/3）减免农业税137万元，每户平均减免负担200元，所有这些在税收上的各项减免照顾，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加速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均收到了良好效果，受到了群众的称赞。

四、从农民负担水平看，体现了轻税政策

“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这是党和国家在征收农业税方面，所采取的一贯政策。它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情况决定的。从我盟多年来实际执行情况看，是贯彻了这个精神，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数字加以说明：

一是目前全盟粮食总产，由恢复时期年产3亿8千万斤，到1985年上升到11亿6千万斤（已增加两倍之多），而农业税负担，仍稳定在8千万斤，还低于1957年实征1亿1千万斤的30%。

二是随着农业生产逐年发展，全盟农业税负

担占农业收入的比例，由建国初期的12%，到1985年已下降到3%以下，即相当于全国负担比例。这种负担水平，显然是很低的。又由于计征农业税是以常年产量（每亩平均153斤）为计税依据，而常年产量又低于目前实际产量（每亩平均417斤），虽然现行税率全盟为15.3%，这只是名义税率，而不是实际税率，真正实际税率应该说是3%以下。

三是长期以来，农业税负担一直是执行着增产不增税的政策，而农民纯收入随着农村经济情况的不断变化，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0年的55元，到1985年增加到268元之多，这就说明，对农业增产部分，国家并没有多征，而是全部留给农民用于增加生产，改善生活。

以上，足以看出，目前农业税负担应该说是很轻的。但也应看到，目前农村除农业税外，还有其它各项摊派负担，而且有些地区，为数很大，群众难以承受，是有意见的。这往往和农业税混淆在一起，容易误解为农业税拿的多了。这应严格划清界限。对存在的上述问题，党和国家正在不断采取措施，制止不合理的负担和摊派，将会得到逐步解决。

五、新中国的农业税，充分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新中国征收的农业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起到不同的重要作用。从当前来看，它对建设社会主义积累资金，调节不同经济成份和地区收入仍有其重要作用。尤其是从我盟农区旗、县、市看，这项收入约占财政预算收入的1/3左右，对平衡财政收支预算是一个重要因素。

再从这项收入使用方面来看，它完全是用于广大人民方面，促进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是有益于人民的。其中实际用于农民的数额，更是十分明显，就以我盟来说，近二、三年来，每年向农民征收农业税一千多万元，而国家每年又拿出很多资金，支援农业，（例如1985年用于支援农业投资达4千8百万元）这就完全可以说明农民之所得，大于其所失的两、三倍之多。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中国农业税，确实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以上种种，足以说明新中国对农民负担问题，党和政府一贯是非常重视和关怀的。在征收过程中，从不伤害于民，始终贯彻着公平合理、鼓励增产的轻税政策。这和旧中国田赋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从实质上看，有

着根本的区别。

为了划清新旧社会农民负担的不同性质，在这里再简要地说明一下旧中国的田赋制度是，附加胜于正税，摊派又高于附加，当时在群众中通称“统计粮”，正说明农民负担项目之多。也正象国民党时期在大公报上1935年三月间登载着傅作义对县长训话时说到的：“一个农民全年的负担，省款占10%，县款占15%至20%，而区村的摊派，占到一个农民负担的75%至80%”。从征收对象看，地主大户凭借他们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势，把沉重负担转压在贫苦农民身上，致使地富“田多赋少”，甚至“有田无赋”，而贫下中农则是“田少赋多”，甚至“有赋无田”。正如当时在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富人轻、穷人重、数九寒天冷房冻”。“身无遮体衣，家无隔夜粮”。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旧社会农民负担的不合理，达到了何等地步。再从使用上看，其所征田赋，是为反动统治者贪污中饱，发财致富的重要工具，其真正用于农民身上，是一无所有。完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这和新中国农民负担对比起来，是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四十年代绥西汽车 运输业片断

姜宝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侵略军军用和民用汽车，弃置在包头地区的为数很多，有一批经非法倒把之人出售给了私营汽车业主。

1946年春，包头市私营汽车约有20多台，分散经营运输业务，这时有的车主提议组织合作社，共同经营运输业务，当即推选张克忠、张锡祥、宫在韬等人筹建“包头市汽车合作社”，嗣经包头市政府批准成立。并在五原县、陕坝镇两地设了营业点。其地址，包头设在东河区和平路（今消防队院内），五原县设在苏阿訇店院内；陕坝镇设在小转盘东路北。该社在组建初期仅有汽车19台，其厂牌多为日本造大、小同合，其次美制福特、雪佛兰等，都是些老旧车辆。配件缺乏，修理机工具也不配套，修理技术又不太高，基于各种因

素，技术要求不甚严，这就很难杜绝带些微小毛病的车进行营运。

在汽车合作社成立后，仍有些零散车经营运输，自揽货、自运，没有常设地点售票、组货，感到处处不便，不如组织起来好办事，但又不愿参加汽车合作社，他们公众推选徐亮等为代表，转报绥远省公路管理处拟成立“汽车运输站”，嗣经公路处批准，在包头市与河套的陕坝两地成立了“汽车运输站”，并在包头设立了汽车保养厂，两站一厂均于1947年6月份正式成立。建站初期，仅有老旧汽车7台，亦是些日本产的大、小合同，美国造的福特、雪佛兰、小万国。七台车为7个车主所有，车主姓名是：徐亮、张振芝、王树田、胡永福、郑志祥、李宝光、李汉卿。

包头汽车运输站站长张雨浓。站址在包头市东河区胜利路转盘西。

包头汽车保养厂厂长崔宝臣。厂址在包头市东河区通顺街西头。

陕坝汽车运输站站长齐升平。站址在陕坝镇南门里路西。

五原县因系路过点，当时未曾设站，其运输业务由五原服务社代办，汽车运输站的汽车过往均住该社。

包头至河套，甚至银川、兰州等地的运输，

都要依靠上述两个运输机构去解决，虽然后来西北公路局从兰州开放了兰州至包头班车，因非日班，满足不了旅客旅行要求，因此包头至河套之间的客、货运输，仍得依靠绥西之汽车为其解决问题。

绥西两个运输机构的汽车，都是些老旧超龄车，运行在途中常发生故障，小故障可随时排除，遇到较大故障，排除就困难了，车上又无备件可换，只得拆开修整。行走一段时间又发生故障，就得再修，本来包头至陕坝才330余公里，按正常行车速度来说，两天到达是轻松的，可是绥西之汽车最快的是三天，有的走四、五天，个别车能走七天。包头日报有鉴于此，曾在该报发表过一篇报道，只记得如下一段顺口溜：

“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形容汽车运行的实际情况，虽然有些言过其实，讽刺过甚，确也有极个别的车，走走、修修、再走走、再修修，不是修理引擎，就是整轮胎。有些车辆、轮胎很坏，达到用螺丝拧住或用链条绑住的程度。他们还说：别看我的车不好，国际名人还跟我车跑，一个是“肚勒丝”，一个是“罗丝缚”。（轮胎用螺丝拧住的叫“罗丝缚”，用铁链绑着的叫“肚勒丝”）。

为什么两天路程，能走三天呢？一是包头发

车不定点；二是取货到门（到货主存货点装货，凡托运量在500公斤以上者，都执行到门装货）；三是车主存在多收入为好，要等客人。由于上述几个原因，一般发车都在十点以后，再加上出城门要检查（检查旅客通行证、货物等），所以当天只能住公庙子（今包兰铁路公庙站），第二天住五原（五原设有军警联合检查站），第三天才能到达陕坝。

所有车主家都住在包头市，因此，就以包头为始发站。车辆实行挂班排队，依先后顺序轮流派车，正常情况是每天从包头发两台混合班车到陕坝（汽车运输站、合作社各一台）汽车站的车，每台车每月可运行三个陕坝往返，约计18个至20个工作车日，工作车率相当70%左右。这类车比较多，真正技术状况不是这样好，而是车主和司机、助手们都想多收入一些，轮到班期不能出车时，往后一推就是四五天。因此，车辆技术状况本来不完好，也总要勉强出车，这就难免带些毛病，造成途中修理，习以为常，更主要的是互相效仿。站上又无技术检验办法，只要能开上走就行了。汽车合作社的车也是如此。

车辆是老旧超龄的，轮胎也是破旧的，但每台车可供养三家人生活。（车主、司机、助手）除此而外，车主还有盈利。

司机、助手除有月薪外，凡站外和沿途乘车旅客收入的钱，全部归司机和助手，他们的分配比例是：司机得60%，助手得40%。出车时的伙食、住店费由车主负担。

汽车客票票价：包头至陕坝15万元；包头至五原10万元。货运价格：每百公斤包头至陕坝12万元；包头至五原8万元。货票上还盖有“途经泥淖、涉沙渡水、所需费用概由货主负责”的戳记（上述币值均为国民党法币）。1948年冬至1949年9月19日以前，曾改用金元券，一元顶一万元法币。客、货运价亦相应改为以元为单位计算。

包头至宁夏的交通，除公路以外，尚有黄河航运、驼运两条路线。公路汽车从包头承运纺织品、鞋帽、棉花、棉线、书籍、文具、纸张、五金器材、日用百货等至河套各地。而再由河套装运皮毛、瓜籽、药材、油脂（牛羊油）油料、粮食、肉类（冬季运）等到包头。

运输情况：包头至陕坝每天发两次混合班车。自1948年，由于从河北、山西、山东及陕北农村流入河套很多农业及手工业人口，包陕公路交通日益繁忙，由原来每天发两次混合班车逐渐增加到四至六次，旅客、货运大增。汽车运输机构也由两个发展到四个（即汽车运输站、汽车

合作社、北平商车联营社、绥新汽车行)。这时的汽车增加到七、八十台。北平商车联营社，原为国民党给陕北守军运粮，从北平征用来的，陕北解放后，军粮运输任务停止，除部分车返回北平外，留住包头市的改为社会运输。该社地址设在今包头市东河区胜利路转盘东路北。而在河套并未设营业点，其运输业务委托陕坝运输站及五原代办站办理。绥新汽车行仅有三台汽车，该车系从兰州来包。这么多汽车挤在包头，所运行路线主要是包陕。伊盟、固阳的运输事业，微乎其微。每天都有很多车因待货停驶，组织货源工作成为重点问题，在压力促使之下，开始深入旅店、货栈拜访货主，招揽客、货源，并采取许给货主坐前座（驾驶室座位）或免票乘车。（驾驶室座位是助手席，许给货主乘坐，车主就得许给助手一些好处）。如果遇到整车货源，车主还得请吃喝。这样的货源，一般不再搭乘旅客。班车不但要装货，而且还要乘坐旅客，即使货已满载，旅客多少都得拉上，遇到旅客在25人以上，站上发车人员就用大绳拴在大架子一端，围绕旅客转一圈，再拴在大架子的另一端，拦在旅客腰部。说这样车在行驶途中，遇有坑槽颠簸时，旅客可用手抓住大绳，不致摔下去，左右倾斜时，旅客可相互牵拽。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超载之

甚了。老车破旧，加上超载，行驶在公路上真是慢悠悠，所以车日行程也就是110来公里。能按着住宿点到达的是多数车，少数则走到哪里住哪里，既无饭馆，又无店，只得借宿老乡家里，祈求老乡们整点饭吃，否则抛锚在无人烟的地方，就得露宿荒野，司助称谓住“大路饭店”。这时的旅客们就得肩负行囊数里之外去投宿，司机亦可去找食宿点（那时旅店都没有铺盖）。在这种情况下，助手就得留在车上看车看货，夏、秋季节还好办，呆在驾驶室就可以了。冬、春气候寒冷，实在难挨，遇到附近有柴草时，可拣点来，燃火驱寒，否则就得围着车跑步，不然真有冻伤的危险。重大故障一时排除不了，还有雇用农民老牛拉车至村庄者。有的车连照明灯都没有，遇天晚无村庄住宿，助手用手电照路行车。化油器故障或油泵故障、汽油进不了燃烧室，就得采取直流供油，曾有一次某车行至郝进桥（夏季渠道正在淌水），助手扒在翼子板上，手抓油管往化油器里注油（直流），刚上桥忽然一个回火，助手一惊，掉在渠里，车已熄灭，司机见助手不在了，下车寻找，助手才从渠里爬出来。还有一次，车行至葛蛇桥以西，引擎响动不正常，司机责成助手从左车门出去，通过引擎盖爬到右面，查看咀子线是否脱落，助手爬过去用

左手抓车门时，恰遇门玻璃关闭着，又加车辆一颠，助手甩下车去，可巧车选择路面，行驶在路右侧边缘，助手掉在路沟内，否则不死也得重伤。行车时类似事故、不胜枚举。行车事故在旅客方面也层出不穷，例如汽车出站不远，在今包头市东河区小转盘跟前，往北一拐（那时车出西北门）便将坐在后边角上的旅客甩下车，可巧臀部着地，这位旅客衣着较厚，未曾摔伤（无发现外出血，只臀部稍红）他未敢指责站上跟司机，又怕留在包头住店吃饭花钱，只得忍气吞声，爬上车就走了。还有一次，车从宁夏返包头，路过河套又搭乘十来名旅客，行至包头附近前口子村南，有木桥、南桥台因洪水冲刷，底部被掏空，靠近桥台的一排木桩下沉，形成桥面低，桥台高，司机认为可以通过，为预防万一，动员旅客下车，步行过桥；恰遇车上有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是××中学校长之母，经他和司机商议，可以坐在车上。可是汽车过桥时，车前轮冲到南桥台突然往起一颠，把老人颠起，跌落在桥下去了。老人在车上是盘膝坐着的，跌到桥下仍保持原形。一丈多高摔下去，老人怎能受得了。车并未能冲上去，前轮已上桥台，后轮由于载重反把下沉的那排桥桩，又压下去30来公分。用铁锹想挖低桥台再开过去，但发现下面有横木垫梁，

不能擅取，只得找十轮卡车来救济，将车拖出。把被摔的老太太送医院治疗，数日后始出院。严冬敞车载客，冻死人者亦有之，如某车从陕坝返包头，行至鄠家地（今五原县复兴公社）停车时，发现一位旅客，下不了车，说不出话，抢救又无医无药，结果死去了。更有甚者如某司机在五原县西沙河桥，将车开到桥下，当场摔压死七名旅客，司机见事故严重，畏罪潜逃，由车属单位将遇难人送医院医治，死亡者用棺木装殓后，草草了事。而肇事司机，数日后即出现街头，据说又回原单位工作了。还有一次某单位新由天津市购来十轮卡车，在陕坝镇中心，驾车溜弯（非本车司机）压死一市民，司机乘人乱时逃跑了，待事故处理不久，该司机仍驾驶汽车，运行在包陕公路上，政府再也不追究了。

虽然在行车过程中，不断发生事故，除非有人身死亡，遇难家属申诉，旧政府始出面调解。其他一些伤残事故根本不予过问，对旅客乘车艰难，旅途痛苦，那就更不闻不问了。

据说日本侵略军未占领包头以前，包头市私营汽车始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当时有汽车数台，至1938年已发展到20台左右，那时主要行驶在包头至乌拉河（今杭锦后旗头道桥公社西边），再往西便是宁夏省磴口县界了。封冻后可

经三盛公（今磴口县）、老磴口（今阿拉善左旗巴音木仁公社）、河拐子（今乌达煤矿）、石咀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咀山市）、以抵银川市。日本侵占包头前夕，包头市所有私营汽车，全部撤退至银川后，都被马鸿逵攫取为军用，后又转为马私人所有。

包头沦陷后，原绥远省政府党、政、军全部退驻河套，以河套东部边陲西山咀（今乌拉特前旗）为界，西山咀以东为日伪所据，河套全境，归绥远省管辖，此时包宁公路东段，包陕交通即告断绝。原由包头供给的生产、生活之物品，不得不由昔日的东来，转变为从西面银川进货。虽然敌人侵占了包头，但部分商品如布匹、烟、糖等，仍从包头进来一批。其办法是，从河套收购皮毛，经由伊盟（黄河南）运到包头南面的昭君坟或大树湾过河进包头出售，购买成布匹等，再由伊盟绕回河套。其办法是，买通军、警关卡，即可通行无阻。

河套地区，素有米粮仓盛名，可是在抗战时期，所产之粮食，差不多都被征为军用，外运基本没有了。。

抗战胜利后，原绥远省党、政、军迁返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这时包头至河套交通始得恢复。

汽车行业对旅客流传一种叫法：红鱼、黄鱼、白鱼、臭鱼之分。红鱼坐车不但买票，还在沿途供司机吃喝；黄鱼是中途乘车旅客，款项归司机、助手；白鱼是些兵痞流氓等，白坐车不买票的；臭鱼不但不买票，还得司机供给食宿，否则会随时随地找毛病。因此，司机对这种人，必恭必敬。

旧社会司机们，驾驶破车劳累一天，收车后为了尽快入睡，有的要喝点酒，吃炒菜，有人说他们大吃大喝。也有个别司机还有恶习，花钱较随便，所以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车轱辘一转，给个县长不换”。又说：“坐进驾驶楼，吃穿都不愁”。一般人把汽车驾驶员，视为高人一等。实际旧社会司机，有很多难言之苦，驾驶的老旧车，经常发生故障，不论寒暑，遇上出了毛病，那怕雨水泥泞或冰雪满地，都得抓紧修理，否则夜间就要露宿、饿肚子。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也有一顿顶一天的时候。因此，大部分司机都有胃病。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包头前夕，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及官僚资本家、连夜逃跑，私人汽车一部分被无偿征用，往西逃窜；未被征用的第二天也随着往河套开走。据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未响一枪便解放了包头市。后来因人民解放军

实行战略转移，离开包头，退到河套的私营汽车，陆续返回包头，公路运输业务亦随即恢复了。

1949年元月，五原县正式成立了汽车运输站，站址设在五原信孚商店院内。五原县为河套地区最老的县，商业茂盛，经济繁荣。该县南近伊克昭盟杭锦旗，北邻乌拉特东、中公旗界；该旗均为牧区，所产皮毛、药材部分依靠公路，由五原转运。五原西面的晏江县（后撤销，今为五原县巴彦塔拉乡）过去虽有陕五北路，因五份子桥焚毁断绝交通，该县运输全靠五原转运。再加上乌东、中两旗南部的供销物资亦由五原进货，根据运输的需要，开始组织二柄子车承担上述任务。（开始时，是私营商业户，从包头来货到五原后，自行找牛车，后来汽车运输站承揽了此任务）。

建国以前，在包头以及河套地区，汽油与机油市场上没有专营商号，但是私营汽车的燃润料，不断得到供给，从未发现过待油停车情况。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在包头设立兵站并建有汽油库，还有一个辎汽车团驻扎在包头。汽车驾驶兵及管油人经常盗卖汽油和机油。汽车兵每次卖油为数不多，一般是一、两大桶，每桶50加仑（那时都以加仑计算），价格60元银币或白市布两匹，钱布

均可。管油人卖油一般都在五至十大桶之间。买汽车兵的油，接头后约定时间地点，双方开车到城外，一手交钱、一手取货（油）。买管油人的油，一般是先将空油桶送进油库，而后取油；也有先去验油，而后拉的。总之，都是现钱交易。曾记得有人买汽油两大桶，整回家放在院内，时值冬季，第二天往油箱加油，才发现两桶油大部分是水，并已结冰（验油有一种薄铁皮焊成的探子，细管，底部有葫芦型小罐，罐下寸许长锥型细管，验油时将管上口用大拇指按住，插到桶底放开拇指，稍停再按住管口，将探子提出，便知是否有水）。还有一次某车主买妥管油人的油，便跟随管油人进到油库验油，巧在这时兵站来人要管油人员汇报工作，便锁了油库回办公室，该车主被锁在库内，等到天色渐黑，仍不见来开门，他只得撬开屋顶铁皮，从上边爬出，跳墙回家。第二天他们见面，始知汇报完工作天快黑了，请他们上级下饭馆，安排住宿两天才离去，因此第三天来接头，当晚才把油拉回去。

私营汽车，轮胎破旧，包头市场亦无经销商号，就从军车上换胎。办法是：双方先互看要换的轮胎，讲妥价格，约定地点时间，互相将车开出城外，卸下轮胎，再用锋利小刀，将出厂胎号轻轻削下，对换贴上（用强性粘剂），好坏互

换了，轮胎号码仍是原号，军车汽车兵得到了钱，轮胎数仍保持原数。私营汽车以破换好，又省了钱，这种抽梁换柱之法经常施行。曾记得有一个车主认为换胎虽花钱不多，总不如买新轮胎好，他买了六条新轮胎，洋洋得意，可巧有一车兰州货物满载而去，谁知该轮胎质量不好，只一个单程，六条轮胎全部放了炮（轮胎爆破叫放炮）。返回时只好衬垫修整，空车返包，险些破产。从此以后，换胎之风便更盛行了。

国民党军队东移后，原驻包头的辎汽兵团亦撤走，兵站油库因无军车用油，其油已无耗量报销，不敢再倒卖。这就断绝了私营汽车油料来源。只得改制代燃炉，先制成木炭代燃，不太理想，后又改劈柴代燃（燃用硬杂木），效果较好。随之大批改为木柴炉，被使用了很长时间。但比汽油车，时速较差，而费用稍低，并减少了载重量（占去车厢面积，又增加了木柴重量）。但是给助手增加了劳动强度，发动车很费时又费事，早晨要提前一、两个小时起床，点炉、煽风、摇车（用手摇柄转动引擎），甚至多次。行驶在中途，有时还要扒炉、重新点火煽风。上坡前捅炉，爬不上时就得用硬木打掖；甚至大坡要打掖数次，才能爬到顶。收车后，又需清炉、打扫滤清器罐、片、通管道等等。代燃车司机修、驾

技术高的、助手工作成熟的，互相配合得当，行驶在途中也很顺利，个别车时速不亚于汽油车。从包头发车当天到达五原，车日行程218公里。而一般代燃车则运行一天半，个别的是两天（开始时谈到汽油车行驶两天，那是事实，后来有了好转）。代燃车不适宜载运易燃、易爆物品（曾发生过棉花燃烧，但未造成大的损失）。兼有毒气，不慎时会使旅客中毒。

解放前陕坝的货栈业

高德富 王廷英

一、货店业兴起的历史背景

货店也叫货栈，是一种代客存放货物或代销代购货物，并介绍交易从中抽取佣金的行业。

在30年代中期，临河第三区公所所在地的陕坝，工商业已初具规模，40余户商店矗立在抗建路两旁，经营日用百货、五金交电、中西药品、糖业烟酒等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但这些商店多系小商小贩及夫妻商店。规模大、资金厚、雇用店员的商店仅占10%，其中从外地直接进货或在京、津驻有坐庄的商店，仅有万利和、蚨来号、中兴号、元祥号等几户。因而陕坝地区商品来源少，常出现紧张甚至脱销的现象。

后来，有些行业，例如中药铺、文具店为补救货物来源，采取“深购远销”的方法，即所谓当地药店，向北京同仁堂或广州永安堂去信，说明所需采购的药品，不用现款就可赊回一批药品。对方接信后将商品打成包件，委托邮局发来，货到邮局

通知商店备款即可提取。上海商务印书馆也用此法，往来手续简便，时间迅速，互相尊重又信得过。

在此情况下，敏感的商人，见到市场商品来源紧张，供不应求，开设货店有利可图，既能自购自销，又能给客人存放货物，介绍交易，从中抽取佣金或保管费，真是一举两得。这样货店业就应时而生，发展较快。

二、货店业应具备的条件

正规货店为了招揽顾客生意兴隆，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经理人员要有高尚的品质、声誉和信用，生意活，做买做卖要和为贵、信为高，并主动出去招揽顾客。顾客临门热接热待，为顾客构物、传递信息，介绍生意，代购、代售商品，妥善保管运送货物，结算帐目等等，以此博得顾客的信任。这样新旧顾客才能川流不息，从而使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2、要有雄厚的资金，能负起抵垫的经济责任，如遇天灾人祸或出人意料的损失，货店要照价赔偿客户，使客户不受丝毫损失。

3、要有设备齐全较大的存货仓库，并重视货物存放的信誉。无论存放什么货物，保证不挪

用、不霉坏、不变质、不缺斤短两、不以次顶好、信守“宝店不漏针”的原则。

4、要精明能干心灵眼活，分析准确，信息灵通，热心为顾客服务的上街人员（介绍交易的跑街人），使客户商品周转快，不积压，多赚钱。

5、要备有舒适的客房，供顾客免费住宿，其被褥要经常洗晒，常保清洁卫生，并派机灵聪明的小店徒专门伺候，随叫随到，便利顾客的起居吃喝，使他们住店如家精神愉快。

6、为适应客货主不同的爱好，要选派一名涉世经验丰富，善于分析客人心理的协理或高级店员，陪他们去茶馆、酒楼、书场、剧院消遣，甚至逛妓院、打麻将，决不能使他们的爱好失望，务使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下次再来。

三、货店业的经营范围

货店除自购自销货物外，其余即代客户存放待销售的商品。客人来自五湖四海，带来各种商品，其中百货五金、糖茶烟酒、布匹文具、土特产品、药材、各种甘果海味，以及小百货的针线钮扣、鞋帽手帕、化妆品等，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货店将客货主存放的货物堆放在货架上展

销，并通过上街的业务人员，现销或赊销给当地的专业商店或零售商贩。因而在市场的商店里，你能看到四川的红白糖，台湾的麻袋包装、赤、白、冰糖，天津的潮糖，湖北的砖茶、贡尖茶，浙江的龙井茶及各种花茶，河南清化的水烟，山西曲沃的红生烟，港澳转来的美制“菲莉浦”香烟，陕西的西凤酒，山西的汾阳酒，京津来的五福市布、斜纹布，河北行唐、长寿的老白布、棉花等，新疆的哈密瓜干、葡萄干，广州永安堂的万金油，北京同仁堂的定坤丹，真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市场活跃，用户喜爱。货店进来的货物，优先销售给陕坝专业或零售商店，其余还销至五原、临河、安北及伊盟地区。

四、货店的组织形式与经营规模

陕坝货店以义合诚为例，其经营范围，以货物为主兼营粮食。并为顾客存放推销、代购商品，从中收取2%佣金及栈佣金（系货主存放商品时间长短议定的手续费）。该店1935年成立，座落在杭建路北侧（今杭锦后旗医药公司批发部西墙）。系合股经营，其股东有胡耀成、武正国、李干臣（视德和泉大地主）、刘骥（蛮会大地主），共计股金银元九千元。

经理胡耀成，山西榆次人，曾任屯垦队连

长、陕坝镇镇长、陕坝理门公所的当家人、清帮内的“通”字辈龙头，社会关系复杂，在陕坝有一定名气和号召力，是货店理想中的对外联络经理。副经理武正国，绥远萨县人，正规商人出身，忠厚老实、精通业务、善守信誉，颇得陕坝商民的信任。协理樊书才，绥远萨县人，自幼学商，机智胆大，极善于选购商品，抗战时期他常驻包头，以皮毛土特产品，换回文具西药等各种商品，并引荐包头商人携带各种商品来陕坝贩卖，对陕坝市场繁荣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老谋深算的韩天祥，交际广、朋友多、善于选购商品，常年在西安、宝鸡、兰州、酒泉等地坐庄。上街人员程万山，信息灵通、熟悉市场供销规律，对各种商品推销有路。主管司帐路光裕，精通专业，结算迅速，正确无误。收款员张孝忠，小心谨慎，从未发生过差错。站亭院陈昆山，聪明伶俐，他眼观四方、笑迎顾客、上传下达、洽谈生意、亭下亭上、管理周全，成为货店伙计中的楷模。保管人员柴新石、史柱，忠厚老实、坚守岗位，从未发生短少货物事故。专管厨房伙食的管理员史得科，和厨师郭全忠配合默契，为顾客想方设法改善饭菜，保证了顾客味美可口吃饱吃好。此外对招待客人、上传下达、端茶送水、护院下夜，也分别设置了专人管理，井井有条，所

有从业人员多达40—50名。总之，该店在副经理武正国的正确领导下，做到分工明确，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形成全店一盘棋，因而顾客云集，货堆似山，门庭若市，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营业逐年上升。从1935年至1944年清点财产已达六万银元，如此雄厚的资金，是其它货店难以相比的。

再将该店与众店不同的对职工福利简叙一下：财东正副经理所投资金的财股与身股，在议定结帐时间分红外，其他高级的和主要的店员都按能力大小，贡献多少，勤劳程度，分别顶厘股生意，由一厘到七、八厘，议定结帐时间按厘股分红，每年年终按所定厘股支取应支，每股应支为30银元。没厘股的店员和勤杂人员，每年支付酬劳金20银元。学徒因有客人赠送小费，店内只发给酬劳金10元。用这样一种经济手段，激发店伙们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店员视店如家、忠心耿耿为店的事业效力。大家都说：“肉烂了在锅里，肉肥汤也肥，只要买卖赚钱，大家都有好处。”

陕坝其他货店如宏祥栈、汇泉店等的组织形式与经营业务，也都大同小异。

五、货店业的店规

各货店都本着“笑迎千户客，服务八方人”的精神，遵循经商三件重：“货真、价实、信誉好”的格言，各自都制订了自己的店规，现将义合诚店员路光裕，宏祥栈店员贺有良等的回忆，整理如下：

1、店内的所有从业人员，都必须爱护公物，严禁偷盗行为，凡店内及客人存放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未经允许，一律禁止私拿出外，做到“丝毫为重”。

2、店内的一切从业人员，必须视店为家，视经理为家长，服从经理的分配，有意见当面提，不准背后乱议论，更不准传闲话、说谎话、拨弄是非。

3、店内的所有从业人员，要严守店内机密，凡客户的来电、信件，店内自存或客存的商品，要守口如瓶，绝不告诉外人。

4、出外坐庄的人员，要全心全意为本店挑选购买商品，禁止乘机给亲朋和自己捎购贩运商品，要忠诚老实，不弄虚作假、欺骗店主。

5、凡上街的业务人员，晚间向负责人汇报一天成交的生意情况、市场行情、市场货源情况、自己的看法等，详细记录，如实汇报。

6、店内负责接待顾客的人员，要把当天接待的事宜，详细记载登记簿上，顾客的临时留言，也可写在黑板上。

7、财会人员必须掌握高超的打算盘技术和专业知识，客货销售后及时做出结算。

8、保管人员要坚守岗位，确保客货安全，不短少、不霉坏、不变质，否则，一切损失由个人赔偿，并定期与财会人员对帐，做到“帐帐相符”、“帐货相符”。

9、跑街的勤杂人员，要把一切业务往来信件、电报、登记留底，保证不误时、不丢失、不零乱。

10、看院人员要坚守岗位，不准无故擅离，防止丢失东西及流氓无赖醉酒者入店无理取闹，扰乱营业。

11、下夜人员要准时接班，坚守岗位，做好防火防盗，保证客货安全。

12、亲友来店，必须通过站亭院人员，先行登记经允许后方能接见，远路亲友来店住宿吃饭，经经理批准方可。

六、官僚资本主义兴起加速货店业的发展

抗战开始后由于纸币贬值，物价暴涨，贮存商品之风盛行，信息灵通的官僚资本家，凭藉其

权势及雄厚的资金，购存各种商品囤积居奇、静观其变，派员四处坐庄探听物价。

1940年3月份，在傅作义将军的领导下，驱逐日寇，光复五原，绥西地区相对稳定。傅急于励精图治，重振旗鼓，收复绥东失地，于1942年改行新县制，定陕坝市为绥远省临时省会，一时人口猛增五万余。工商业十分繁荣，街上往来行人熙熙攘攘，热闹非常，俨然成为塞上唯一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新城市。

其时，信息灵通的官僚资本家的代理人窥测绥西地区安定、商品奇缺，大有用武之地，银川马鸿逵的敦厚成，首先将各种商品运来陕坝，进行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接踵而来的有天成西、晋义泰、广兴元、福兴永等所谓银川八大家及西安的信孚号（系孔祥熙的代理人），一时货店门庭若市，来往的顾客应接不暇，商品堆积如山，收入猛增，使坐商垂涎三尺。敏感的商人见开货店有利可图，如雨后春笋般似的争先开设，如永兴隆、玉隆栈、民生栈、义兴诚等（后附陕坝货店名称一览表）成为陕坝货店业的鼎盛时期。

七、货店业的相互竞争与倾轧

货店业为了追求利润，真是八仙过海大显身

手。如回民为争夺马鸿逵四太太及其他回民行商的货物，特开设了回民店，有张五店、杨兆燧店，还按回民的风俗习惯，供应茶水饭菜。义合诚除凭藉信誉、资金、设备，还精心制做饭菜吸引顾客进店。该店的拿手饭菜，如烧麦肉嫩馅鲜，状若麦穗、有底有帮、不塌不陷。馅饼皮薄馅足、色泽金黄。油烙饼内猪油外葫油，吃起来香脆流油，半小时口内尚有余香。面类饭食有擀、削、拉、挂、饴饴等十余种。炒菜花样尤多，俗语说：“菜香招来八方客，味美引出洞中仙。”此法确也灵验，因而该店在中午开饭的餐桌上，常有驻外店的客人来此顶锅、品尝香味，收到比用广告宣传号召客人来店更为明显的效果。民生栈派店员乘马到60里外的太阳庙山口，迎接西来的驼垛客商。有个别货栈为迎合顾客的声色之好，备专人陪顾客打麻将、推牌九、逛妓院、窜暗娼，千方百计地诱使顾客进店，真所谓：“客人一进店，就能过好年”。

但资本家由于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本质，往往当面奉承、背后使绊，大鱼吃小鱼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如魏二狗原在临河城内开设碾磨房，1945年夏季遭水淹，到陕坝开设同德和店，因资金薄、设备简、时间短，为招揽客货，只收1%的佣金，比同业公会规定少收一半，本属竞争的手

段，却触犯了同行的命根子——金钱，遭到同行业群起而攻之，使该店处于孤立，只好关门大吉。

八、结束语

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营经济在市场上占了主要地位，并对私营工商业做出了统筹安排，店商小贩直接向当地的百货公司批发部、糖业烟酒公司批发部、供销总社、土产公司批发部直接进货，免掉货店的中间剥削，致使往来频繁的行商，和红极一时的货店业，面临冷落，转向其他职业。

本文写成得到前义合诚主管会计路光裕、店员程万山、张孝忠，以及前宏祥栈店员贺有良的介绍，在此一并致以谢意，但事隔40余年恐有差误，尚希知情者指正补充。

陕坝货店业名称经理姓名及座落一览表

名称	经理姓名	座落
义合诚	胡耀成	杭后医药公司西大门
宏祥栈	王楚章	杭后邮电局家属院
永兴隆	庞受天	陕坝中心市场路北
玉隆	刘子范	杭后糖业公司冷食门市部
民生	郭明亮	杭后经委
积成公	马献龙	杭后国营食堂后院
兴盛公	贾子玉	杭后百货青年门市部

汇泉店
张五店
回回店
义兴诚
同德和
永昌
悦来
广兴西

梁警宇
张五
杨逃遂
李志诚
魏二狗
徐子华
王悦来
朱士俊

杭后土产公司
陕坝回回路
陕坝胜利西路
陕坝环城东路头道巷口
陕坝实验小学对门
陕坝新华书店家属院
陕坝鞋业社西侧
陕坝汽车三队院内

巴盟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见闻

高德富 王廷英

一、巴盟工商业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

巴盟地区的私营工商业，有着较长的历史。远在秦汉时期，汉武帝置五原、朔方两郡（临河地属朔方），就产生了商品交换。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各自为政，放弃了五原、朔方两郡。南北朝时期北魏都平城（今之山西大同），在塞北设置七个重镇，临河系沃野镇所属州（即今之临河命名的由来），因而晋北商人常携带糖茶来此交换马匹牛羊。宋朝时期，河套地区先归宋，后被西夏占去，但商人往来交换商品，终未停止。明朝中叶以后，河套地区悉为蒙古族群众游牧之地，商人为投蒙民所好，携带蒙民喜爱和急需的商品，用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换取蒙民的马牛羊及皮毛等物。清王朝统一中国后，晋、陕商人往来频繁，有的甚至在牧区设点立柜，定点交换（柜指商业

字号，如胡柜、杨柜等）。康熙年间乌拉特中旗已有“万和长”字号立点，交换商品。到同治年间，“隆兴长”也来河套开店营业（今五原城外），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旅蒙商。

清末民初，我盟大余太商业已初具规模，商人成批结队到库伦交换商品（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后来乌镇（今之乌中旗乌不浪口一带）发展极快，人口众多，商业中心也由大余太迁至乌镇。同心公、广生西、同义恒、义和长、天瑞德、和义成等一十八家大商号林立乌镇，成为河套地区唯一的商业网点。其中天瑞德耕种土地百余顷，雇用长工三百余人，据传说：“碾房的碌碡，就有十五个”。他们将自己生产的粮食加工成油酒米面，再搭配茶布烟糖，远销库伦，进行不等价的“以物易物”的交换。

1912年袁世凯夺取了政权后，急于筹款借债阴谋复辟，在币制方面采取了银本位制，并颁布了国币条例及其施行细则，1914年2月8日正式公布以银元作主币（即每枚重七钱二分的银圆，俗称袁大头）。从此币值分量有了统一的规定，消除了各省军阀滥制劣质银币的行为，在当时市场流通中起了主导作用，以往“以物易物”的交换，就被货币所代替，大大促进了商品的流转。河套各城镇的工商业如雨后春笋，猛然增多。五

原于民国二年改县后，商业已初具规模，街道两傍，商店林立，计有永生号、力生钰、永兴号、天恒永、福义隆、集仁堂等大小数十家，经营绸缎布匹、五金百杂、烟酒糖茶、药品文具，各样都有。丰济渠以西的强家油房（今之临河市）也开设了同福元、万利和、福义生、福生泉等二十余家商店。

随着私营工商业不断地发展，城镇也随之增加，太安镇（今之陕坝）也兴办起商店，如元祥号、蚨来号、复盛隆、三义成等三十余家。太和镇（今之杭后永胜乡）也出现天义生、福生泉、大小十几家商店，市场交换呈繁荣景象。

1925年临河设局后，局长萧振瀛规划市区，高筑城墙，人口骤增。工商业者又新开设天然小商店、晋源昌、天义昌、宝灵堂、玉记酱园等三十余家，奠定了临河商业的基础。

1939年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绥远省政府，相继进驻陕坝。随军机关职员及家属约五万余人众，原有的商店满足不了骤增人口的供应，在此情况下，从沦陷区逃来的豪商巨富和当地的富有者及闲散人员，看到有利可图，也纷纷开设商店，短期内就开设了福和厚、福星久、信德乾、永记粮店等八十余户。服务行业也随之增加，营业规模可观的有恒玉永、信德饭庄、宏祥

栈、永兴隆等20余户，经营饭馆旅店、货栈、缝纫理发、钟表照相、镶牙刻字、澡塘戏院。1940年5月傅作义将军领导的五原战役胜利后，绥西相对稳定，官僚资本也云集陕坝，如孔祥熙的信孚号，傅作义的永义号、志诚公，马鸿逵的积成厚、敦厚成以及宁夏的天成西、广兴元、晋义太等八大家，他们相互勾结，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小商小贩无力竞争，只好走街串巷，早出晚归，或深入农村牧区，肩挑叫卖，维持生活。小手工业者，也携带工具跑遍农村牧区，给农牧民修理制造生产与生活用具，养家糊口，并收购农牧民的农副产品，博得农牧民的喜爱，对当时沟通城乡物资交流，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解放前我盟的私营工商业，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出现了“三多一少”，即小商小贩多，夫妻商店多，个体手工业多，雇用店员的商店少，仅占10%。这些小型工商业长期受着三大敌人的压迫与掠夺，抗战时期又残遭日寇蹂躏及国民党反动派无止尽的摊派勒索，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冲击，解放前夕，呈现出一片疲倦瘫痪、萎缩不振的景象。

二、解放后巴盟工商业的振兴与发展

解放初期国营经济还不够强大，生产水平还

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因而必须利用私营工商业，补充供应上的不足。同时我盟的私营工商业，已形成较大的商业网点，并具有生财有道、经营有方、用人有度、推销有路、广告有术即工商界五有的传统。还有不少熟悉民族地区经营特点的业务人员及勤奋钻研，善于经营，反应灵敏，掌握市场需求的能手。有些商店和作坊，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如临河的天然小商店，在售货的包装纸上印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保退保换”等字样，以广招来客，售出的留声机、自行车还按时到雇客家里进行检修。陕坝蚨来号的八宝酱菜，制作精、调料全、味香美，其包装小篓坚固精巧，便于旅客携带，做到以质取胜，惠在其中，装璜大方，美在其表，使顾客的使用价值和欣赏价值结合与统一，使产品有长久不衰的销售市场。福和森木器店制造的耕耨，木质坚实，轻便耐用，再配上杜家铸匠炉制造的铁耨铧，播种时得心应手，下籽均匀，颇得农民喜爱。铁匠马四制造的铁锹，质地坚硬，善于深挖、锹头磨秃了也折不断，河套闻名、誉为“马四铁锹”。临河城内老陶的熏肉，制作精细，色泽红润，味道鲜美，驰名绥西。以上情况，有力地说明解放初期我们作好团结和利用私营工商业者的工作，对繁荣市场，促

进城乡交流，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解放初期，我盟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工商联的积极配合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保护与发展的政策。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前提下，积极扶持私营个体工商业，通过贷款、组织联购分销和摊贩业下乡，开展物资交流大会等办法，鼓励工商业者发展生产，扩大经营，因而使许多早已关闭或转业的商号，又重新开业。陕坝镇大转盘一带，小商小贩林立，他们早出晚归，吆喝叫卖，生意兴隆。晚间用苫布将各自的摊子遮盖，欣然回家，夜间无人看管，也太平无事，真所谓“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了。临河街上的小贩走街串巷，送货上门，供市民所需，博得人民的赞扬。成群结队有组织的小商贩，深入农村牧区，供农牧民所急需，换回农副产品及皮毛等，呈现出市场繁荣、货畅其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五反运动前后的私营工商业

解放后我盟私营工商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确有较大的发展（附表），对恢复国民经

巴盟地区私有工商业发展情况比较表

解 放 前			类 别	解 放 后		
资 金	从业人员	户 数		户 数	从业人数	资 金
单 位 元	233	14	国 营 商 业			单 位 元
878,300	5113	2470	私 营 商 业	2507	4108	712525
26,100	280	101	服 务 业			
216,000	280	134	饮 食 业			
	2352	1119	个 体 手 工 业	1725	4252	459084
			摊 贩 业	1076	1105	30147
			行 商	117	125	36021
1,120,400	8258	3838	合 计	5425	9590	1,237,777
附 记	一、此表所列数字以1952年统计资料为准。 二、表列数字包括当时的五原、临河、安北、米仓、狼山、晏江和陕坝镇，均系原河套行政区管辖之地。 三、“解放后”一栏将服务业与饮食业并入商业户内。					

济，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私营工商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它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积极进步的方面，又有破坏国计民生的消极腐朽的一面。

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唯利是图，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它的本质所在。一些私营工商业者乘着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他们暗地施展出惯用的各种手段和花招，如少报营业额，伪造单据，私立假帐，利用请客送礼交朋友向干部行贿等卑鄙手段，进行偷税漏税、盗取国家经济情报，扰乱经济秩序，破坏国民经济的发展。如陕坝货栈行×××、×××、×××，曾是官僚资本商品的集散地，并藉其势力发过国难财，五毒行为成了他们致富的秘诀，解放后他们还继续施展惯伎，牟取暴利。五原的×××，私藏银洋九百六十元，在羊毛内掺沙土、羊皮上洒盐水，加上偷漏税收款额，非法获取利润五千余元。×××为掩饰暗藏大烟土四百两及棉布二百余匹的罪行，向干部行贿一百七十元。临河×××的碾磨房，给水利社加工时，在糜米里掺沙子、白面里掺大豆、草麦面，直接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破坏了国家的经济政策。

为回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我盟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于1952年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场运动，在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工商户，采取“利用矛盾、实行分

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迅速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孤立和惩办了罪大恶极五毒俱全的工商界败类，而对大多数工商业者，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的私营工商业。

经过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者受到深刻的教育，大多数都能奉公守法经营好自己的企业。广大工人店员通过运动，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以主人翁的姿态，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对资本家的监督，给以后的企业改造，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五反运动后，私营企业内部进行了改组，废除了以往资方武断独行、一言堂的不民主制度，建立了劳资两利、遇事与工人相互洽商的合理制度，进一步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扩大经营范围，适当调整人事，评议了合理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有的还开展职工文娱活动，工人有劳有逸，大大发挥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

四、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的改造

1952年国家财经状况已根本好转。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

1955年初五原的建生石印局，也比照陕坝镇协和酱园的方法，实现了公私合营。这两个企业虽资金不多，但都带有技术性，为公私合营首开先河，起到了示范作用。

1956年元月份，我盟所属各旗县的私营工商业，在条件逐步成熟的情况下，分期分批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具体情况如表：

公私合营后，我盟各级工商联协助其成员相应做了下列几点工作：（一）清产核资，由资方自点自报、自己估价，经公私方代表协商，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其固定资产，如机器房产等，及家店不分的生活资料等，从宽处理。对企业旧有的债务和滞销物资等，在合营前采取了“从速解决”的办法，以便正确估价和核定股额。（二）定息是根据股额发给资本家的固定利息，其年息为五厘，按季领取。（三）搞好人事安排，私营企业原有的在职人员全部包下来，再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给予安排。陕坝、五原、临河等地共安置了资本家及私方人员一百五十二人，其中安排有经理、科股长、门市部及牧区营业所主任等职务。对年老体弱的人，也进行了适当的安置，有的则长期休息，工资照发，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1956年巴盟全行业公私合营统计表

类 别	户数	从业人数	备 考
国营(供销合作社)	162	345	
公私合营	252	619	
合作商店	137	200	以上系商业部分 占全盟商业总数89%。
经销代销商店	936	1113	
小 计	1487	2277	
合 作 社	19	136	
公私合营	5	55	以上系工业转合 营其中五原酿造厂三个陕 坝印染厂一个。
合作社附属厂	2	13	
小 计	26	204	
生产合作社	496	1351	
供销生产社	14	19	以上系工业部分占 全盟工业总数 93.7%
生产小组	188	312	
碾磨业生产组	132	237	
小 计	830	1919	
总 计	2343	4400	此表所包括的地区与表一相 同。

五、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巴盟地区的私营工商业中，小商小贩约占90%，属于个体经济，他们开设着小规模的门点或夫妻式的商店，或在街口路傍摆摊售货、或肩挑担子沿街叫卖，或在农村牧区四出流动，经销人民生活必需品。他们服务热情，早出晚归、笑脸迎人、殷切招待广大顾客，有不少的业主说：

“只要顾客上门、做不成生意的很少”。跑农村牧区的摊贩，经常深入偏远地区、便利农牧民买卖商品，如陕坝挑贩郜忠义采取固定路线巡回销售，按时送货上门，并替顾客代选代销商品，群众称他及时雨掌柜。

因小商小贩是小生产者经济，具有浓厚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投机性，因而在交易时，往往缺两短寸，掺杂拌假，以次顶好，以假冒真，高抬价格等不择手段地欺骗群众，时常冲击市场价格、破坏国家计划经济。但他们由于资金薄弱，遇到周转不灵时，常受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以高额利息借款来做生意。根据这些特点，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统筹兼顾、妥善安排”的方针，依据自愿原则，在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领导下，按照不同的经营情况和类别，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他们逐步过渡为社会主义商业——

一 “合作小组”或“合作商店”。

(一)合作小组，是由小商小贩统一向国营商业，承担经销代销或代购业务，统一组织货源。销售时由各户依据国家规定的批零差价，独立分散经营，自负盈亏。这样既克服了“以往吃不了或吃不饱”的现象，又割断了与私营工商业的联系。

(二)合作商店，是在合作小组的基础上自愿组成的，实行资金入股、统一经营、独立核算、共负盈亏，并按资金股份进行利润分红。这在经营管理、服务质量、资金周转、公共积累、劳动报酬、群众监督等各方面，都比合作小组的优点较多，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营商业的助手和补充。

早在1950年我盟各旗县市镇，在工商联的协助下，已成立了摊贩业同业公会，并加强其成员们的政治教育，规划了各行业的交易市场，成立了市场管理所。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合作化。1956年底，商业及饮食业的小商小贩，完全组织成“合作小组”及“合作商店”达七百八十一户。其中一部分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其余大部分也都按行业归口领导，以经销代销的形式，逐步组成“合作小组”或“合作商店”，成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六、个体手工业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

手工业者在我盟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牧区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中，手工业产品约占80%。1952年土改和牧区调整后，农牧业空前兴旺，购买力不断提高。解放初期，据不完全统计，全盟约有手工业户和手工业的独立劳动者1119户，从业人员2352人，生产和加工的产品，远远赶不上市场的需求。在党委的领导下，工商联对手工业者进行了普查登记，并采取供应原料让其加工，或包收其产品的办法，以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因而1952年全盟手工业产值占到工农业总产值25%左右。陕坝镇杭后地毯厂精心设计制造的、花色多样质量优美的地毯，不仅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高的荣誉。

手工业者是小生产经济，因此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十分严重，在经营上常常是“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甚至高抬产品价格、偷工减料、假冒名牌货，在市场上投机倒把获取非法利润。但是他们由于资金短缺，生产上常有困难，特别是手工业独立劳动者，仅有部分生产工具，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生活。他们的生产带有季节性，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在推销产品、购进原

料时，常常遭到私商的剥削，如果任其自流，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大多数业主破产，少数人发财。如果引导的得当，就会避害趋利，使他们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针对手工业的具体情况，我盟对手工业的改造采取了逐步过渡的形式：（一）手工业生产小组，即部分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的独立劳动者，自愿结合，凑集资金，租赁工具，集体经营，向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加工定货或包购包销，割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二）中级形式的生产供销合作社，即由多数手工业者，或几个手工业生产小组组成，统一采购原料和推销产品，逐步加强成员之间的联系，克服分散性，积累公共财产向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过渡。（三）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即手工业者自愿结合、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集体进行生产，或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或手工业生产供销合作社逐步过渡到集体生产的半社会主义或完全的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

1955年春，陕坝工商联及手工业者的代表，出席了陕坝镇召开的手工业工作会议，讨论了对手工业改造的方针和任务，并制定了规划。同年四月，巴盟又召开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制定全盟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

1956年陕坝镇首先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其他旗县的手工业者也兴高彩烈、敲锣打鼓地纷纷起来，成立合作社跨入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七、对私营工商业者“人”的教育和改造

我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已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者，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同工人阶级有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但他们具有两面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质和官僚买办阶级是相同的，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与工人阶级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因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改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根本问题。”

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极不平衡，我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较之全国更为落后。据1952年统计，全盟3333户私营工商业中，仅有10%的店厂雇用店员或工人，其余都是小商小贩和个体手工业者。那末对这些人是否应当改造？李维汉同志说得好：“大中工商业要改造，小工商业也要改造，因为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资产阶

级和上层的小资产阶级(亦叫小业主)，他们雇用工人店员，经营小规模工商业，但他们的阶级本质和大中资本家没什么不同，他们供俸的和大老板供俸的是一个‘财神爷’，目的都是要发财，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这种经济地位，小业主在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同大中资本家，具有同样的两面性，因而必须教育改造。其余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他们都是私有者，有自发资本主义的倾向，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有欺骗顾客、投机牟利的行为，既使在五反运动后，违法乱纪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公私合营后，仍有些人贪污盗窃搞非法活动，因而对他们，也必须教育和改造。

根据我盟具体情况，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采取了民主说服批评教育的方法，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教育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双重任务，一是对“企业”的改造，二是对“人”的改造，而且两者必须同时进行，互相配合，经过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斗争，逐步使他们从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同时要善于掌握资产阶级客观情况的发展与变化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比如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愿意参加反对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但在斗争中往往又表现出动摇和妥协，害怕暴风骤雨的群众斗争，不愿和反动派一刀两断，仍保留了某些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表示拥护宪法和共同纲领，赞成土改，继续反帝，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他们又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仍留恋着资产阶级花天酒地腐朽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的改造过程中，他们一方面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抵制改造。如陕坝××工厂天津资本家抽逃资金；×××财东将资金分散到包头；×××财东假报亏损停业；×××财东呈报亏损歇业，暗地里却隐藏商品，静观其变；×××药铺财东将贵重药品转移山西出售，逃避改造。针对此情况，我盟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在建国初期主要对其进行反对三大敌人，服从党的领导，奉公守法的教育，之后又结合“镇反”与土改的实践斗争没收了×××财东在米仓新乐乡占有的出租土地，镇压了工商界败类陕坝××粮店资本家兼地主张××、临河粮食加工业官僚资本家恶霸地主白××。在五反运动中惩办了五毒俱全的园子渠口工商业兼船筏业的把头×××，处罚了陕坝镇勾结官府偷漏税款的×××药铺。在铁的事实面前，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受到深刻的教育，认

识到只有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对牧区民族工商业者的改造，主要是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严禁高额盘剥和敲诈勒索行为，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树立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风尚。

八、对工商界家属的教育工作

资产阶级有两个堡垒，一是企业，二是家庭。公私合营后，资本家企业基本上消灭了，但这个家庭堡垒还没有攻破。为了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对工商界家属的教育，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因为资本家与家庭的成员，朝夕相处，息息相关，其家属在思想感情上受资本家的影响较深，政治立场观点往往站在了资本家一边，如果放松家属的教育，就会成为对工商业者进行改造的障碍和阻力。如果对她们教育得当，就能化阻力为助力。比如在公私合营时，有的工商业者白天思想很通，隔一夜就不通了。工商联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学习方法，以居住情况编为小组，3—5人或6—7人为一组，不离家门，就地学习，这些办法立竿见影，她们提高认识后，主动说服亲人放下包袱，解除顾虑，接受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许多工商业

者的家属，经过学习后，都成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促进派。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资产阶级把妻子当作私有的特殊商品。她们在解放前虽然过着阔绰富裕的生活，但精神上却忧心忡忡，她们怕丈夫变心、子女堕落、买卖亏本、厂店倒闭。她们在家里是依赖丈夫的附属品，在社会上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有的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养尊处优，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因而改造她们，还是比较吃力的。但通过工商联家属委员会组织学习和自我教育，都逐步起了变化，纷纷走出家门，自称“我们也有两只手，决不在家中吃闲饭”，要自我解放，为社会出力，为人民服务。

小商小贩的家属她们经济基础薄弱，解放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常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经历着“大鱼吃小鱼”朝不保夕的生活。她们原来就操持家务，具有一定的劳动习惯，因而对她们的教育或组织她们参加集体劳动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我盟根据这些特点，对工商界家属的教育改造分三段进行：（一）解放初期推动她们走出家庭，参加街道组织的读报组、扫盲班，提高她

们的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发动她们参加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及镇压工商界不法分子的实践斗争，提高她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二）公私合营后，陕坝镇工商联及时组织了工商界家属政治业余学校，参加的约百余人众，她们和自己的亲人一起学习文件，互相勉励，共同改造，共同提高思想认识，对改造工作收效很大。1956年5月份传达了全国工商联家属代表会议的精神后，我盟工商联及时指示各旗县建立了工商界家属学习委员会或学习小组，密切配合对资产阶级及其家属继续改造教育，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她们主动帮助亲人解除顾虑，交待问题。如合作商店的家属面对面揭发亲人的遗漏问题。与此同时还组织她们参加公私合营后企业里的辅助劳动。（三）1959年巴盟各旗县正式成立了工商界家属工作学习委员会后，家属们参加学习的面逐渐扩大，城镇街道大办企业和福利事业，妇女就业的机会也逐步增加。据1959年末的统计，我盟参加了临时性或长期性生产劳动的人数，约占工商界家属总人数的85%。这对家属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通过劳动实践，才能真正体验到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经济上有了收入，才能摆脱依附丈夫生活，达到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对资产阶级来说，由于家属地位的改变，消除了他们

的后顾之忧，能更好地接受改造，逐步地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九、结束语

我盟自1949年和平解放以来，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砸烂了旧的民族压迫制度，在党的领导和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全盟各民族人民之间出现了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局面。以往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歧视、相互排挤现象，一去再也不复返了。生产力的解放，促进着工农牧业的迅猛发展，农牧民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又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城市集镇行人往来、熙熙攘攘、热闹非常。

1950年民主建政后，盟及各旗县都相应地成立了工商界自己的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组织教育他们的成员，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在建国初期，教育私营工商业者，服从党的领导、奉公守法、彻底割断和三大敌人的联系。抗美援朝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克服他们崇洋媚外的奴化思想。还发动他们自愿献金献物支援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仅陕坝镇工商业者献实物、黄金、银洋等不完全统计价值三千万元人民币之多，能够买战斗机几架。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号召他们向

着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经营自己的企业，做好城镇与农牧区的供应，补充国营经济的不足。

1953年总路线颁布后，采用和平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各级工商联积极组织其成员反复地学习，打通思想，个个表态，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给以后公私合营时创造了有利条件。1954年陕坝协和酱园公私合营试点成功后，工商联及时组织各旗县工商界代表现场参观总结经验。因而在1956年全盟就顺利地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各级工商联积极协助政府，根据“包下来”的政策，对私方人员妥善给予安排，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各地工商联还组织公私方代表，进行清产核资，消除资本家的顾虑。同时开展对工商界资本家及其家属的改造，相应地对小商小贩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家属，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教育改造，以适应社会主义所需，完成“企业”和“人”的全面改造。

十余年来巴盟工商联在党的领导下，在历次运动中，都积极地推动其成员踊跃参加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桥梁作用。六十年代初期，各级工商联正在总结经验，

重新起步，全面落实党对工商业者“包下来、顾一头、一边倒”的和平赎买政策的完善工作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动荡不安，秩序混乱，人心惶惶。工商联的组织，也被诬蔑为资产阶级的保镖黑店，把工作人员说成是资本家代言人，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工商联的档案资料，也被付之一炬，自此巴彦淖尔盟工商联办事处及旗县工商联组织都陷于瘫痪，直至一九八三年，才在巴盟政协设置了工商联办事处，配备了领导及工作人员，重新开展了工作。

本篇拙文，虽系作者亲见亲闻，又作了多方调查了解核实，但时隔30余年，缺漏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读者和知情者指正。

巴盟政协大事记

(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八九年七月)

王枝梅 整理

一九五五年

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阿拉善旗成立。

4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委员会在阿拉善旗正式成立。

是月10日至14日，第一届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阿拉善旗人民会堂举行。共有委员39人，出席28人，列席25人。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听取达理扎雅州长代表阿拉善旗协商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阿拉善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包括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协商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阶段工作）的工作报告。二、听取蒙古自治州工作委员会书记李健同志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今后努力方向的报告。三、阿拉善旗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何兆麟

同志传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四、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蒙古自治州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五、通过第一届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

4月14日，第一届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第一届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主席巴图巴根，副主席陈爱尔德尼巴图、何兆麟、刘思孝、金允诚、卜云岫，秘书长布和，常务委员王维智、乌图那笋、李树德、李文钦、金巴图道尔吉、胡艾尔立左巴依尔、马维荣、张文选、富珠烈、齐文奎、叶松林。

是月，本会第一次常委会议通过第二季度工作报告。

4月，政协甘肃省蒙古自治州成立了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委员会，并在全州范围内展开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宣传活动，激发了各族人民爱国热忱，全州从城镇到边远牧区的47900人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书上签了名，占全州人数的90%。充分显示了和平力量的壮大。

5月，本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本月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6月10日，本会第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2

至6月份工作报告。

6月24日，政协河套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陕坝正式成立。下设秘书、总务、招待、保卫4个小组，分工进行筹备工作。

7月11日，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在陕坝正式成立。

7月11日至14日，第一届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陕坝（今杭锦后旗）举行。共有委员45名，出席40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由盟政协委员刘进仁同志传达内蒙政协第一届一次全体会议精神。二、听取政协河套地委书记郝平南《关于目前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三、听取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副主席苏和同志作《关于政协性质、任务和我区今后工作意见》报告。四、学习讨论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五、通过第一届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各项报告的决议。六、选举第一届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7月14日，第一届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第一届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主席郝平南，副主席苏

和、王恩荫，秘书长杨树森，常务委员赵子文、叶林、刘勉、朱士俊、巩受青、王维仁、傅亭维、刘进仁、陈靖邦、哈斯瓦齐尔、杨若愚。

是月14日，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第一次常务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提出通过副秘书长和办公室人员名单，酝酿协商河套行政区人民委员会委员名单，研究通过本会下半年工作计划纲领，拟定本会一届一次会议传达提纲。

8月30日，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组织蒙古自治州，阿拉善旗，巴音浩特镇各级人民代表及各族各界民主人士四十四人，召开关于揭露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座谈会。

9月15日，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会议上作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为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的决议。

是月27日，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扩大会议，完全拥护人民政府逮捕暗藏在陕坝天主教内以傅亭维为首的反革命分子，通过向本区各族各界人民团体的号召书。号召全区各族各界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的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团结在一起，提高警惕，划清界线，大胆检举揭发，协助政府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暗藏在天主教内及其它任何角落的反革命

分子。并作出撤消反革命分子傅亭维的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的决议。

是月，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成立了本会工商组。

12月21日，通过本会全年工作报告，确定本会方针任务是：贯彻政协章程规定的七项准则和当地党委每一时期的政策，为今后日常工作奋斗目标。制定了常委及委员汇报制度和以宪法为学习的内容。

12月24日至25日，第一届蒙古自治州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阿拉善旗举行。共有委员39名，出席24名，列席71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陈爱尔德尼巴图副主席致开幕词。二、听取达理扎雅州长的讲话。三、何兆麟副主席作本会1955年全年工作报告。四、巴图巴根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和牧业互助合作问题的报告》。五、富珠烈委员作《关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六、通过布和秘书长宣读的本次会议决议。七、金允诚副主席致闭幕词。

是月，政协河套行政区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及各教派负责的35人成立了高级学习小组。

一九五六年

1月，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制定第一季度工作意见，组织力量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加强各界人士学习，协助政府动员各界人士积极贯彻本州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三次会议决议，为本州第一个五年计划农牧两丰发展规划的全面实现而努力；协助政府推动必要的社会改革，以顺利实现土地公有。

是月，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邀请阿旗土地所有者及有关人士举行了协助政府改变阿旗土地关系，为实现土地公有制的重大社会改革措施的座谈会。通过这次座谈，使巴音浩特郊区和边远巴格（蒙古族）的一万六千亩土地顺利完成了归公任务。

1月20日至22日，政协河套行政区召开全区各地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贯彻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1月30日，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召开了各族各界关于认购公债座谈会。同时发出号召书，提出“节约工资认购公债”的口号，直至2月24日，工商、医药等各界超额完成任务的26%。

是月31日，政协河套行政区通过了本会工作

计划纲要。

4月18日至21日，第一届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巴音浩特举行。共有委员67名，出席39名，列席20名。新增补委员28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学习周恩来副主席和郭沫若副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关于知识分子使命》的报告。二、讨论本会1956年第一季度工作和全年工作计划。三、讨论研究关于畜牧业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提出今后工作任务。四、增补本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李建章、牛顿，常委赛音。

5月，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通过了第一季度工作报告及全年工作计划。

6月6日，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选派罗永寿、孙明海、李文钦、罗桂芳等六名学员到内蒙政协短期政协业余学校学习。

是月，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根据罗瑞卿部长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24次常务委员会所做出的《关于处理战争犯罪分子问题的报告》召开了座谈会，一致拥护中央所采取的宽恕政策，并提出对蒙族罪犯要从轻处理的建议，以便进一步照顾民族关系。

7月7日，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改为政协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并选派工商界杜俊才、梁益恭、韩应魁、赵占元、段先福五人到内蒙政协参加政治理论学习。

是月，政协巴盟委员会，通过了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和宗教界人士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规划，通过举办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讲习班计划，每期三个月，从8月2日至10月31日，要求通过政治教育，提高思想认识，促进生产经营积极性，为今后思想改造工作打好基础。

是月，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根据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对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和宗教界中、上层人士的政治理论学习规划的指示精神，设立了学习委员会，由主任委员苏和，副主任委员杨树森、万治、王恩荫和委员共13人组成。

是月，成立了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办公室。

8月2日，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期工商业者讲习班开学。参加学习的共60人。

9月10日，政协巴盟委员会举办第一期喇嘛界（格斯贵以上）学习班。

10月6日至9日，第一届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套行政区礼堂举行。共

有委员67名，出席59名，列席18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学习全国政协副主席、郭沫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议上所作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使命的报告》。二、传达杨植霖副主席在内蒙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为加速我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而斗争的报告》。三、听取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主席郝平南同志《关于目前国内外形势》的政治报告。四、讨论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秘书长杨树森同志《关于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五、通过第一届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报告的有关决议。六、增选本届常务委员四名：李桂芳、徐秀泉、韩有福、稍德保。七、补选本届常委二名阎鲁卿、郝威。

11月5日至12月5日，政协巴盟委员会组织了喇嘛学习会。

11月24日，政协河套行政区办公室召集了统战工作座谈会，由秘书长杨树森作了“关于党内党外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告，并进行了座谈讨论。

10月13日至12月13日，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组织了第一期工商界学习班，参加学习的32人，学习班上开设了工商业者政治常识读本、民

族政策、时事、企业改革读本四门课程。

11月22日至12月22日，政协巴盟委员会组织了来自全盟20个大寺庙78人的喇嘛座谈会。

12月24日，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第二期工商业者讲习班。

10月26日，政协巴盟委员会邀请巴市各族各界民主人士20人，召开了关于学习民族政策和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座谈会。

11月5日，政协巴盟委员会派宗教界人士王维智、杨生茂、丁义昌、马清文四人赴呼和浩特市大寺学习。

12月27日，第一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巴音浩特举行。

12月13日，政协巴盟委员会，为加强宗教界联系，开展政治协商统一战线工作，及时听取宗教界反映意见，沟通政策思想，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政策法令和各项中心工作，召开了23人参加的宗教界人士座谈会。

12月24日，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九次常务委员会通过了由19人组成的民族宗教工作组。

一九五七年

5月18日，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成立了民族宗教组。并通过民族宗教组工作简则。

6月3日至8月3日，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举办了有65人参加的工商业者政治讲习班。

6月11日至15日，第二届政协巴彦淖尔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阿拉善旗举行。共有委员67名，出席35名，列席15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二、传达内蒙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精神。三、讨论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抗灾保畜运动。四、审议本会第一届常委会工作报告。五、通过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各项决议。六、选举第二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

6月15日，第二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第二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巴图巴根，副主席陈爱尔德尼巴图、何兆麟、刘思孝、金允诚、卜云岫、李建章、牛顿，秘书长布和，常务委员巴彦贺喜格、王维智、司乌图那笋、李树德、李文钦、金巴图道尔吉、胡艾立佐巴依尔、马维荣、张文选、富珠烈、齐文奎、叶松林、赛音。

6月28日，政协巴盟委员会第十次常委会议通过全年工作计划纲要。主要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加强全盟各族人民团结，扩大民主生活，动员社会力量，积极贯彻党对畜牧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协助党和政府，积极贯彻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农牧业大丰收，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盟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工作。

7月22日，政协巴盟委员会召开了学生家长和本会在巴市的委员座谈会。54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座谈了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业问题。

7月24日，成立了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文教艺术工作组。由35人组成。

7月30日，成立了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工作组。由26人组成。

11月12日至12月15日，政协巴盟委员会举办了全盟牧区第一期座谈会。学习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总路线、总任务、民族宗教政策和当前时事。

一九五八年

1月24日至25日，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召开反右派斗争会议，68人出席了会议。错误地将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李润泉、安宗杰、苗瑞风，陕

坝政协委员会委员张俊杰打成了右派分子。

2月6日至7日，反右斗争大会进行了专题鸣放，共鸣放出78条意见。

2月7日，河套行政区委员会召开了常务委员会会议，作出撤销安宗杰、张俊杰、李润泉的本会委员职务。

7月24日，政协巴盟委员会和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两会合并工作完毕，定名为政协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并宣布正式办公，地点设在巴盟三圣公。（即今天的磴口县）。

12月1日至13日，政协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召开了向党交心会，这次会议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文件，讨论目的意义。第二阶段写大字报，集中向党交心。第三阶段梳思想辫子，整理交心意见。第四阶段讨论加速个人自我改造的跃进规划。

12月，盟政协举行座谈会，热烈拥护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

12月31日，政协巴盟委员会政治业余学校正式成立。

一九五九年

1月5日，政协巴盟各级民主人士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速自我改造集体公

约和个人改造规划。

是月25日，政协巴盟委员会召开了会议，评比了全盟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个教会的神职人员，阿訇教长共46人的集体公约，个人改造规划。

是月31日，成立了由17人组成的政协巴盟宗教工作组。

是月，政协巴盟委员会组织盟级在职科处局级以上非党人士31人参加的高级学习组学习。

2月3日，政协巴盟委员会接受了内蒙古由青海塔尔寺主持交来我盟的47名喇嘛。

2月5日，政协巴盟业余政治学校正式开学，参加学习的各族各界人士共61人，学习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学习期为3个月。

2月14日至3月28日，政协巴盟委员会组织青海塔尔寺喇嘛进行了学习，并配合搞清疏散喇嘛的政治摸底工作。

是月20日，成立了由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共17人组成的民族宗教工作组。

是月28日，政协巴盟组织各族各界人士，为迎接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生产大跃进，举行了新年除夕赛诗晚会，出席会议的有盟、局、旗县科局级以上人士54名，机关干部，歌舞团

100余人，共写诗150首，盟歌舞团演出了节目。

是月，盟政协召集盟直属机关人士座谈会，坚决支持古巴、刚果人民的民族、民主独立运动和反帝斗争。

3月30日，盟政协组织盟一级机关非党人士和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谴责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违背西藏人民意志，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逆进行叛乱的罪行，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命令。

4月27日，盟政协举行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破坏我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可耻行为，坚决拥护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5月8日，盟政协召开了75人参加牧主座谈会。

是月九日，盟政协组织在盟学习的各旗县寺庙喇嘛80余人的参观团赴呼、包二市进行参观学习。

5月27日至6月10日，第三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巴彦高勒举行。共有委员123名，出席85名，列席229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巴图巴根主席作政治报告。二、传达内蒙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的

报告。三、审议本会第二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四、听取和讨论关于西藏叛乱的报告。五、通过第三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报告的决议。六、选举第三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6月10日，第三届政协巴彦淖尔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第三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巴图巴根，副主席关保、陈爱尔德尼巴图、王恩荫、金允诚、巴云英、牛顿，秘书长博彦，常务委员巴图毕力格、王增堂、白福民、李桂芳、齐文奎、李瑞林、巩受青、邢复礼、孝顺嘎、朱士俊、李树德、苏德保扎木苏、苏魁、武瑞明、金巴图道尔吉、哈尔巴拉、马维荣、陈靖邦、徐声波、博彦、富珠烈、黄孟克乌力吉、杨生茂、嘎瓦。

是月，本会接待了自治区人大和政协两会来我盟视察的委员和代表，同时组织本会委员配合到农牧区进行视察。

6月11日，盟政协召开了本会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会议根据盟委开展增产节约的号召，具体讨论了如何在各族各界人士中开展这一工作。并就当前市场供应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座谈，同时根据节约精神，印发了向各地委员和所联系的各界人士的书面材料，号召他们积极

响应党委号召，投入增产节约运动。

7月14日，为了发展生产，巩固社会治安，盟政协和公署联合召开了对阿旗民间枪支的清理、登记、管理座谈会，达理扎雅盟长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

7月27日至29日，盟政协召开了盟直属单位非党科处级和部分工商业者及宗教界人士服务和思想改造情况汇报会议，会议上交流了经验，统一了思想，肯定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今后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8月29日，盟政协召开了三届二次常务委员扩大会议，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盟党委负责同志作了关于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决议和开展增产节约的报告。会议要求各界人士，提高思想认识，以实际行动反右倾，鼓足干劲，积极投入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

是月，盟政协将巴盟业余政治学校改为巴盟政治学校。

10月，盟政协协助民政部门召开了少数民族工作座谈会。会上总结了十年来我盟的民族工作，并根据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结合我盟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今后的民族工作任务。

11月20日，本会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巴盟政治学校学习制度，学习委员会工作简则和人员名单。

学委会主任委员：巴云英

副主任委员：陈爱尔德尼巴图、王恩荫、博彦、哈尔巴拉。

委员：孝顺嘎、邢复礼、巴图毕力格、李文钦、巩受青、黄孟克乌力吉、赵国兴、乌云达赖。

12月至60年1月，盟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到北京参观了十大建筑。

一九六〇年

1月8日至14日，盟政协召开了全盟各族各界民主人士思想改造经验交流汇报会议，会上，达理扎雅盟长讲了话，盟委书记刘健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工作报告，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汇报政治思想改造情况，交流经验，检查和修改自我改造规划，进一步加强和推动各族各界民主人士的政治思想改造工作，继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2月20日，本会第八次常委会议通过59年5至12月份工作情况报告，及政协巴盟委员会关于

组织全盟机关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总路线教育学习计划。

2月28日，盟政协举办直属机关各旗县非党科、处局以上的民主人士、工程技术界知识分子和医务界中西医主治大夫共54人参加的为期55天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教育座谈会。会议由本会副主席陈爱尔德尼巴图，统战部长博彦，政协副秘书长孝顺嘎同志主持。

5月5日，盟政协为了在喇嘛巴音户中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继续加强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组织全盟喇嘛和巴音牧户在阿拉善旗进行为期63天的总路线教育座谈会和思想改造现场会议，205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喇嘛117人，巴音牧户95人。

6月18日，本会第11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政协巴盟委员会《关于开展搜集民族历史资料工作的初步意见》。并作出如下决定：

- 一、搜集编写题目7条供参考；
- 二、组织由9人组成的撰写领导班子。

政协巴盟委员会搜集编写民族历史资料组，按地区划分，下设四个编写小组：1、阿拉善旗组，组长陈爱尔德尼巴图，额济纳旗组组长塔旺扎布，乌拉特旗（包括前、中、后旗）组长

巴云英，河套组组长王恩荫。

8月2日，主席办公会议决定重新改组文史资料编写小组，并增聘本会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为组员。撰写内容增设民族、宗教两个部分。会议还决定了征集和研究资料的内容及范围。并订出18个编写题目，通过了各小组组员名单。

8月4日，本会第13次常委会议通过政协巴盟委员会改进工作试行办法。

8月9日至10日，盟政协召开了盟直属单位民主人士个人政治思想改造规划检查评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个人改造规划的执行，认清形势，明确任务，继续加强思想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做出贡献。参加会议的有机关民主人士，工程技术界知识分子，医务界大夫20余人。

9月22日，巴盟政协委员会作出了下半年工作安排意见，主要工作任务是：大力动员各族各界民主人士积极投入和支援以农业为中心的各项生产建设，积极开展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大搞政治理论学习，在工作、劳动和学习中全面地深入地进行政治思想改造。提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自觉性，争取年终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面作出更大成绩。

9月19日，巴盟政协在盟政治学校增设知识

分子班。

10月21日至28日，第三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巴彦高勒举行。共有委员123名，出席71人，列席100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听取内蒙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内蒙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有关文件传达报告。二、听取盟委书记郭全德关于“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加强改造，积极服务”的政治报告。三、审议了本会三届一次委员会工作报告。四、听取和协商公署副盟长关保同志所作的，巴盟行政区规划调整的报告。五、第三届政协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各项报告的决议。六、增选副主席一名。补选常务委员一名。

11月10日，盟政协选派11名民主人士，赴内蒙社会主义学院参加第三期的政治理论学习。

一九六一年

3月1日至6月30日，盟政协组织了全盟各级机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共125人到政治学校参加为期4个月的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和内蒙党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等文件。并听

取了内蒙党委胡昭衡书记，盟委刘健书记，盟统战部博彦部长等负责同志关于形势任务，粮食问题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报告。

4月28日至29日，盟政协召开了盟直机关非党科、处、局长级干部和非党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和中西医主治大夫参加的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关系座谈会。主要内容是征求非党干部对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的意见，通过座谈交流了工作经验，以帮助党搞好各项工作。

6月21日，盟政协召开了第18次常委会议。会上通过了政协巴盟委员会1961年工作计划，主要任务是：“在盟委领导下和内蒙政协指导下，动员各族各界人民，坚决贯彻中共中央12条指示和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大力推动民主人士积极投入以粮为纲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并加强对民主人士的形势教育，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帮助民主人士认清形势，明确方向，稳定情绪，加强改造，积极服务，并在服务中做出成绩。

8月29日，盟政协召开了第19次常委会议，会上通过了本会政治学校3至6月份学习情况总结。主要帮助各族各界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进行形势教育，时事政策的教育和学习，坚定自我改造的信心和决心。

10月，盟政协决定，盟直机关具有大学文化程度
的非党知识分子63人，编为本会政治学校一个班，
并分五个小组在指定单位进行政治理论学习。

是月，盟政协组织政治学校的38名学员分三批到杭锦后旗、五原县、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的厂矿、学校、农村人民公社小队，饲料基地，防沙林场进行参观访问。

一九六二年

2月，盟政协组织了政治学校的全体成员传达内蒙政协学习理论座谈会精神，并根据此精神，开办了六、七两期学习班。

4月19日，盟政协召开了第30次常委会议，通过了本年工作要点，要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加深对各界人士形势教育，以达到调整关系，增强团结，调动服务，推动改造，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4月25日至5月18日，第四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磴口举行。共有委员133名，出席111名，列席27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听取盟委第一书记政协主席巴图巴根同志传达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和当前全盟形势、

任务及政协工作问题的报告。二、听取盟委书记刘健同志《关于民族政策的报告》。三、审查三届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四、通过第四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五、选举第四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5月18日，第四届政协巴彥淖尔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第四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巴图巴根，副主席郭全德、陈爱尔德尼巴图、王恩荫、巴云英、布和、牛顿、齐图门巴依尔（齐文奎），秘书长博彦，常务委员李德义、哈尔巴拉、德格都宝音、赵瑛、白福民、苏魁、李瑞林、孝顺嘎、李树德、王增堂、郝威、金巴图道尔吉、巴图毕力格、陈靖邦、黄孟克乌力吉、嘎瓦、罗永寿、巩受青、博彦、杨生茂、朱士俊、马维荣、武瑞明、翟荣光、罗虎、李文钦。

6月19日，盟政协召开了全盟部分民主人士，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和公私合营的牧场场长座谈会。到会人数共50人。会上协商了有关政策性的具体问题，并传达学习了乌兰夫同志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十五年贯彻民族政策的情况报告》。

8月20日至9月4日，盟政协委员组成合作

共事关系视察组，视察了直属机关13个单位的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重点了解了水利局，盟医院等单位，并邀请那里的非党领导干部进行了座谈，交换了共事关系的意见，听取了反映，提供了建议，并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加强对党团员的政治教育，认真搞好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充分发挥非党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9月，盟政协配合内蒙和盟卫生检查团到五原、中旗、前旗和伊盟等地进行爱国卫生检查。

一九六三年

8月，本会配合内蒙工作组对阿左、临河、磴口、杭后4个旗县的民族宗教和工商工作进行调查研究。重点调查了公私合营牧场和一个大庙。对牧场公私共事关系，经济关系，体制和经营管理，对寺庙财产管理，文物古迹的保护，喇嘛生活和宗教活动等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建议。

2月25日，本会第三次常委会议通过了本年工作要点：主要任务是继续调动各族各界人士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周围，为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为在争取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新胜利斗争中发挥应有作用，做出更多贡献，与此同时，继续推动各族各界人士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4月16日，本会召开了政协机关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4月17日，本会举行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座谈了盟委巴图巴根书记关于“五反”运动的报告。

6月13日，盟政协召集了盟级机关非党局、处长、科长以上的干部座谈了“五反”运动的开展情况。

6月28日，盟政协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讨论通过了巴盟政协工商联办事处两会机关工作制度补充规定。

8月2日，盟政协第九次主席办公会议通过巴盟政协关于组织盟直属单位民主人士学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议的安排意见。

是月5日，盟政协组织了盟级各单位44余人的局处长以上的民主人士，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为期33天的短期集中学习，较系统地学习了党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发表的有关声明和评论，并采取对照学习方法参考了相应的有关反面材料。基本上达到了自己提出

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要求。

是月，盟政协组织盟直属机关的局、处长非党人士，到基层参加劳动和视察工作，进行三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学习教育。

9月11日至28日，盟政协为了配合三个主义的思想教育，帮助各界人士从实际上了解人民公社，巩固集体经济，发展生产和组织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组织盟直属单位的17名政协委员，到中后旗对畜牧业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收入，文教卫生的发展进行了视察活动。

9月9日，盟政协派出六名民主人士赴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参加了为期四个月的第五期政治学习。

9月16日，盟政协召开了为期83天的东部地区喇嘛，巴音户座谈会议。到会人数共118人，其中喇嘛50人，巴音户18人，这次座谈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三个主义教育，会议采取了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实行了“三自，三不”的原则。

10月30日，盟政协接待了内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十人的视察组，并陪同他们到巴彦高勒镇，临河，五原进行了为期12天的视察活动，重点视察了医院，蒙文中学，黄河大铁桥和枢纽工程，临河一中，五原机械厂，手工业综合场，塔尔湖防沙林场。

1963年10月，盟政协组织本会常委和驻巴市委员，听取了中蒙划界情况的报告，协商了盟内行政区的调整。

11月5日，盟政协在巴盟政治学校召开了为期40天的全盟宗教界人士及巴音户座谈会。到会的喇嘛101人，巴音户35人，天主教神甫、修女、教徒26人，基督教界32人，伊斯兰教阿訇、教长33人，共227人。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在各界人士中开展以反帝、反修，爱国守法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团结一切力量反帝、反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极服务。

11月23日，盟政协组织盟直属机关的22名民主人士，参加学习《人民日报》关于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文章的讨论会。

12月30日，盟政协组织盟直属机关民主人士50名各族干部在业余政治学校，学习了“双十条”。

一九六四年

1月15日至2月5日，盟政协组织所联系的各界人士在政治学校进行了为期20天的“双十条”学习讨论会，参加学习的有，非党副盟长，政协副主席，盟直属单位的局处长级民主人士，

部分科长级人士，工程技术及文教卫生界人士共38人。

1月20日，盟政协召开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驻巴镇的盟政协委员，工商界，宗教界代表人士及盟直局处长级以上的民主人士共35名。会议一致拥护毛主席支持巴拿马人民爱国斗争所发表的谈话，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屠杀巴拿马人民的血腥暴行。

2月11日，盟政协选派11名民主人士到内蒙社会主义学校参加第六期政治学习。

3月1日，盟政协主席办公会议通过了本会64年工作计划，主要内容是在盟委的领导下和内蒙政协指导下，学习解放军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继续加强政治思想和政治协商活动，推动各界人士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不断提高觉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争取我盟农牧业大丰收和国民经济的新高潮，积极贡献力量。

是月，盟政协召开了盟直、局处长级民主人士68人参加的为期5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会议，学习会分四个阶段进行，以学习23条为主，结合学习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通过学习，向各界人民

进行一次深入地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兴无灭资，提高政治思想认识，加强自我改造。

5月3日至6月17日，第四届巴盟政协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巴彦高勒举行。共有委员113人，出席75名，列席49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听取盟政协副主席郭全德传达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精神。二、听取盟政协副主席陈爱尔德尼巴图传达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在全国政协三届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听取盟政协副主席王思荫传达内蒙政协副主席李世杰在内蒙政协第二届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四、听取盟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德义传达王再天书记在内蒙政协二届四次会议上讲话和乌兰夫主席在内蒙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五、听取盟委书记刘健，乔桂章，盟长肇和斯图作的《关于当前形势任务，反修斗争和民族工作情况》等报告。六、通过第四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

6月20日，盟政协选派14名学员到内蒙社会主义学校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第七期政治学习。

6月30日，盟政协组织25名蒙族民主人士到牧区进行参观访问，以实际行动接受一次深刻的三个主义教育。

9月，盟政协配合内蒙和盟卫生检查团赴五

原、中后旗、前旗、伊盟进行爱国卫生检查。

9月30日，盟政协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庆祝建国15周年和自治区成立17周年，与会人员联系国内外形势，回顾建国15年和自治区成立17周年，全国、全区、全盟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畅谈了感想认识。

11月3日，盟政协召开了三个主义教育学习会。参加会议的有各旗县市统战部，政协，工商联，民族宗教部门和重点旗县的商业局，盟政协有关人员，学委会成员和盟直属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共177人，会议听取了三个主义的传达报告，交流了各旗县市开展三个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经验，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为更加广泛、深入、系统地开展三个主义教育运动创造了良好条件。

12月，盟政协协助党政有关部门进行全盟性的民族政策检查，深入有关地区着重了解蒙古语言文字使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民族商品供应和生活待遇等情况。

一九六五年

3月1日至8月6日，盟政协召开了盟直机关68人的民主人士社教会，会上学习了“二十三”条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并错误的决定撤消牛顿盟政协副主席职务，给公署副秘书长金巴图道尔吉和驻会委员塔尔巴喇嘛戴上反动分子的帽子，会议还组织全体驻会者赴盟委书记巴图巴根蹲点的临河丹达公社参观了“四清”运动的成果。

12月31日，盟政协召开了第二次双周座谈会，盟直属机关局处长级民主人士，巴镇政协委员共三十四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围绕国际，国内，巴盟形势任务，当前几项主要工作进行了座谈讨论。盟委书记刘健到会作了关于当前形势任务的报告，并要求大家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坚决大干五年，改变我盟农业生产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发扬不断革命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大寨精神，实现四百万亩亩产四百斤光荣任务。

8月9日至23日，第五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巴彦高勒举行。共有委员157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学习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二、盟政协副主席齐文奎同志传达内蒙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三、盟政协秘书长博彦同志传达中共内蒙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同志的报告。四、盟委书记巴图巴

根作政治报告。五、审议政协巴盟第四次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六、选举政协巴盟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七、通过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8月23日，第五届政协巴彦淖尔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第五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巴图巴根，副主席郭全德、肇和斯图、陈爱尔德尼巴图、王恩荫、巴云英、齐文奎、苏德保扎木苏、巴图毕力格，秘书长博彦，常务委员李德义、孝顺嘎、巩受青、查干、苗瑞风、黄孟克乌力吉、白瑞卿、翟荣光、李文钦、博彦、朱士俊、苏魁、牛顿、巴图、周德义、陈靖邦、云生格、罗虎、郭子清、李树德、王增堂、嘎瓦、达瓦、陶光瑞、王维仁、郝威、巴拉登藏吾。八、通过政协盟第巴四届委员会常务工作报告的决议。

一九六六年

2月，盟政协在畜牧局会议室举行春节联欢座谈会，盟委副书记郭全德同志到会讲了话。

4月，盟政协组织非党处局级政协委员到中旗川井公社参观四清试点工作和参加抗旱保畜运动。

5月份，“五一六”通知后盟政协被迫停止

工作和一切活动，直至1975年9月，盟政协名义上恢复了工作。

一九七七年

8月，盟政协各界民主人士派代表参加欢迎乌兰夫的仪式。

是月，盟政协派出爱国人士代表团赴呼和浩特市，参加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

是月，盟政协组织了少数民族各界爱国人士代表团在临河参加了巴盟的庆祝活动，并参观部分工厂，先进社队，黄河枢纽工程和全盟工农牧业建设成就的展览。

一九七八年

1月30日至31日，盟政协召开五届三次常委会议，盟政协副主席苏德保扎木苏主持了会议，11名常委出席了会议，会议上传达了全国人大四届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四届七次会议的有关讲话。内蒙党委关于召开内蒙人大和政协会议的通知，研究有关六届政协会议的筹备事项，协商讨论五届政协常委会向六届政协会议提出的常务工作报告修改稿，并原则上通过了参加六届政协委员会的131名委员的候选名单。

9月，盟政协协助盟委，同有关部门配合，

在爱国人士中进行了各项政策的落实工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安排了工作，平反昭雪了各界爱国人士的冤假错案，赔偿了经济损失，补开了追悼会，适当解决和安排了部分爱国人士的子女升学就业等问题。

10月16日，经中央同意，自治区党委批准，继续保留巴盟政协。

一九七九年

4月10日至15日，第六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临河盟委礼堂举行。共有委员138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二、听取盟委书记、盟政协副主席韦荫秀同志的讲话。三、审议通过五届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四、选举产生了巴盟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五、决定通过政协巴盟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

4月15日，第六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第六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宝音图，副主席韦荫秀、弓志芳、云生格、齐文奎、苏和、陈靖邦，秘书长宗德旺，常务委员牛顿、王益三、王维仁、王荫卿、

包金海、任春林、李树德、那音太、罗虎、罗永寿、张沧、张玉荣、张伟平、巩受青、董炎炳、董然韬、段塔拉腾岱、董高升、陶光瑞、郝威、孟传志、黄岱、喇嘛扎布、袁昌金、徐秀泉、特木尔巴图、马玉金、额尔德尼、博彦、贤吉美图、周德义、王作林、满达哈立珍、孙明海、明安、杨泽、刘炳池、马生华、吴振荣、李克森布。

8月28日至9月9日，盟政协召开了六届二次常委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精神和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精神，自治区政协四届五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政协巴盟委员会下半年工作要点》。并联系实际，对于我盟各条战线上的工作，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建议和意见。会议在9月1日至9月9日进行参观，先后参观了中后德令山水库，巴音哈太公社畜牧业生产，牧草建设，温更公社红格水库，潮格巴音宝力格公社社办企业，硫铁矿，蒙校和生产队。

9月30日，盟政协召集各界人士，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和阿、额两旗和平起义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11月，盟政协常委和部分委员参加了盟公署组织的国家对八种副食品实行提价和对职工实行差价补贴的物价政策检查工作。

一九八〇年

4月，恢复了巴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议，传达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领导同志关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今后征集和撰写工作的意见。

5月1日，盟政协派代表弓志芳、罗永寿参加了阿拉善盟成立大会。

9月15日，盟政协召开第三次常委会议，商讨讨论了盟政协六届二次全委会议的有关事项，听取了秘书长宗德旺关于筹备工作情况报告，通过了六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大会议程，成立了提案审查小组，讨论了组成人员名单，协商了盟委提出的关于加强盟政协领导力量，增补主席，副主席，常委的建议。

9月17日至22日，第六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临河盟委礼堂举行。共有委员138名，出席100名，列席30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学习讨论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五届政协三次会议文件。二、审议通过六届一次常委会工作报告。三、增补本届

委员会主席韦荫秀，副主席吴振荣、罗鉴、董炎炳。常务委员刘桂清。四、成立本届委员会提案审查小组。五、听取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六、通过第六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决议。

一九八一年

4月21日至24日，盟政协举行六届五次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了胡耀邦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学习讨论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内蒙党代会议重要文件，传达了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自治区政协第四届三次会议精神，研究讨论了盟政协81年工作意见。

5月14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赵展山同志等6人来我盟视察，盟政协副主席弓志芳陪同，并召开了农科界代表，自治区在我盟临河地区政协委员座谈。到临河地区视察少数民族生活情况和生产责任制情况。到磴口县参观了三圣公黄河枢纽工程。到杭后了解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到乌前旗大余太公社，五原民族公社，巴彦公社了解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和民族政策落实情况，并召开了座谈会。

10月19日至24日，盟政协召开六届六次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常委24名，列席7名，共31

名。会议传达了自治区政协四届十三次常委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共中央(81)28、31号文件，自治区党委39号文件，审议通过了盟政协机构设立处级办公室和文史资料处的决定，审议通过了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学习委员会两个组织新的组成人员名单。

10月26日至30日，盟政协召开了有盟委领导，盟政协副主席，盟文史资料研究会主任，副主任，盟直有关单位，出席会议的各旗县文史资料工作干部共60人的第二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第三次文史资料会议精神，听取了内蒙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实况介绍和内蒙文史资料工作总结报告。总结了巴盟文史资料工作，研究安排了今后工作并作出了82年文史资料工作预计经费报告。

12月29日至30日，盟政协邀请在临河地区的政协委员，爱国人士共23人，举行迎新座谈会，盟委副书记韦荫秀到会看望了大家，盟统战部副部长李子伟出席了座谈会。会上还宣读了五届政协四次会议政治决议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副主席罗鉴为座谈会作了结束讲话。

一九八二年

2月9日，盟政协主席办公会议通过1981年工作总结和82年工作安排。

3月9日至10日，盟政协召开了临河地区政协常委，委员关于深入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座谈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盟文办，盟民政局，盟商业局，盟交通局等负责人，还有盟医院，中蒙医院，巴建工程师及驻会常委共14人。盟统战部副部长宗德旺同志主持会议，盟政协副主席罗鉴同志会上讲了话。

5月18日至20日，盟政协组织在临河地区的常委、委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进行了学习讨论，会议由盟政协副主席罗鉴主持，盟政协副主席弓志芳、齐文奎、董炎炳，盟统战部副部长李子伟及政协全体同志，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学习讨论，会上，委员们提出了修改和补充意见。

6月20日至21日，盟政协召开了六届七次常委会议，会议上审议了六届三次会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会议筹备情况的工作汇报。审议了六届二次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审议了六届二次会议提案处理情况的报告及六届三次提案处理办法。通过六届三次会议的议程，日程，领导，工

作机构，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6月22日至26日，第六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临河盟委礼堂举行。共有委员132名，出席64名，列席10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通过政协巴彦淖尔盟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二、通过政协巴彦淖尔盟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日程。三、通过政协巴彦淖尔盟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四、传达自治区政协四届四次会议和自治区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五、审议政协巴彦淖尔盟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六、审议政协巴彦淖尔盟第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七、听取巴盟行政公署盟长的工作报告。八、传达内蒙古自治区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九、学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十、通过政协巴彦淖尔盟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十一、通过政协巴彦淖尔盟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和提案审查报告的决议。

7月23日，盟党委办公室批转了盟政协党组《关于当前全盟文史资料工作开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8月13日至15日，巴盟政协召开第六届第九

次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盟政协常委，驻临河地区的盟政协委员，内蒙政协委员，盟委统战部和各旗县政协统战部负责同志共53人。会上弓志芳副主席传达了内蒙政协第四届第十七次常委会议精神，收听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同志关于四化建设的录音报告，讨论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草案》并提出了五十九条补充修改意见和建议。

一九八三年

2月7日，盟政协邀请驻临河地区的盟政协常委、委员共31人，举行了迎春茶话会，出席茶话会的有：盟政协副主席弓志芳、齐文奎、罗鉴、董炎炳，统战部部长吴振荣。茶话会由弓志芳同志主持。

1月17日至18日，巴盟政协召开了在临河地区的政协常委、委员座谈会。会议上一致拥护调整纺织品价格和对江青、张春桥减刑的决定。盟政协副主席王守玉主持，盟政协副主席齐文奎、吴振荣、董炎炳及常委、委员27人出席了会议。

8月10日，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学习中央关于出版工作有关文件，核实，修改，审定了准备出版的史料稿

件。

10月18日至21日，盟政协在临河召开六届十次常委扩大会议。盟委书记伊钧华，盟公署原副盟长巴图，盟政协主席韦荫秀，副主席弓志芳、齐文奎、吴振荣、罗鉴、董炎炳，盟政协常委，驻临河地区政协委员和各旗县政协主席或副主席共68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听取了韦荫秀主席的重要讲话和弓志芳副主席传达的自治区政协五届三、四次常委会议精神。听取了中宣部长邓力群同志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常委会上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录音报告。听取了盟政法委员会宋喜山同志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情况报告》并一致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和《关于坚决拥护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议。

10月30日，巴盟政协办公大楼落成。

11月30日，巴盟政协迁至办公大楼。

11月，巴盟政协文史资料处出版了第一辑《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八四年

1月24日，盟政协召开了新老主席座谈会，会议扩大到七届一次筹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参加，初步拟定了召开七届首次全委会的筹备

工作方案。

2月21日，盟政协召开了六届十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召开盟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日程、议程，研究提交七届一次全委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六届提案处理报告，协商盟委提出的下一届政协领导成员名单，协商主席团，秘书长建议名单。

2月25日至28日，第七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临河巴盟政协会议室举行。共有委员179名，出席141名，列席12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盟政协主席巴图同志做工作报告。二、听取盟委，公署领导人讲话。三、审查政协巴盟六届委员会提案处理情况的报告。四、选举政协巴盟七届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委员。五、通过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六、通过政协巴盟七届一次全委会提案审查报告及决议。

2月28日，第七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第七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巴图，副主席都瓦沙、齐文奎、董炎炳、李克森布、李辅成、吴成先、额日奇、罗达、昭那木尔、吉林太、李琴堂、黄振忠，常务委员王荫卿、王维仁、王作林、任春林、齐伦、佟巴图、苏明金、李子伟、李树德、

李广东、那银太、贤吉美图、宗德旺、杨庆元、杨登云、张文品、张登科、张沧、张万光、张建芳、张麟勇、明安、若西色登、罗虎、罗永寿、罗步云、拉嘛扎布、孟传志、倪宽栋、阿格旺罗布桑、陈彦颐、叔庆喜、骆秉枢、骆宝林、贺永华、段全嘉、翁明仁、徐秀泉、郝威、恩和其其格、梁玉、彭效文、董然韬、陶光瑞、罗岩峰。

3月1日，盟政协召开了七届第一次常委会议，会议上宣布了主席分工，讨论了机构设置，安排了当前工作，决定了副秘书长入选。

3月16日，盟政协召开了新老主席合作交替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六届主席苇荫秀，副主席弓志芳、吴振荣、罗鉴同志，七届新当选的主席巴图，副主席都瓦沙、齐文奎、李克森布、李辅成、吴成先、额日奇、罗达、昭那木尔同志。参加座谈会的还有盟委统战部部长骆秉枢同志和政协六届正副秘书长和七届正、副秘书长。座谈会由巴图同志主持。

是月12日，盟政协创办了《巴盟政协》会刊，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盟委员会机关刊物。

是月20日，盟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会议决定将盟政协七届委员以旗县、盟直为单位建立12个联系组，其中旗县7个，盟直5个，编入联系小

组，共计150人。

3月24日至4月13日，盟政协工作组委员会视察组由李辅成、额日奇两位副主席带领；还有常委张文品等先后视察了六个旗县的工厂、农村牧区和先进集体。访问了养鸡、养猪、养牛等专业户，视察了文明村，牧区的风力发电点和勤工俭学搞得好的农村小学。并和当地党政、政协领导同志进行了座谈，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写出了《关于磴口、五原等地农村两户发展和文明村镇建设情况的考察》、《关于牧区推行双包责任制情况的调查》、《关于旗县政协换届及开展工作中一些问题的调查》。盟委根据盟政协调查的意见，发了《关于进一步作好人民政协工作的通知》。

4月，盟政协成立了非党委员落实政策小组，由两名副主席牵头组成了专门办事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负责督促、检查全盟三级政协委员的落实政策问题。

5月22日，盟政协召开了全盟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各旗县政协分管文史资料工作的主席、副主席，文史工作负责人，盟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及在文史资料中做出贡献的代表共60余人。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四次，自治区二次文史资料

工作会议精神，听取了盟委副书记杜凤华同志作的《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做好文史资料工作》讲话和各旗县政协的工作汇报，交流了经验，罗达副主席代表盟文史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讨论了今后工作，修改、补充、确定了今年重点资料抢救任务共84个题目。

6月19日，盟政协召开了七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全区人大、政协会议精神，总结了我盟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讨论了下半年工作意见，学习座谈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学习了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协商讨论了我盟的经济政策问题，传达了自治区召开的盟市政协主席，统战部长座谈会精神，交流了各旗县政协工作情况，并根据工作需要，决定王维强同志为巴盟政协副主席。

6月14日，盟政协召开了各旗县政协主席座谈会。研究体改后人民政协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开创新局面，积极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盟政协主席巴图主持了会议，各旗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张交其、敖特恒、巴图巴雅尔、李元治、毛拴才、李文珠、张麟勇，盟政协副主席都瓦沙、齐文奎、李克森布、李辅成、吴成先、罗达、昭那木尔、吉林太、黄振忠，秘书长罗岩峰，副秘书长吉仁太、吴宝音、王维强出席了会议。

6月至7月，内蒙古工商联驻巴盟办事处，巴盟商业处分别邀请了包头、天津民建、工商联咨询服务组先后来我盟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咨询服务活动主要是为了丰富我盟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变副食品、糕点生产单调、落后状况。

7月3日至11日，盟政协组织了调查组，调查了1至7月份临河县蔬菜上市量，并赴包头、银川两市访问调查，向盟委提供了《临河地区蔬菜、肉食供应情况及改进意见的调查》的报告。

是月，巴盟政协文史资料，出版了蒙文版《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8月3日，自治区政协主席石生荣，副主席韩明，联络处副处长王世英等同志来我盟政协视察工作，盟政协举行了座谈会，巴盟主席向视察组同志汇报了盟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石主席和韩副主席听后，对盟政协五个月来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巴盟政协在较短的时间里，做了许多工作，说明新的领导班子有气魄、有干劲，这是做好工作的前提。视察组的同志还对今后人民政协工作谈了意见。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盟政协副主席都瓦沙、李克森布、吴成先、罗达、昭那木尔，秘书长罗岩峰，副秘书长吉仁太、吴宝音、王维强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共20

余人。

9月10日至15日，盟政协在临河召开了原乌拉特“三公旗”文史资料协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乌拉特前旗、中旗、后旗政协主席，文史资料工作人员。会议还邀请部分在原“三公旗”（中公旗、西公旗、东公旗）工作过的同志参加共计30余人。会议传达了全国四次、自治区二次、巴盟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审编了20余篇三旗的重点文史资料稿件。落实了今后文史资料的撰写任务和三旗政协协作完成的专题资料征集任务。盟政协副主席昭那木尔主持了会议，政协主席巴图和其他在家副主席出席了会议。

9月22日至30日，盟政协组织了赴伊盟、包头市学习参观团。先后参观了伊盟东胜的羊绒衫厂、中药厂，种树种草和文明城镇的建设，参观了包头陶瓷厂，并同各地政协领导进行了座谈，听取了经验介绍，交流了工作情况。

10月8日至19日，由盟政协副主席李辅成，常委张登科，工作办全智贵3人调查组对五原、杭后两个旗县，5个乡，5个生产队，15户社员，3个专业户进行了调查。提出了《关于搞好河套农业生态综合平衡，争取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调查报告。

11月21日，盟政协召开落实非党政协委员政策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旗县政协主席、副主席，统战部负责同志和盟政协主席、副主席，专职常委，秘书长，落实政策小组的同志和盟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共57人。会议听取了各旗县政协、盟直有关单位关于落实非党政协委员政策进展情况的汇报，总结了前段落实非党政协委员政策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研究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提出了下步工作的安排，并决定在本年12月底完成此项工作任务。

是月末，盟政协组成四个非党委员政策落实验收工作组，由5名副主席带队，分别到盟直和7个旗县需落实政策的294名三级非党政协委员的平反、改正，退赔财务，安排子女，生活补助等工作进行了复查、验收。

12月21日，盟政协主席会议通过八五年工作要点：主要内容是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指针。深入贯彻内蒙古自治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精神，继续学习邓颖超主席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以搞好我盟的四化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政协各位委员的联络，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各位委员、各界人士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积极主动地开展调查研究，经济咨询，引进技术等项工作，扩大和活跃人民政协在政治、文

教、卫生、科技、民族、宗教侨务、祖国统一等领域里的工作，继续搞好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加强机关建设，加强学习、团结，力争政协工作有一个新的局面，在巴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2月13日至15日，盟政协举行盟政协委员联系小组组长座谈会。总结七届一次会议以来各联系小组的活动经验，研究今后的工作，会上由杭后等地联系小组介绍了工作情况。盟政协分管副主席李克森布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后，由学委办起草了《委员联系小组工作简则》。

一九八五年

1月20日，盟政协召开了迎新茶话会，政协副主席，驻会常委和在临河地区的部分盟政协常委、委员参加了会议。盟委秘书长尚金诚同志，公署办顾问韩敬孝同志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上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进行了座谈。

2月1日，巴盟政协整党工作开始。

2月2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布赫同志在盟委副书记杜凤华、王富祥，秘书长尚金诚，公署副盟长刘峥等同志的陪同下，到盟政协

机关看望了政协负责同志，勉励大家同心协力、团结合作，为建设团结、文明、富饶的巴彦淖尔盟而努力奋斗。被看望的有盟政协主席、副主席，驻会常委，正副秘书长和六届离休副主席等20余人。

5月3日至5日，盟政协召开了七届三次常委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七届二次全委会的日期，讨论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和落实政策的报告，研究增补委员议案，决定增加一名副秘书长和成立巴盟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及办事处，增补学习委员会，工作组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5月6日至10日，第七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临河市巴盟政协会议室举行。共有委员179名，出席139名，列席9名。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巴图主席代表常委会作《以改革为中心，进一步搞好政协工作为巴盟的经济腾飞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二、盟委副书记杜风华、公署副盟长刘峥讲话。三、审议政协巴盟七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四、听取关于落实非党政协委员政策工作的报告。五、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盟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六、通过政协巴盟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关于七届二次会议提案

审查情况的报告。七、增选李茂林为政协巴盟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

6月15日，盟政协召开了全体提案工作委员会议，会上以盟委办、公署办、政协办三家联合签发了巴党办发（85）64号文件《关于认真办理巴盟政协委员提案的通知》，要求把委员提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领导要亲自过问，并责成有关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办理。

6月26日至28日，盟政协召开了对外开放铺路搭桥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员共计48名。其中三级政协委员15名，特邀人士6名，这21位同志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印尼、菲律宾、泰国、毛里求斯、丹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有亲友。出席会议的还有盟委统战部、计委、经济处、外贸处、乡镇企业处、供销社、二轻处、咨询办、外事办、人才经济中心、侨办、工商联等部门负责人27人，会议由盟政协副主席昭那木尔主持。盟政协主席巴图，副主席吴成先、李辅成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会议采取座谈协商的方法，围绕巴盟的经济建设，为引进资金、设备、技术、人才铺路搭桥，进一步促进巴盟的经济腾飞，提出了42项引进项目，开辟了新的途径。

8月30日，巴盟政协举行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座谈会。盟直和旗

县部分抗日老战士，原国民党抗日军官，爱国民主人士，台胞台属及有关单位的5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盟委委员、盟委宣传部长杨泽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盟政协副主席吴成先主持。座谈会上他们满怀激情地回顾了“七·七”事变后八年抗战的峥嵘岁月和可歌可泣的事迹，回顾了傅作义将军指挥的五原战役。

9月9日，盟政协为庆祝我国第一个教师节，召开了教师座谈会。盟政协主席巴图，副主席都瓦沙、齐文奎、李克森布、吴成先、罗达、昭那木尔、李琴堂、黄振忠和政协教育界委员及部分教育工作者近三十人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政协副主席昭那木尔主持。政协副主席都瓦沙在会上代表盟政协向全盟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衷心敬意。教育界的政协委员和其它教育工作者在座谈会上畅谈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教育战线发生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他们在自己的节日到来之际的激动心情，并表示要在今后工作中加倍努力，为振兴巴盟经济，培育建设四化合格人才贡献力量，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和信任。他们还对我盟的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民族教育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9月16日至19日，巴盟政协召开了学习、文

史、提案工作座谈会。盟政协副主席都瓦沙、齐文奎、李克森布、吴成先、罗达、昭那木尔主持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各旗县市政协分管副主席，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盟政协各委员会负责人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政协、自治区政协学习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的讲话，听取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中宣部理论局长理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问题研究所所长阚念倚的讲话录音。交流了各旗县、市政协工作情况，讨论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并决定建立盟直非党委员的双月座谈会制度，组织驻临河地区的自治区、盟两级非党政协委员及有关人士参加学习活动。

9月27日，盟政协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6周年和党的十二届四中、五中全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组织在临河的盟政协委员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上来自临河地区各条战线的40多位政协委员怀着激情，畅谈了建国36周年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党的三个会议的重大意义，热情赞颂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座谈会由盟政协副主席罗达主持，盟政协主席巴图，副主席齐文奎、李克森布、吴成先、额日奇、昭那木尔、李琴堂、黄振忠和离休老干部弓志芳、罗鉴参加了会议。

是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晋宗智来我盟政协检查工作。

9月28日至11月17日，盟政协组织了部分驻会副主席，常委和工作人员12人的学习参观团赴外地学习参观，由齐文奎副主席任团长，李辅成副主席任副团长，先后到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广州、深圳、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北京等地学习参观，历时50天。主要参观学习了外地政协工作，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各地经济情况，祖国名胜古迹。瞻仰了革命圣地。使参观团的同志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建设四化实现四化的积极性，受到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学习了外地政协工作的先进经验。

10月15日至19日，盟政协召开了七届五次常委会，出席会议的主席、副主席、常委共40余人。会上听取了盟委书记杜凤华同志的讲话，听取了盟政协吴成先副主席所作的关于七届四次常委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常委们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共中央五位政治局常委同志的重要讲话，听取了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都瓦沙同志向大家通报了政协整党情况，并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讨

论了我盟的改革和形势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精神的决议，并参观了临河糖厂。

12月18日至20日，巴盟政协在五原县召开了全盟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盟政协主席巴图，副主席都瓦沙、吴成先、昭那木尔和各旗县、市政协主席或副主席、秘书长共22人参加了会议，盟委统战部副部长胡宝成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统战、政协工作的有关文件和领导讲话。交流了各旗县政协工作经验，部署了86年政协工作任务，巴盟政协主席巴图代表盟政协作了会议总结，会议期间，盟政协副主席吴成先还召集了各旗县政协秘书长座谈会。

12月22日至30日，盟政协组织有专业知识的政协委员，分别到五原、临河、磴口进行科技讲座。

历届巴盟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表(一)

届次	职务	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		备注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第一届	政协蒙古自治洲委员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	巴图巴根	陈爱尔德 尼巴图 牛顿 何兆麟 刘思孝 金允城 李建章 卜云岫	布和	罗孟柯			

届次	职务	主席		秘书	书长		备注
		正	副		正	副	
	第二届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牛顿 李建章				增补
	第一届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郝平南	苏和 王恩荫	杨树森		魏福臻 王德义	
	第三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巴图巴根	关保德 陈爱尔巴恩 尼王允金巴牛 图荫诚英 顿	博彦		孝顺嘎	

历届巴盟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秘书长表(一)

届次	职务	主席		秘书长		备注
		正	副	正	副	
第四届政协巴盟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巴图巴根	郭全德 陈爱尔德尼 巴图	博彦	孝顺嘎 邢福礼	
			王恩荫 巴云英 布和 牛顿 齐文奎			

届次	职务		主席		秘书		秘书长		备注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第五届政协巴盟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巴图巴根	郭全德 肇和斯图 陈爱尔德 尼巴图 王恩荫 巴云英 齐文奎 苏德保扎木苏 巴图毕力格	博彦		孝顺嘎 周德义 李文钦 苗瑞风				

历届巴盟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表(一)

届次	职务	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		备注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第六届政协巴盟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宝音图	韦荫秀 弓志芳 云生格 齐文奎 苏和 陈靖邦	宗德旺		宗德旺	张沧 罗永寿	
		韦荫秀	弓志芳 云生格	宗德旺		宗德旺	王守玉 张沧	

届次	职务	主席		秘书长		备注
		正	副	正	副	
			吴振荣 罗鉴 董炎炳 齐文奎 苏和		罗永寿	
第七届政协巴盟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巴图	都瓦沙 齐文奎 董炎炳 李克森布	罗岩峰	吉仁太 吴宝音	

历届巴盟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表(一)

届次	职务	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		备注
		正	副	正	副	正	副	
第七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李茂林				王维强 周斌	增补 增补

历届巴盟政协常委、委员表(二)

届别	职务	常委	委员	备注	
第一届政协 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第一、 第二、第三次 会议		王维智	李健	白图布巴依尔	宝格德力
		司乌图那筭	辛学亮	孙明海	罗巴图吉尔格勒
		李树德	金对岱	马凤龙	陶斯尔格楞
		李文钦	马珠喜别立格	杜俊才	伦德格札木斯
		金巴图道尔吉	王增堂	列格登藏吾	额尔登格日勒
		胡艾立佐巴依尔	任春林	孙雪帆	罗虎
		马维荣	罗恩和巴图	曹格吉雅(增补)	刘宗保
		张文选	张仁	对岱(增补)	杨德元
		富珠烈	杨生茂	巴拉登喇嘛	潘金魁

续表

职 务 别	常 委	委			员	备 注
		沈智元	楚鲁	张子明		
	齐文奎	田协安	希宁	梁益恭		增补
	叶松林	常希曼	乔英	郝善谋		" "
	赛音	方秀英	陶斯	奇仍		" "
		妙谿	陶斯查干	玛呢喇嘛		" "
		陈志保	赛布音	玛图门巴依尔		" "
		鲁布僧吉格	郭维奇			" "
		米地格				

历届巴盟政协常委、委员表(二)

届别	职务	常委	委员		备注	
第二届政协巴盟委员会		巴彦贺喜格	原子美	郝瑞麟	贾有志	增补
			陈化礼			" "
注：第二届政协巴盟委员会没有选举主席、副主席、常委。只是增补上述人员，原一届领导全部连任。						
第一届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赵子文	何升岫	李学泉	黄保成	" "
		叶林	姜占魁	葛洛透	田玉明	" "
		刘勉	李桂芳	蔚虎才	丁彪	" "
		朱士俊	王茂全	李润泉	吴启昌	" "
		巩受青	高晓林	曹宽	姚震	" "

续二

职务 届别	常务委			委		员	备注
	王维仁	傅亭维	刘建仁	陈靖邦	哈斯瓦齐尔		
	韩有福	李显明	晋临祥				增补
	刘龙珍	周副舫	阎鲁卿				" "
	何玉明	葛升达赖	胡启明				" "
	稍德保	单旦	杨树森				" "
	安宗杰	车采凤	张沧				" "
	董炎炳						" "

历届巴盟政协常委、委员、表(二)

届别	职务	常委	委员	备注
第一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李桂芳(增选)	董树林	增选
		徐秀泉()	赵守业	"
		韩有福()	李惠芳	"
		稍德保()	哈立珍	"
		阎鲁卿()	骆宝林	"
		郝威()	白振铎	
第三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巴图毕力格	刘福年	阎春升
		王增堂	郎头	傲力玛扎布
		白福民	博彦	高心平

续表

届 别	职 务	常 委	委 员	备 注
	李桂芳	高树峰	单士令	陈志保
	齐文奎	陶斯格楞	耿桂芳	张秀娥
	李瑞林	赵璞	王印全	师本立
	巩受青	郝善谋	梁益恭	张子明
	邢复礼	高晓林	常一鑫	曹宽
	孝顺嘎	陈化理	韩有福	李振钢
	朱士俊	苏和	苏霖	张麟勇
	李树德	赵守业	王维荣	晋临祥
	苏德保扎木苏	徐秀泉	列格登藏吾	田协安

续表

届 别	职 务	委 员			备 注
		常 委	委 员	员	
	苏奎	金老不生	岳中和	王维仁	
	武瑞明	巴拉登藏吾	丹比加木生	田丰玺	
	金巴图道尔吉	老不生	阎秉智	达木彦道尔吉	
	哈尔巴拉	阿格旺巴拉登	阿布根鲁布生	单旦	
	马维荣	林茂加木苏	郝威	马风龙	
	陈靖邦	马学良	伦德格扎拉僧	张凯清	
	徐声波	塔尔巴	杨生茂	玛尼喇嘛	
	博彦	三伯美	巴音格西格	巴拉登公布	
	富珠烈	司乌日图那筭	对岱	白图布巴衣尔	

续表

职务 / 届别	委 员			备 注
	常 委	委 员	委 员	
	黄孟克乌力吉	任春林	达瓦	增补
	杨生茂	那顺巴图尔	辛学亮	" "
	嘎瓦	宗布尔巴图	罗彪	" "
		巴图吉尔格勒	帕格尔斯仁	" "
		林庆达瓦	苗瑞凤	" "
		哈立珍	孟柏林	" "
		喇嘛扎布	韩保	" "
		张沧	朝克德力格	" "
		董炎炳	杨文斌	" "
			达木仁	
			李文钦	
			罗恩和巴图	
			宝音吉尔格勒	
			胡艾尔立佐巴依尔	
			陶斯查干	
			孙明海	
			韩克吉雅	
			格什达来	

历届巴盟政协常委、委员、表(二)

届别	职务	常委		委员		备注
		常	委	委	员	
第四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二次会议			珠图门巴依尔	珠马喜别立格	乌力吉仓	增补
			多尔吉	李惠芳	巴音斯楞	" "
	巴图巴根	张子明	梁益恭	高晓林	" "	
		常一鑫	曹宽	陈仕礼	" "	
	陈爱尔德尼巴图	张麟勇	辛学亮	田丰玺	" "	
		王维仁	伦德格扎僧	阿格旺巴拉登	" "	
	王恩荫	玛尼喇嘛	列格登藏吾	" "		
	巴云英	老不生				
	布和	田协安	金老不生	玛图门巴依尔	" "	
	牛顿	任春林	朝克德力格尔	陶斯查干	" "	

续表

职 务 届 别	委 常 委			委 员		备 注
	委 员	委 员	委 员	委 员	委 员	
	齐文奎	罗恩和巴图	胡力巴依尔	珠马喜别力格		
	博彦	罗巴图吉尔格勒	朝格吉雅	对岱		
	李德义	格什达来	巴彥格布裕	白图布巴依尔		
	哈尔巴拉	孙明海	张沧	哈立珍		
	德格都宝音	徐秀泉	董炎炳	李振纲		
	赵瑛	苏林	阎秉智	张凯清		
	白福民	老不生	阿格旺鲁布生	马学良		
	苏奎	吉木彦道尔吉	巴拉登藏吾	塔尔巴		
	李瑞林	丹比加木生	岳中和	宋布尔巴图		

续表

职务 届别	常务委	委	委	员	备注
	孝顺嘎	达瓦	达木仁	巴拉登公布	
	李紉德	帕格尔斯仁	宝音吉尔格楞	韩保	
	王增堂	林庆达瓦	杨文斌	孟柏林	
	郝威	多尔吉	胡克	那银太	
	金巴图道尔吉	王明	许德明	石岳	
	巴图毕力格	徐淑珍	李长春	王荫卿	
	陈靖邦	陈振福	刘嘎宽	拉希加布格	
	黄孟克乌力吉	沈知元	毛明章	白瑞卿	
	嘎瓦	朝有福	陈志保	赵守业	

续表

职务 届别	常务委		委员		备注
	委	员	委	员	
	罗永寿	陶斯格楞	吴占胜	韩治邦	
	博彦	傲力玛扎布	吉林巴图	张泰来	
	杨生茂	安保春	乌力吉仓	韩振林	
	朱士俊	巴音色楞	刘秉池	敖尔敦巴雅尔	
	马维荣	冠布	刘存整	许仁文	
	武瑞明	李有根			
	翟荣光				
	罗虎				
	李文钦				

历届巴盟政协常委、委员表(二)

届别	职务	常委			委员			备注
		常	委	青	委	员	注	
第五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巩受青	李德义	巴音斯楞	张泰来	高心平		
			孝顺嘎	巴图巴根	吴占柱	阎学廉		
			巩受青	巴拉吉尼玛	明安	韩治邦		
			查干	齐仲科	赵璞	韩振林		
			苗瑞风	吉林巴图	骆长胜	肇和斯图		
			黄孟克乌力吉	苏德保扎布	郝米吉德	张金龙		
			白瑞卿	张保恩	郭全德	付支		
			翟荣光	李文孝	赵守业	唐德仁		

续表

职务 届别	常委	委员	常委	委员	备注
	李文钦	卫立	仁庆道尔吉	巴图孟克	
	博彦	石宝山	刘乃科	沙丰保	
	朱士俊	贡顺道	刘志敏	陈世清	
	苏奎	王印全	石岳	陈振富	
	牛顿	沈志远	张子明	孟传志	
	巴图	周文图	徐淑珍	梁益恭	
	周德义	常一鑫	陈化理	苏希德	
	陈靖邦	杨占林	韩有福	刘笃指	
	云生格	李长春	苏林	张振玉	

续表

职 务 届 别	委 员			备 注
	常 委	委 员	员	
	罗虎	特木尔	王荣	王文峰
	郭子清	刘秉池	色音佳	张麟勇
	李树德	尚建学	单韵清	施诚
	王增堂	郭学	谭有经	李有庚
	嘎瓦	博彦	王荫卿	加木莫希开希
	达瓦	刘积元	邢守谦	张安祥
	陶光瑞	张月中	单巴道尔吉	岳中和
	王维仁	范淖尔布	侯东海	胡克
	郝威	暴顺昌	马凤鸣	田丰玺

续表

职务 届别	常委	委员	委员	委员	备注
	巴拉登藏吾	吉木彦道尔吉	老不生	阿德格扎拉僧	
		张凯清	阿布格鲁布生	玛尼喇嘛	
		单旦尔	林庆扎木苏	罗布生	
		明斯克金巴	阎秉智	三伯美	
		马拉高	王恩荫	王维智	
		巴云英	巴图毕力格	巴拉登公布	
		巴彦格西格	巴拉登	白图希巴依尔	
		田协安	齐文奎	达希斯楞	
		那音太	那桂拉斯楞	任春林	

续表

职 务 届 别	常 委	委 员			备 注
		孙明海	多尔吉	陈爱尔德尼巴图	
		宗布爾巴圖	杨文斌	张沧	
		瑪圖門巴依爾	罗永寿	罗恩和巴图	
		羅圖吉爾格勒	拉麻扎布	孟柏林	
		寶音吉爾格勒	段塔拉騰岱	胡艾立佐巴依尔	
		胡巴圖巴依爾	哈立珍	徐秀泉	
		陶斯查干	朝格吉雅	韩保	
		董炎炳	葛什达赖	藏德明	

历届巴盟政协常委、委员表(二)

届别	职务	常委	委员	备注	
第六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二次委员会议		牛顿	骆长胜	敖日布	
		王益三	莫勒特	包花	李占龙
		王维仁	特木尔巴根	孙泉	金宝文
		王荫卿	刘福智	石海成	郭四
		包金海	巴图巴雅尔	李守仁	牛二且
		任春林	张智德	张万仓	阿拉腾其其格
		李树德	葛恒来	王兰英	陈长生
		那音太	康民	钱玉章	康玉莲
		罗虎	苏日嘎拉图	郭羊换	王秀兰

续表

届 别	职 务	常 委	委 员	备 注
	罗永寿	王有义	西日布	白引弟
	张沧	牛淑芳	胡厚	金梅
	张玉荣	特木勒	老登	脑更其其格
	张伟平	赵玉珍	其本格	吉梅兰
	巩受青	杨占林	史俊卿	吴栋
	董炎炳	魏景功	周广俭	金菲荣
	董然韬	李振纲	宋树柏	王仲福
	段塔拉腾岱	陈兴光	张亨业	哈申其其格
	董高升	贾西林	常锦秀	刘珍

续表

届	职务	常务	委员	委员	备注
		陶光瑞	魏学孟	刘学武	邹国华
		郝斌	张麟勇	尚子常	王荣
		黄岱	侯东海	范淖尔布	薛生文
		喇嘛扎布	齐子正	石继武	丹巴仁庆
		孟传志	张安祥	马玉敏	乔志高
		袁昌金	丁继鹏	多尔吉	罗桂芳
		徐秀泉	高晓林	张维新	恩和其其格
		特木尔巴根	热喜吉华	阎秉智	吉木雅道尔吉
		马玉金	石岳	单韵清	徐明德

续表

职务 届别	常务委			委员			备注
	委	委	委	委	委	员	
	额尔德尼	乌云达来	罗步云	马维荣			
	刘桂清	陈振富	阿布嘎老不生	吴裕民			
	博彦	贺太保	吉林太	韩保			
	贤吉美图	杨文斌	孟柏林	张文递			
	周德义						
	王作林						
	满达						
	云生格						
	哈立珍						

续表

届 别	职务	常务	委	员	备注
		孙明海			
		陈清邦			
		宗德旺			
		明安			
		杨泽			
		刘炳池			
		马生华			
		吴振荣			
		李克森布			

历届巴盟政协常委、委员、表(二)

职务 届别	常委	委员	备注
第七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二、三次会议	王荫卿	王兰英	巴金喜
	王维仁	白耀祥	李宪亮
	王作林	胡振华	杨秉占
	任春林	忠格赖	查干其其格
	齐伦	姜志宁	赵国兴
	佟巴图	高耀铸	额日和巴图
	苏明金	巴德玛	刘培菊
	李子伟	金玉花	赵桂兰
	李树德	德力格尔其格	王云亮
			刘平智
			依希尼玛
			张香女
		郭羊换	
		黄色文	
		王秀兰	
		祁素梅	
		董秀珍	
		巴德玛	

续表

职务 届别	常务委			委员		备注			
	李广东	那银太	贤吉美图	宗德旺	杨庆元		杨登云	张文品	张登科
	吉木色	张世杰	贾承荫	马守孝	王楨	吴栋	张亨业	阙武	杨文海
	吉梅兰	敖特根其木格	樊俊梅	王大智	石兆奎	武可夫	赵养性	周福顺	曹汉杰
	吴国柱	杨占林	于瑞敏	王仲富	刘芳莲	李振纲	朝勒蒙	程振华	巴岱

续表

职务 届别	常务委	委	员	备注
	张万光	刘学武	李鸣山	达瓦
	张建方	张文递	哈申其其格	高云峰
	张麟勇	曹忠	贾西林	姬娜
	明安	樊水玉	王英杰	包力
	若西色登	田文彦	布秉贵	邵文玉
	罗虎	范淖尔布	郭韩诚	张安祥
	罗永寿	夏堤	常保满	马玉钦
	罗步云	乔志高	樊俊义	丁继鹏
	拉嘛扎布	邓阿锦	辛有明	李炳卿

届 别	职 务	委 员			委 员			备 注
		委 员	委 员	委 员	委 员	委 员	委 员	
		孟传志	陈国平	查中城	玉鸿臣			
		倪宽栋	李枝荣	张晋仁	高凌云			
		河格旺罗布桑	扎木雅	扎木雅道尔吉	阎秉志			
		陈彦颐	阿格旺老不生	马生华	扎木雅			
		叔庆喜	田中伯圭	肖子元	查格德苏荣			
		骆秉枢	巴图	齐文奎	张文递			
		骆宝林	吴成先	董炎炳	张维新			
		贺永华	李辅臣	李克森布	罗步云			
		段全嘉	罗达	吉林太	罗桂芳			

续表

届 职 务 别	常 委	委 员	委 员	备 注
	翁明仁	昭那木尔	李琴堂	孟柏林
	徐秀泉	都瓦沙	李茂林	贺太保
	郝威	黄振忠	牛淑芳	袁昌金
	恩和其其格	额日奇	包花	徐明德
	梁玉	白相来	李新	韩保
	彭效文	阿拉腾查干	赵永芬	
	董然韶	张利忠	兰佩玉	
	陶光瑞	田振彪	齐花眼	
	罗岩峰	孙泉	邢翠平	

职 务 届 别	常 委		备 注
	委 员	员	
	多尔吉	黄信美	
	陈媛	陈振富	
	杨文斌	吴裕民	

历届政协委员会主席团

第一届政协河套行政区委员会主席团：

王恩荫 朱士俊 何升岫 李桂芳 郝平南 赵子文 刘勉 刘进仁 苏和 巩受青 蔚虎才 哈斯瓦齐尔

第三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团：

李桂芳 关保 王恩荫 金允诚 巴云英 富珠烈 李瑞林 牛顿 王增堂 孝顺嘎 苏奎 白福民 朱士俊 巩受青 马维荣 巴图毕力格 巴图巴根 齐文奎 玛尼喇嘛 陈爱尔德尼巴图

第四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团：

李德义 巴云英 孝顺嘎 王恩荫 巩受青 罗永寿 马德 白福民 李文钦 李树德 罗虎 杨生茂 陈靖邦 朱士俊 苏奎 赵瑛 郝威 巴图巴根 巴图毕力格 黄孟克乌力言 巴拉登藏吾 陈爱尔德尼巴图

第五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团：

郭全德 王恩荫 巴云英 齐文奎 李德义 孝顺嘎 李文钦 翟荣光 郭子清 巩受青 董炎炳 陈靖邦 苏奎 巴图 博彦 巴图巴根 肇和斯图 喇嘛扎布 胡艾立佐巴依尔 巴图毕力格 陈爱尔德尼巴图 巴拉登藏吾 仁庆道尔吉

苗瑞风 石宝山 朱士俊 唐德仁 周德义

第六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团：

宝音图 韦荫秀 弓志芳 云生格 齐文奎 陈
靖邦 丁继鹏 牛顿 牛二旦 王益三 苏和
王维仁 王荫卿 包金海 巩受青 那银太 罗
永寿 孟传志 张玉荣 张伟平 宗德旺 董高
升 董炎炳 郝威 袁昌金 喇嘛扎布 额尔德
尼 苏日嘎拉图 阿拉腾其其格 贤吉美图 段
塔拉腾岱

第七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团：

巴图 王维仁 王荫卿 白相来 兰佩玉 齐文
奎 李琴堂 李辅臣 吉林太 吉木色 吴成先
孟传志 忠格赖 罗达 罗永寿 罗岩峰 罗桂
芳 骆秉枢 韩振华 李克森布 昭那木尔 翁
仁明 徐秀泉 都瓦沙 曹汉杰 董炎炳 额日
奇 田中伯圭 查格德苏荣 阿格旺罗布森

(注：因第一届政协蒙古自治州委员会与第
二届政协巴盟委员会主席团，因档案材料无记载，
故缺)

历届巴盟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

职 务	主 任		委 员	备 注
	正	副		
第 三 届 政 协 巴 盟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王恩荫	富珠烈 邢复礼	李文钦、武瑞明、晋临祥、孝顺嘎、杨生茂、 金巴图道尔吉	
第 三 届 政 协 巴 盟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王恩荫	赵瑛 博彦 孝顺嘎	李瑞林、武瑞明、邢复礼、杨生茂、晋临祥、 宗布尔巴图、黄孟克艾力估、巴图毕力格	
第 五 届 政 协 巴 盟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巴图	李德义 苗瑞凤	宗布尔巴图、杨文斌、李文钦、周德义 张泰来、达瓦	

续表

届次 职务	主任		委员	备注
	正	副		
第六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罗鉴	张沧 王益三	马生华、骆长胜、其本格 巩受青、丁继鹏、金梅	
第七届政协巴盟委员会第一、二、三次会议	李克森布	李琴堂 彭效文 吴宝音	李振纲、周福顺、罗桂芳、 夏堤、吴栋	
				因第一届政协蒙古自治州与第二届河套行政 区委员会无提案审查委员，故缺，第二届，第 四届政协巴盟委员会无提案审查委员名单记载 故缺。

一九八六年

1月14日，由盟政协副主席都瓦沙、李辅成、黄振忠带队的三个走访慰问小组，分赴我盟七个旗县市、二十多个乡、社、苏木，深入农户、浩特、单位及医院病榻前，探望了一百三十五名盟政协委员，并向他们赠送了慰问信、纪念品和慰问品，及时把党的温暖、关怀带给了每一个委员。同时还听取了委员们提出的有关我盟经济建设方面的建议、意见和落实政策等要求。

1月3日，盟政协办公室编印了总第十期《巴盟政协》会刊。这期会刊主要刊登了盟党委批转“关于全盟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报告”的通知和盟党委批转盟政协调查组关于“五原县是怎样开展人民政协工作的调查”通知及全盟七个旗县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的经验。

3月13日至20日，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临河召开了为期八天的第三次文史资料审编会议。会上学习了全国政协题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的文件和全国政协《文史通讯》（85）第四期刊登的五篇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经验性材料，审编了《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汉文版）的十七篇，13

万字的历史资料稿件，总结交流了全盟各地文史资料编辑出版工作的经验。

4月3日至5日，盟政协协助内蒙政协常委罗永寿同志组织在临河市城区的内蒙六名政协委员组成考察组，对临河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临河市五星乡的扶贫工作，杭锦后旗制酒厂改革及生产情况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重点考察，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地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5月14日至15日，盟政协召开了七届六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了召开七届三次全委会的日期、议程和日程安排，审议了七届二次全委会以来的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和文史资料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表彰奖励在“四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政协委员的决定。通过了七届三次全委会组织机构设置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列席人员、编组和召集人名单。会议听取了区政协五届四次全委会精神的传达。听取了盟政协在五原召开的全盟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巴盟政协学习参观团赴外地参观学习情况的报告。

5月17日至21日，政协巴盟第七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盟政协会议室举行，179名委员中，出席134名，列席会议的14名。盟政协副主席齐文奎同志致了开幕词。盟委副书记杜

凤华同志作了全盟八六年主要工作的报告。公署副盟长刘崢同志作了全盟经济形势及今后设想的报告。会议传达了区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精神，审议了七届二次全委会以来的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处理情况报告和文史资料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学习了“七五”计划，协商讨论了我盟实施“七五”计划问题。表彰奖励了在四化建设中作出贡献的45名政协委员，他们是：

马玉钦 王大智 王作林 王英杰 王仲富 王桢 王荫卿 王鸿臣 巴金喜 石兆奎 布秉贵 乔志高 刘平智 刘芳莲 张万光 张香女 张建方 张晋仁 张麟勇 孙泉 李枝荣 李鸣山 辛有明 邵文玉 武可夫 金玉花 周福顺 叔庆喜 孟传志 赵养性 贾西林 贾承荫 郭韩成 梁玉 高云峰 高耀铸 姬娜 曹汉杰 常保满 董秀珍 阚武 伊希尼玛 范淖尔布 查干其其格 敖特根其木格。并为他们发放了奖状、奖品。

5月19日至20日，在七届三次全委会议上先后有梁玉、王桢、程振华、张万光、高耀铸、罗永寿、贾承荫、王仲富、金玉花、范淖尔布、张沧、张世杰、王作林、常保满、李炳卿、李鸣山、王大智、李枝荣、张晋仁、郭羊换等二十名政协委员作了口头和书面发言。

5月28日，政协巴盟办公室编印了第二期（总第十一期）会刊，主要刊登了巴盟政协七届三次全委会文件汇集和报纸消息报道摘编。

7月9日至24日，盟政协组织了以政协委员为主，吸收盟直一些中蒙医组成的送医送药小组，由副主席黄振忠和常委、副主任医师段全嘉同志带队，深入到我盟严重受灾、生活贫困的边、牧、山区考察卫生医疗事业，并为群众送医送药，治疗疑难疾病。在半个月中，共为298名群众医治了疾病，其中免费治病九十一人次，合款四百元。对存在的问题，建议公署及时予以解决。

8月7日至12日，由盟政协副主席齐文奎、黄振忠带队，五名驻会常委参加组成考察组，赴盟内部分旗县进行考察。先后考察了五原复兴乡、县尾毛厂、玻璃罐头厂、化肥厂、水暖器材厂、乌中旗乌加河镇、乌后旗乌力吉苏木、杭后旗梁玉草田轮作试验点、园子渠乳牛养殖社、赵永芬养鸡糕点加工厂等十个点。听取了旗县负责人的汇报，参观了现场，与当地党政领导交换了意见，提出了建议。

8月10日，盟政协召开了临河地区非党政政协委员“双月座谈会”，会上学习了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重要文件，学习了中央关于继续作好

落实政策工作的通知，并在和谐的民主团结气氛中，进行了座谈，大家对我盟工作提出了许多好建议，对落实政策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8月16日至17日，巴盟政协召开了第二次统一祖国内联外引座谈会，有十五位与海外有密切联系，并在过去铺路搭桥中作了不少工作的盟、旗、县市政协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了座谈。会上学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一国两制”的部分论述和关于台湾形势的讲话》，进行了热烈的座谈讨论。

9月2日至3日，盟政协召开了七届八次常委会议，巴图主席主持会议并作了开幕讲话。会上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1986）19号文件，中办（1986）10号文件，邓颖超、习仲勋同志的讲话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传达了关于贯彻全国地方政协工作座谈会精神，进一步搞好人民政协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七届七次常委会以来的工作报告及送医送药、盟内考察的情况报告。

9月4日至22日，盟政协召开了旗县市政协秘书长座谈会议，会上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总结交流了各旗县市政协

秘书长工作经验，探讨如何进一步搞好政协秘书长工作的问题。会上还作了到兄弟盟市旗县进行学习取经的安排。先后到我区伊克昭盟政协、陕西省榆林县政协、延安市政协、西安市政协、山西省大同市政协，与当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听取了这些单位的经验介绍，进一步开阔了眼界。

11月16日至17日，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临河市召开了全盟各旗县市文史资料工作负责人会议。会议还邀请了盟工商联，天主教爱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参加。盟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罗永寿、明安主持了会议。盟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罗达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周尚成同志传达了全区第一次文史办主任会议精神。会议研究讨论、汇报交流了文史资料的抢救工作和抢救对象情况。协商了文史资料工作的专题化和系统化问题。研究了各地之间的协作和发行工作的问题，划分了两个协作区（即套内协作区和原三公旗协作区）。落实了自治区下达我盟的十三个专题和盟内确定的七个专题。并为五十多位撰稿者发放了“特邀征稿撰稿员”聘请书。

11月17日至19日，盟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在临河召开了全盟政协首次提案工作座谈会议。盟政协副主席、提案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克森布、副

主任委员李琴堂、副秘书长吴宝音、专职常委彭效文和全体委员及各旗县市政协分管提案工作的副主席、专职干部30余人，与承办委员提案数量大的9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副主席李克森布主持会议并讲了话。提案办主任郭丽儒同志传达了满州里市召开的全区政协提案工作的经验交流会议精神。会议认真总结了我盟前一段工作，并结合当前的提案工作任务，讨论和研究了今后的任务。

一九八七年

1月5日至10日，政协巴盟七届九次常委会议暨经济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在盟政协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协常委、部分委员及各旗县市政协主席和盟直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共计90余人。巴图主席主持会议并作了开幕讲话。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传达贯彻全区旗县委书记会议精神，总结巴盟政协1986年工作，提出87年工作打算。同时开好经济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有22名政协委员在会上作了口头和书面发言。会议通过了《关于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议》。

3月15日至17日，为配合全盟兴草兴畜中心

工作，帮助牧区种好饲料地，盟政协派出技术支牧，咨询服务小组，由黄振忠副主席带队，常委梁玉、委员高耀铸等一行六人，赴乌后旗就牧区如何发展饲草饲料生产和饲料地种植地膜玉米问题，进行了科技讲座和实地考察。

3月30日至4月3日，盟政协根据内蒙政协办公厅《关于组织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就地参观考察的通知》精神，组织在盟直单位工作的内蒙政协常委罗永寿，委员王作林、孟传志、王荫卿、郝德庵、肖杰秋、曹菊梅和巴盟政协、临河市政协部分委员联合组成三级政协委员考察组，历时五天，对巴盟蒙医医院的蒙医事业发展情况，临河市曙光乡回族群众生产生活情况，马场地乡的蒙古族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临河市白脑包乡“兴草兴畜，农牧结合”生产发展情况，新华乡乡镇企业发展情况，进行了重点考察，充分肯定成绩，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5月21日至22日，盟政协召开了七届十次常委会议。会上学习了全国政协六届十四次常委会的讲话，传达了自治区政协五届五次会议精神。听取了七届三次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汇报了七届四次全委会议筹备工作的情况，决定了召开七届四次全委会日期及通过会议

议程、日程。通过了接受若西色登同志辞去政协委员和常委的决定。

5月23日至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巴彦淖尔盟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盟政协会议室举行，出席委员113名，列席16名。巴图主席向大会致了开幕词。

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听取盟委书记杨志荣，公署副盟长刘崢同志作关于经济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听取内蒙政协常委罗永寿同志关于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和自治区政协五届五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审议盟政协七届三次全委会以来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6月6日，内蒙政协主席石生荣同志来巴盟视察工作，并召开了全盟政协工作座谈会。巴图主席主持了座谈会并作了汇报，在家的政协副主席和正副秘书长参加了座谈会。

8月11日至13日，盟政协召开了旗县市政协主席，秘书长座谈会议，盟政协主席巴图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学习了中办发（1986）10号文件，《统战理论研究》1987年第五期文章，《试论政协的组织特点和政治功能》及《内蒙古简讯》第39期文章。根据各旗县市不同情况，讨论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改进作风，继续搞好政协工作等问题。

9月19日，巴盟政协举行盟直部分委员座谈会，座谈讨论了《内蒙古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副主席吴成先同志主持了会议。会上还学习了内蒙党委办公厅“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对内蒙古工作指示的通知”和《内蒙古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

10月19日，第七届巴盟政协委员会主席巴图同志因心脏病猝发去世，终年五十九岁。

11月24日，政协巴盟委员会召开主席会议，盟委副书记傅守正同志到会宣布：巴图同志去世之后，八届委员会成立之前，由都瓦沙同志主持政协全面工作。并代表盟委提名马炳和同志为驻会常委。

12月15日至18日，巴盟政协召开了七届十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盟委书记杨志荣同志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会议精神并讲了话。都瓦沙副主席作了七届十一次常委会以来的工作总结并提出1988年工作初步打算。李克森布副主席传达了自治区政协常委会议精神。吉林太副主席传达了全区学习工作座谈会纪要。通过了关于学习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精神的决议和增补政协委员的议案。

一九八八年

5月9日至11日，政协巴盟召开了七届十三次常委会议。盟委书记杨志荣同志出席了会议。会上学习了全国人大七届一次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重要文件，审议七届四次全委会以来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处理情况的报告。通过关于召开七届五次全委会会议的决定。通过七届五次全委会组织机构、分组办法和列席人员名单，增补七届常委建议。

5月13日至1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巴彦淖尔盟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巴盟政协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委员110名，列席18名。昭那木尔副主席主持了会议，李克森布副主席作了开幕讲话。盟委副书记傅守正同志向大会作了全盟改革、开放形势的讲话。公署副盟长刘峥同志向大会作了关于我盟国民经济执行情况 and 88年国民经济安排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听取了七届四次全委会以来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处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增选了马炳和同志为七届政协常务委员。通过了七届五次全委会决议和提案工作报告的决议。

11月9日至11日，政协巴盟召开了七届十四

次常委（扩大）会议。盟政协副主席都瓦沙同志主持了会议。盟委副书记傅守正同志介绍了全盟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全盟贯彻中央“两会”精神，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安排部署。罗达副主席传达了内蒙政协常委会议精神，黄振忠副主席传达了全盟农村工作会议精神。通过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决议。

一九八九年

7月4日至6日，政协巴盟召开七届十五次常委会议，盟政协副主席都瓦沙同志主持了会议。盟委副书记刘峰同志到会讲了话。

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协商决定政协巴盟八届一次全委会参加单位和组成人选。审议政协巴盟七届常委会工作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决定政协巴盟八届一次全委会会议召开日期。协商提出政协巴盟八届一次全委会会议议程、会议主席团、秘书长建议名单，提案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建议名单，会议分组办法及召集人名单，工作机构和副秘书长名单。通过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决议。

7月24日至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八届巴彦淖尔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巴盟政协会议室隆重举行。共有委员181名，出席委员149名，列席17名。盟委副书记刘崢同志向大会致了开幕词。

这次会议的议题有六项：一、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次全会文件。二、听取盟委领导同志讲话。三、审议政协巴盟七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四、审议政协巴盟七届提案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五、选举产生政协巴盟八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六、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盟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7月28日，政协巴盟八届一次全体会议，在本届主席团的领导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政协巴盟八届委员会主席1名，副主席12名，秘书长1名，常务委员13名。

政协巴彦淖尔盟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副主席名单：

刘崢 何俊士 吴成先 黄振忠 高应才
李琴堂 吉林太 博彦 张国华 骆秉枢 罗永
寿 张沧 武振耀

八届一次全委会常委名单

马炳和 周树栋 王维仁 孟传志 左民爱
郝威 老布生 梁玉 杨高和 张建方 陈彦颐
罗岩峰 罗桂芳

八届一次全委会秘书长名单

秘书长：罗岩峰
副秘书长：王伟强 周斌

八届一次全委会主席团名单

马炳和 王维仁 左民爱 吉林太 老布生
刘崢 李琴堂 杨高和 吴成先 何俊士 张沧
张建方 张国华 陈彦颐 武振耀 罗永寿 罗
岩峰 罗桂芳 周树栋 孟传志 郝威 骆秉枢
高应才 秦淑珍 黄振忠 梁玉 博彦

八届一次全委会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张国华
副主任委员：李琴堂 马炳和 王维强
委员：王国华 包金花 吴栋 李凤莲 李
树民 周福顺 崔文亮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作者 =

页数 = 3 2 4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